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本，第三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八年九月

從明目到商戰——明代以降眼鏡的物質文化史

邱仲麟*

本文討論眼鏡這種舶來品與中國社會糅合的過程，及其發展出的獨特物質文化。全文約可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談眼鏡的輸入、仿製與販售。在隆慶元年(1567) 以前，透過朝貢及邊區貿易，其輸入量不大。隆慶元年以後，透過東南沿海貿易，玻璃眼鏡流通日多，通商口岸的居民亦開始仿製。進入清代，市面上產品充斥，價格日跌。銷售方式，除店面之外，隨處兜售也頗常見。第二部分論老花眼鏡、近視眼鏡，及驗光、鏡架的變遷。老花眼鏡的傳入見於記載始於一四二〇至三〇年代，一六〇〇年代使用者漸多。清代則有「四十為眼關」之說，從此老花逐漸嚴重，必須使用老花眼鏡。近視眼鏡在市面上流行，主要在康熙三十年 (1691) 以後。清代業者出售眼鏡，主要以十二種度數的鏡片，提供顧客選擇。而在道咸年間，有腳的新式眼鏡傳入，業者並開始仿製。第三部分分析使用眼鏡的特殊觀念與現象。明末清初，玻璃眼鏡頗受歡迎；但盛清以後，因所謂的「玻璃屬火易傷眼，水晶屬水能潤目」之說，水晶眼鏡為官員、士紳所愛用，其市場佔有率攀升。其次，社會上還有眼鏡不可多戴的觀念。最有名的例子，是清高宗對眼鏡敬而遠之，認為這是物品操控人類的明顯案例，戴眼鏡並不可取。另一方面，戴眼鏡一向被視為有學問的象徵，年輕學子常刻意仿效。而且在清代，戴眼鏡具有某種炫耀性，其中墨色水晶眼鏡獨領風騷。最後的部分，則考察清末眼鏡的新浪潮。光緒年間，西方的驗光表傳入，清朝滅亡前夕又傳進機器驗光。十九世紀末，土產的眼鏡受到西式金邊、銀邊眼鏡及托力克鏡片的強烈衝擊。在上海，本地業者與外來洋商展開市場爭奪戰，眼鏡被貼上貿易戰與民族主義的標籤，高科技的鏡片與專業的驗光技術，還必須以「愛國」相號召。

關鍵詞：大眾化 在地化 驗光 廣告 物質文化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邱仲麟

一・緒論

眾所皆知，眼鏡是用來矯正視力，防止視力惡化的光學器具。有一個看法指出，眼鏡是在西元一二八五年出現於義大利。[1] 另一說則認為一二八六年 Pisa 的玻璃匠發明了眼鏡，而其相關知識可回溯至一二七〇年。[2] 還有學者認為：在義大利或西方世界，眼鏡發明的時間不晚於一二八七年。[3]

最早的眼鏡是單片，鑲在鐵、骨、皮革、木頭等製成的圓框中，以手持著照看；其後，出現將兩片鏡框聯結的眼鏡。但後來，又將手持的扁柄改用鉚釘聯接，且以鉚釘當作旋軸，可以分開或合攏。不久，這種鉚釘開合的眼鏡傳入佛羅倫斯。（西方早期眼鏡，參見圖一）一三〇五年，該城的多米尼各派僧侶，曾稱讚這種眼鏡是最有益於人的工藝品之一。眼鏡的鏡片，最初是透明水晶或綠玉製成，之後因玻璃製造日盛，才採用光學玻璃。由於早期的玻璃鏡片品質不佳，質地不勻，光線通過時的折射不一致，使得物像模糊不清，因此在一三〇〇至一〇年間，威尼斯當局曾禁止使用一般玻璃來替代優質的水晶磨製眼鏡。起初使用眼鏡者，僅限於學者和修道院僧侶，特別是當時印刷術還未發明，眼鏡成為老年僧侶抄寫古書的寶物。隨著一四四八年活版印刷術之發明，閱讀人群增加，老年人越加需要眼鏡，眼鏡製造也開始成長。十五世紀，威尼斯人將磨鏡技術傳往日耳曼，後來傳遍全歐，直抵北歐的瑞典。眼鏡發明後，並未引起醫界的重視，僅是由配戴者自行至商店選購，使用亦多限於老年人所用的凸面鏡。十五世紀四〇年代，已有著作提到凹面鏡，隨後近視眼鏡也應運而生。至十六世紀，醫師才開始使用凹面鏡來矯正近視患者。而隨著所謂的地理大發現，玻璃眼鏡遂傳至東方的日本與美洲等地。其使用的方式，則以夾鼻、手持為主，掛耳極為少見；直至十八世紀，雖因鏡腳出現而有所轉變，但前面兩種使用方式還是相當常見。[4]（參見圖二至四）

---

[1] Theo. E. Obrig, *Modern Ophthalmic Lenses and Optical Glass* (New York: The Chilton Company, 1944), p. 74.

[2] Wolf Winkler, ed.,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Exhibition Catalogue Carl-Zeiss-Stiftung Jena* (Leipzig, Germany: Edition Leipzig, 1988), pp. 9, 18.

[3] Richard Corson, *Fashions in Eyeglasses: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Peter Owen, 1967), p. 20. 同樣看法，參見 J. William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A History and Guide to Collecting* (San Francisco: Norman Publishing, 1996), p. 38.

[4] 彭剛毅，〈眼鏡的歷史・上〉，《設計》65 (1995)：65-68；彭剛毅，〈眼鏡的歷史・下〉，

然而，眼鏡是中國人發明，抑或是由域外傳入，曾經有一段爭論，諸多學者如 Berthold Laufer (1874-1934)、Charlesworth Percival Rakusen (1884-1958)、原田淑人 (1885-1974)、那波利貞 (1890-1970)、畢華德 (1891-1966)、馮柳堂 (1892-1945)、裘開明 (1898-1977)、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1900-1995)、聶崇侯 (1903-1962)、謝興堯 (1906-2005)、王錦光與洪震寰等人，都投入了這一起源問題的討論之中。（參見第二節開頭）除了起源的問題之外，亦有學者論及眼鏡傳入後的仿製與應用，如李約瑟與魯桂珍 (1904-1991) 論明末清初江蘇的光學技藝家，曾談到孫雲球能製造眼鏡。張橙華論蘇州的光學發展史時，亦談到蘇州的製眼鏡業。戴念祖於所著《光學史》一書中，有頗長篇幅討論明清時期的眼鏡。而孫承晟則以孫雲球《鏡史》為中心，考察明清之際西方光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5] 以上作者主要為科學史家，論述脈絡亦以光學史為重點。至於孫機、李慎、胡源、丁燮山等人的文章，探究的是眼鏡傳入後的仿製及使用等相關問題，較接近於中西文化交流史範疇。[6] 毛憲民、郭福祥、侯皓之、楊豔麗等人的研究，對清代皇帝使用眼鏡的態度與情況有細緻考察。[7] 另外，蓋東升以《紅樓夢》所提及的眼鏡作為切入點，徵引明清相關文獻討論當時眼鏡的輸入與流傳情

《設計》66 (1995)：38-43。西方使用眼鏡的方式，參見 W. Poulet, *Atlas on the History of Spectacles*, vol. 1 & 2 (Bonn, Germany: Verlag J. P. Wayenborgh, 1978-1980).

[5] 李約瑟、魯桂珍著，王冰譯，〈江蘇的光學技藝家〉，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頁 532-566；張橙華，〈蘇州光學史初探〉，《物理》13.6 (1986)：381-384；戴念祖，《中國物理學史大系・光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頁 340-346；孫承晟，〈明清之際西方光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孫雲球《鏡史》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6.3 (2007)：363-376；王稼句，〈孫家眼鏡〉，《蘇州雜誌》2012.5：29-32。

[6] 時得之（孫機），〈我國早期的眼鏡〉，《文物天地》1988.3：18-19；董樹岩，〈眼鏡入華考〉，《物理通報》1994.2：38-39；周士琦，〈眼鏡東傳小史〉，《尋根》2002.3：62-64；殷登國，《東西文物趣談》（臺北：知書房，2006），〈眼鏡〉，頁 73-79；李慎，〈明清之際西洋眼鏡在中國的傳播〉，《澳門歷史研究》2006.5：108-116；李慎，〈明清之際西洋眼鏡在中國的傳播〉（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7），頁 17-50；胡源，〈明清時期眼鏡在京城的流行〉，《科技潮》2009.7：52-54；丁燮山，〈眼鏡之傳入中國和普及〉，《尋根》2015.3：34-38。

[7] 毛憲民，〈故宮珍藏的眼鏡〉，《紫禁城》1996.3：32-34；毛憲民，〈清代宮廷眼鏡研究〉，《文物世界》2002.1：13-19；郭福祥，〈乾隆與眼鏡〉，《歷史月刊》118 (1997)：19-22；燕山，〈乾隆皇帝與眼鏡〉，《紫禁城》2001.2：49-50；侯皓之，〈佩察秋毫細——從檔案記載談雍正皇帝與眼鏡〉，《故宮文物月刊》297 (2007)：52-60；楊豔麗，〈乾隆皇帝與眼鏡〉，《文史天地》2014.1：49-51。

況。而邱韻如則針對明清記載眼鏡之相關文獻加以考證，如《留青日札》提到的「提學副使潮陽林公」為林大春 (1523-1588)。[8] 綜合既有的研究，主要屬於科技史或中西交流史的範疇，其次則集中在介紹清宮的眼鏡。

以上諸多研究，對筆者多有啟發，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擬對相關問題進一步梳理與探討，特別是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的面向。[9] 自上世紀以來，物質文化的探討路徑多元，且看法與解釋各異其趣，[10] 對「物質文化」的界定也有所不同，本文採取的是 Tim Dent 的定義：

> 所謂物質是可見、可觸及而且可以聞得到的非人或動物的東西。而文化是一系列圍繞著物質的人類日常活動——包括使用、分享、談論物質、為物取名，以及製造物品的方法。[11]

而上世紀八〇年代，西方學界提出的「物的社會生命」(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這一概念，也是筆者參照與思索的另一根源。前此，筆者曾撰文討論望遠鏡、顯微鏡、西洋景、照相術與電光影戲等西洋鏡之傳入中國，及其後續衍生之文化現象。[12] 本文則以眼鏡為例，考察其傳入後，如何與中國社會產生互動，並嵌入中國的文化元素，再造出異於原生地的認知與文化。內容涵括時間，主要為明清兩代，間或及於民國初年。在架構上，除探究眼鏡的產銷層面之外，並將討論老花、近視眼鏡及其配戴、配鏡技術；又析究中國社會使用眼鏡的文化現象，及對配戴眼鏡的一些特殊理念；最後，則論及晚清新式西洋眼鏡傳入所帶來的效應，

---

[8] 蓋東升，〈洋漆・眼鏡・金星玻璃——《紅樓夢》中外洋方物三題〉，《藝術研究》2000.2：10-12；邱韻如，〈明清眼鏡之文本溯源與時空背景探查〉，《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0 (2015)：56-72。

[9] 相關討論，參見邱澎生，〈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辯證〉，《新史學》17.4 (2006)：1-14；邱澎生，〈消費使人愉悅：略談明清史學界的物質文化研究〉，《思想》15 (2010)：129-147。

[10] 黃應貴在《物與物質文化》的〈導論〉，提到四種主要探討路徑：(1) 物自身 (2) 交換與社會文化性質 (3) 物的象徵化及其與其他分類的關係 (4) 物、社會生活與心性。但許多論文的內容無法簡單歸入以上四個路徑，其脈絡互有涉入，卻又各自不同。（頁 1-26）以一九八六年 Arjun Appadurai 所編的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一書為例，物的生命史是研究的主要切入點。但在該書中，Igor Kopytoff 對物的生命史的個別問題，觀點與 Arjun Appadurai 不盡相同。參見黃應貴主編，《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4），〈導論〉，頁 4。

[11] Tim Dent 著，龔永慧譯，《物質文化》（臺北：國立編譯館、書林出版公司，2009），頁 19。

[12] 邱仲麟，〈明清的西洋鏡與視覺感官的開發〉，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377-447。

民初上海眼鏡業者之間的廣告戰。必須說明的是，本文主標題——「從明目到商戰」，乃是指從明目談起，最後論及商戰，而非指其最基本的功能消失。畢竟，物的生命內涵是不斷迭加，而非前後取代，眼鏡亦然。

二・輸入、仿製與售價

在清代，由於水晶眼鏡盛行，故外國人誤以為中國本身發展出眼鏡。西元一八三〇年代，英國駐華商務監督 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 提到中國眼鏡不使用玻璃，而是以水晶製成，或許可以證明中國的眼鏡係自我發明，而非來自歐洲。[13] 其後，主張中國人發明眼鏡的看法不難見到。一九一五年，旅華澳大利亞醫生雷茂盛 (Otto Durham Rasmussen, 1888-1970) 在 *Old Chinese Spectacles* 一書中，根據孔子與拙工的故事，聲稱中國在孔子時代已使用水晶鏡片治病。但用水晶鏡片輔助視力，則到西元十三世紀才有佐證，即馬可波羅記載當時中國老人普遍使用眼鏡閱讀細字。因此，不論是用眼鏡治病或用眼鏡輔助視力，中國都早於西方。[14] 一九二八年，畢華德提出較為細緻的看法：中國在周朝時已有火齊珠一物，漢朝《淮南子》所記的「金目」——眼鏡或放大鏡，必定是之前就已開始使用；老人戴眼鏡之事，宋朝已略有提及，至元明而更盛。[15] 一九三〇年，來生 (C. P. Rakusen) 在《紐約驗光學會年鑑》有專文討論中國的光學，其中提到：根據馬可波羅遊記的記錄，眼鏡的使用，當以中國為最早。那時中國人用水晶做鏡片，不用玻璃，計有三種，即白色、墨色、茶色。[16] 類似觀點，又見於其另一論文中。[17] 一九三七年，Rudolf P. Hommel (1887-1950) 在 *China at Work* 一書指出，在十三世紀以前，中國已經發明眼鏡；而在十三世紀，威尼斯商人和熱那亞商人

[13] John Francis Davis, *China: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at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John Murray, 1836), vol. 2, p. 262.

[14] O. D. Rasmussen, *Old Chinese Spectacles* (Tientsin: North China Press, 1915), pp. 5-8. 感謝陳正國先生代為影印此一資料。

[15] H. T. Pi, "The History of Spectacle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2.10 (1928): 742-747.

[16] 轉引自來生著，梅晉良譯，〈中國眼鏡的歷史〉，《中華醫學雜誌》22.11 (1936)：1079。來生是上海晶光眼鏡公司 (Oculists Institute Company) 的驗光師和配鏡師。

[17] C. P. Rakusen, "History of Chinese Spectacle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53.3 (1938): 379-390.

因與中國貿易，得以將眼鏡帶回國內。義大利人的貢獻，或許僅止於用玻璃鏡片代替水晶鏡片。[18] 實際上，馬可波羅遊記並未記載當時中國用眼鏡的情況。

另一波的討論，主要環繞南宋趙希鵠 (1170-1242) 的《洞天清錄》。一九〇七年，Berthold Laufer 撰文指出：眼鏡大約是在一二六〇年左右，由西域（中亞）傳入中國，其根據是《通雅》及《正字通》等書記載：「靉靆，眼鏡也。《洞天清錄》載靉靆：『老人不辨細書，以此掩目則明。』此出元人小說。」[19] 然而，現存《洞天清錄》卻無相關內容。一九二四年，那波利貞考證：《洞天清錄》所載「靉靆，如大錢，色如雲母。老人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出西域滿利國」。這段文字出自明刊本《居家必備》。那波利貞並懷疑「靉靆」是翻譯詞。[20] 換言之，中國的眼鏡是外來的。一九三六年，裘開明也指出明刊本《居家必備》中的靉靆內容，並非趙希鵠原文，明代則有許多證據，文中除引述張寧《方洲雜言》及郎瑛《七修類稿》的記載外，又提到「靉靆」可能係阿拉伯語眼鏡 uwainât 的音轉，這個詞在張寧《方洲雜言》中作「僾逮」，陳懋仁《庶物異名疏》作「靉靆」，陳仁錫 (1581-1636)《潛確居類書》作「矮納」。[21] 而明刊本《居家必備》所錄內容，顯係濃縮《方洲雜錄》、《留青日札》等書之文字，應該是在晚明重刊時補入的。[22]

而在西方，反對眼鏡起源於中國最力的，應屬 Charles King Haynes (1893-?)。一九三六年，來生在〈中國眼鏡的歷史〉一文中反覆列舉各家之說，主要亦是與其論辯。在論辯中，許多醫生與其通信，包括王吉民 (1889-1972) 的幾封信。而

---

[18] Rudolf P. Hommel,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o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John Day, 1937), pp. 195-199.

[19] 轉引自 Kaiming Chiu, "The Introduction of Spectacles int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 (1936): 186-187.

[20] 那波利貞，〈淮南子に見えたる金目に就いて〉，《支那學》3.8 (1924)：53, 56-57。

[21] Chiu, "The Introduction of Spectacles into China," pp. 192-193. 十多年後，J. J. L. Duyvendak (1889-1954) 對此進一步考證，認為「出西域滿利國」應句讀為「出西域、滿利國」，即「靉靆由西域來，並由滿剌加來」。至於「靉靆」一詞，則係當時人以舊有用語轉譯新事物，半取其音，半取其意。參見 J. J. L. Duyvendak, "Desultory Notes on the *Hsi-Yang-Chi*," *T'oung Pao* 42 (1954): 6-15，中譯見劉強譯，〈「西洋記」隨筆〉，《南洋學報》10.2 (1954)：2-4。感謝陳光祖先生惠賜此一資料。

[22] 明・不著撰人，《居家必備》（明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一〇，〈洞天清錄・靉靆〉，頁 9b。

王吉民的看法，似乎越來越傾向於明代才傳入。[23] 同一年，胡懷琛 (1886-1938) 撰一短文〈眼鏡在中國〉，認為「金目」不是眼鏡，而靉靆不是今日通行的眼鏡，眼鏡在乾隆前後才通行。是否從外國傳來的，尚難確定。即使是，也不是從歐洲。[24] 即使如此，還是很多人為所謂的《洞天清錄》記載迷惑，主張眼鏡輸入始於宋代。一九三七年，勰廬〈眼鏡考〉指出：眼鏡原名靉靆，中國本無此物，乃翻譯其音以為名。眼鏡來自外國，即此可證。宋代時，靉靆由東南亞傳入。眼鏡之名，則始見於嘉靖以後。來者既多，用者亦眾，其始以玻璃為之，其後以水晶為之，閩廣產水晶之區，漸行仿造。乾隆以後，殆通行全國。[25] 一九四三年謝興堯〈漫談眼鏡〉的看法是：眼鏡一物，起始於宋，時興於明，大盛於清。至雍乾間，已遍於天下，人懷一具。其來源則始於西域胡賈，繼成於三寶太監下西洋攜回之燒玻璃人，再後則閩廣各地皆能自造，於是由洋貨變為廣貨。[26]

此外，持明代傳入之立場者亦不乏人。除前舉之裘開明外，一九三九年馮柳堂所撰之〈眼鏡考〉云：「眼鏡為中國所自有，抑為外國所輸入，此在稍作常識之研究，即知其為科學之產物，必非中國所自有。然則自何處來，何時始入中國，則以載籍缺略，難得有準確之考證。」各書所載眼鏡之始源，多根據明張靖之（即張寧）所著《方洲雜錄》。而其輸入之路，一謂來自番舶，一謂來自西域。明代眼鏡尚屬稀少，至清初猶如此，故蔣廷錫在內廷見康熙有眼鏡，為其母乞得一副。又如《紅樓夢》一書，係寫康雍間事，以賈氏如此人家，惟賈母一人有眼鏡。[27]

但峰迴路轉，宋代之說再起。一九五二年，聶崇侯於論文中指出：《淮南子・泰越篇》提到的「金目」，疑即今之眼鏡，但不足憑信；宋時已知用水晶映物，故史沆為獄官時，凡案牘紙渝墨者，以水晶承日照之，但尚沒有眼鏡。[28] 然而不知為何，數年後他說史沆「以水晶承目，照之則見」，這是眼鏡的初步發明。[29] 一九六二年，李約瑟等在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書中，綜合前人

[23] 來生，〈中國眼鏡的歷史〉，頁 1077-1107。
[24] 胡懷琛，〈眼鏡在中國〉，《逸經》9 (1936)：44-45。
[25] 勰廬，〈眼鏡考〉，《逸經》33 (1937)：77-80。
[26] 蒉公（謝興堯），〈漫談眼鏡〉，《古今》16 (1943)：23-26。
[27] 馮柳堂，〈眼鏡考〉，《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民國二十八年元月二日，〈經濟專刊〉；並載《愛目》2 (1939)：2-6。
[28] 聶崇侯，〈中國眼鏡史〉，《醫史雜誌》4.1 (1952)：11。
[29] 聶崇侯，〈中國眼鏡史考〉，《中華眼科雜誌》1958.4：239。

研究，並不贊同宋代已有眼鏡之說。[30] 一九七一年，原田淑人論中國眼鏡之起源，也認為此物自明代才傳進中國。[31] 一九八〇年前後，王錦光與洪震寰撰寫《中國古代物理學史話》，針對聶崇侯的說法加以檢驗，發現宋朝史沆的原文乃是「以水晶承日照之」，而非「承目照之」，主張眼鏡是元明時由西方傳入的。[32] 但在一九八〇年代，還是有學者持宋代已有眼鏡之說。[33] 一九九四年，洪震寰又提出新的證據，指出中國人在元代已使用自己發明的保護鏡片——鬼眼睛，至於矯正視力的眼鏡，乃是在明代由外國傳入——老花眼鏡傳入約在一四二〇年代，近視眼鏡則可能在一四八〇年代。[34]

（一）明代「靉靆」的到來

今日，眼鏡係由域外傳入，已普遍被學界所接受。根據西人 D. M. Manni 指出，西方眼鏡鏡片的磨製技術，是由葉斯依特派傳教士於十四世紀輸入中國，[35] 即大約在元代中期至明朝初年之間。中國現存資料最早提及老花眼鏡，為明中葉張寧所撰的《方洲集》。據該書記載：宣德年間 (1426-1435)，明宣宗賜禮部尚書胡濙 (1375-1463) 一副眼鏡，鏡片如銅錢大小，形色絕似雲母石，很像世上的硝子，但材質甚薄。鏡片以金鑲輪廓，而衍生出一柄，用樞紐控制末端，「合則為一，岐則為二」，有如市肆中的等子匣。老人眼睛昏花，無法看細字，張開此物，放在雙目前，字體清晰加倍大。景泰五年 (1454) 至成化元年 (1465) 間，

---

[30] Joseph Needham, Wang ling, and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t. 1,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hys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118-122.

[31] 原田淑人，〈中國に於ける眼鏡（靉靆）の起源について〉，《聖心女子大學論叢》37 (1971)：5-14。

[32] 王錦光、洪震寰，《中國古代物理學史話》（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頁 116；另參見王錦光、洪震寰，《中國光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頁 157-159。

[33] 朱晟，〈玻璃・眼鏡考及其它〉，《中國科技史料》4.2 (1983)：82-83；Eugene Chan and Winfred Mao, "The History of Spectacles in China," *Proceedings of the XXVth Congress of Ophthalmology* (Rome: May 4-10, 1986), pp. 731-734，轉引自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 63.

[34] 洪震寰，〈眼鏡在中國之發始考〉，《中國科技史料》15.1 (1994)：71-75。

[35] 黃蔭清，〈眼鏡歷史的考證〉，《中華醫史雜誌》30.2 (2000)：85。黃氏論據來自 L. Margulis, "An Optometric Detective in Search of Antique Eyewea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ptometric Association* 50 (1979): 1337-1342，筆者未見到該文，有待查證。

張寧在北京任官，曾於胡濙之子胡儼家中見到此物。成化 (1465-1487) 末年，張寧在孫景章住處又見到一副，試了也有同樣功效。據景章說，此物乃是「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為僾逮」。[36] 一副眼鏡須以良馬交換，可見其價格貴重。

胡濙獲賜眼鏡時已年過五十，而這副手持雙照金鑲眼鏡，應該是由西域貢入北京的，時間約在永樂年間或宣德初年。這副眼鏡極類似圖一，張開與收合有如等子匣。（等子匣，參見圖五）但硝子究係何物？據明人王三聘《事物考》記載，硝子是「假水晶用藥燒成者，色暗青，有氣眼，亦有白色、黃青色，但不潔白明瑩」。[37] 由此看來，硝子是礦石燒煉而成，但不晶瑩剔透。胡濙這副眼鏡，「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推測應該是玻璃材質。

另一則重要的史料，牽涉到吳寬 (1435-1504)。吳寬早年近視，晚年又患老花，其〈病目〉詩可為佐證：「吾生短視物如遮，老眼重增滿黑花。」[38] 弘治九年 (1496) 二月至十三年 (1500) 五月，屠滽 (1440-1512) 任吏部尚書期間曾送他一副眼鏡，當時吳寬任吏部右侍郎。吳寬於〈謝屠公送西域眼鏡〉詩記述，鏡片銅錢大小，潔白如雲母；又像三台星，岔開在半空中；持著靠近眼眶，蠅頭細字，明瑩有如椽筆。詩上說其價值百鎰，又說來自西域。[39] 其形制與胡濙獲得者類似，是手持的雙照眼鏡，但沒談到可以開合。前此，洪震寰根據此詩，說近視眼鏡傳入中國可能在一四八〇年代。按洪氏所言，時間稍有差池，且當時吳寬已年過六十，用後看小字都沒問題，獲贈的應是老花眼鏡而非近視眼鏡。

嘉靖 (1522-1566) 末年，郎瑛 (1487-1566)《七修續稿》談到：小時候，曾聽說地位顯赫者家裡有眼鏡，老年者觀書，小字可看大，「出西海中，虜人得而製之，以遺中國」。後來他與都指揮使霍子麒談及此物，子麒送他一枚，「質如白瑠璃，大可如錢」，紅骨鑲成二片，鏡片若圓燈，可開合而折疊。他問子麒從何而來，答說昔日在甘肅任職，「夷人貢至而得」。[40] 郎瑛係杭州府仁和縣人，

[36] 明・張寧，《方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二六，〈雜言〉，頁 579。後有人將《方洲集》的〈雜言〉單獨輯出，是為《方洲雜錄》。該段內容並見氏著，《方洲雜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頁 5a。

[37] 明・王三聘，《事物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三，〈珍寶〉，頁 106。

[38]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卷二五，〈病目〉，頁 4a。

[39]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卷二三，〈謝屠公送西域眼鏡〉，頁 1b-2a。

[40] 明・郎瑛，《七修類稿・續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六，〈事物類・眼鏡〉，頁 836。

小時候聽聞西海出眼鏡，「虜人」加以仿製，再貢入中國，後來霍子麒送他的眼鏡也是來自西域。

西域的眼鏡做為貢品，在會典中亦有記載，如萬曆《大明會典》記西域撒馬兒罕國貢物有矮納、眼鏡，天方國貢物也有眼鏡。[41] 從矮納、眼鏡分開記載看來，顯然兩者是不同的。萬曆《大明會典》又記載哈密貢物中有硝子遮眼三箇，編纂者於「硝子遮眼」之下註云：「番名矮納。」[42] 則矮納可能專指平光玻璃眼鏡。

另一方面，海路也是眼鏡傳入的途徑之一。正德年間葡萄牙人抵達東南沿海，嘉靖年間西班牙人繼之而至，西洋的許多物資（包括白銀）開始流進中國。特別是在隆慶元年 (1567)，福建巡撫塗澤民奏請於漳州府海澄縣月港開海通商，實施「船引」制度之後，中國人可以透過合法的管道獲致西洋器物，眼鏡即為其中之一。據萬曆元年 (1573) 刊行的田藝蘅 (1524-?)《留青日札》記載：

> 提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如大錢形，質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中用綾絹聯之，縛于腦後。……或聞公得自南海賈胡，必是無疑矣。[43]

這是明代資料首次提到使用者將眼鏡繫上綾絹綁在腦後，也是資料首次談到眼鏡來自南海。潮陽距離閩南的月港甚近，林大春所獲致的眼鏡應該就來自海舶，故田藝蘅說「或聞公得自南海賈胡，必是無疑矣」。這種掛耳式的眼鏡戴法，據說是西班牙和義大利的耶穌會士傳進中國的。[44]（參見圖三、圖四）

萬曆 (1573-1620) 年間，東南沿海一帶已有人開始仿製眼鏡，如張萱 (1558-1641)《疑耀》記載：「閩廣之間，有製眼鏡者，老人目翳，以懸目中，則毫髮立覩。」[45] 明末漳州府《海澄縣志》記載當地各色物產，也有靉靆一項。[46]

---

[41] 明・申時行等纂，萬曆《大明會典》（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卷一〇七，〈禮部六十五・朝貢三・西戎上〉，頁 1609-1610。

[42] 明・申時行等，萬曆《大明會典》卷一一二，〈禮部七十・給賜三・外夷下・西〉，頁 1654。

[43] 明・田藝蘅撰，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二三，〈靉靆〉，頁 448。

[44] Corson, *Fashions in Eyeglasses*, p. 33.

[45] 明・張萱，《疑耀》（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七，〈眼鏡〉，頁 4a。

[46] 明・梁兆陽修，崇禎《海澄縣志》（明崇禎六年刊本微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文人使用眼鏡之記載亦日漸增多，如松江府嘉定縣人婁堅 (1567-1631)，晚年眼睛昏花，友人惠贈眼鏡，為此賦詩誌之。[47] 福州名士徐燉 (1570-1642) 亦有〈老態〉詩提到「欲作細書憑眼鏡」。[48] 崇禎初年，嘉興府秀水縣人陳懋仁說他生平書不離手，且抄寫不節制，以致近年寫楷書昏眩，看書也費力。後在廣東獲得一枚靉靆，形狀與《方洲雜錄》所言相同，壯年目明者用之，反而昏闇傷目，不知何以如此。[49] 陳懋仁曾到過澳門，或許是在當地買到這副眼鏡。以上三則史料均未言及材質，故不知是否為玻璃眼鏡。崇禎三年 (1630)，錢謙益 (1582-1664) 的〈眼鏡篇送張七異度北上公車〉詩提到：他所用的老花眼鏡，薄如紙且極清晰，係在翰林院任職時，得自北京胡商相贈，鏡片材質是玻璃的，而鏡框則用象皮，價值頗貴。[50] 另外，晚明《南都繁會圖卷》中還畫有兩位老人戴著眼鏡。[51]（參見圖六）

崇禎年間，周清原所撰小說《西湖二集》，有一段話說道：「比如場中試官，都要中那好舉子，誰肯將不好的中出？那有眼睛的自不必說了，就是沒有眼睛的試官，免不得將那水晶眼磨擦一磨擦，吃上兩丸明目地黃丸。」[52] 由此看來，當時已經有水晶眼鏡。

（二）清代的眼鏡市場

清朝初年，屈大均 (1630-1696) 在《廣東新語》曾說：「玻璃來自海舶，西洋人以為眼鏡。」[53] 而江南若干士人已經熟悉西方造玻璃鏡的知識，錢塘諸昇

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一一，〈風土志・物產〉，頁 15a；並參見徐曉望，〈論明末清初漳州區域市場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4：30, 33。

[47] 明・婁堅，《吳歈小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六，〈友人贈眼鏡〉，頁 100。

[48] 明・徐燉，《鼇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九，〈老態〉，頁 357。

[49] 明・陳懋仁輯，《庶物異名疏》（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一四，〈器用部下・靉靆〉，頁 116。

[50] 明・錢謙益著，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九，〈眼鏡篇送張七異度北上公車〉，頁 286-287。

[51] 有學者認為老人所戴的，是無腿的夾鼻眼鏡，參見時得之，〈我國早期的眼鏡〉，頁 19。

[52] 明・周清原著，劉耀林、徐元校注，《西湖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頁 70。

[53]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一五，〈貨語・玻璃〉，頁 419。

(1617-1691) 就是一例。諸昇字日如，號曦菴，其製鏡法乃得自錢塘陳之京（字天衢）所授。[54] 由於技術高超，其名號甚至出現在小說中。清初李漁 (1611-1680) 撰《夏宜樓》，曾列舉各式西洋鏡，並談到傳教士教導中國人製造的方法，就指出諸昇是這方面的能手，得其真傳，所作顯微、焚香、端容、取火及千里諸鏡，「皆不類尋常，與西洋土著者無異」，而近視、遠視諸眼鏡更佳，得者皆珍如異寶。[55] 諸昇晚年孤獨，宜興吳貞毓 (1616-?) 同住照料，得其傳授技術，後來亦以造眼鏡餬口。康熙三十一年 (1692)，金張 (1645-?)〈贈吳元聲三首〉序就提到此事，而〈贈吳元聲三首〉之一云：「巧藝爭傳諸日如，翠琅玕變白玻璃。揩磨半出吳郎手，說向時人尚不知。」[56] 可見所製造為玻璃眼鏡。

或許因為名聞遐邇，《鏡史》的作者孫雲球，曾於康熙十一年 (1672) 春前往杭州向諸昇請教鏡學。[57] 孫雲球為蘇州府吳江縣人，約生於順治七年 (1650)，死於康熙二十年 (1681) 以後，據說年僅三十三歲。據記載，其製鏡技術得自向杭州人諸昇、桐溪俞天樞、西冷高逸上（即高雲）請教，並私淑陳天衢之學。[58] 經過融會貫通，最後製成各種西洋鏡，其中有近視鏡、昏眼鏡、童光鏡等。此外，他還製造出適合患赤火眼、不能見光的患者配戴的夕陽鏡。[59] 因此，諸昇曾言：「造鏡家，余亦閱歷數子，得其形似者十有六七，會其神理者十無二三，拈花微笑，惟孫生一人。」[60] 康熙年間，揚州如皐人范方 (1622-?) 又提到其蘇州的朋友周天行，「傳西洋法，能製各種眼鏡」，[61] 看來江南能製造眼鏡的人應該不少。

盛清時期，各大都市多有眼鏡店。乾隆年間，浙人周廣業 (1730-1798) 曾言：「靉靆始明中葉，近世盛行，通都大邑，列肆居奇，既助老眼，復便短

---

[54] 清・張若羲，〈孫文玉眼鏡法序〉，見清・孫雲球，《鏡史》（清康熙十九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頁 3a。

[55] 清・李漁撰，崔子恩校點，《覺世名言十二樓》（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夏宜樓》第二回，〈冒神仙才郎不測・斷詩句造物留情〉，頁 68-69。

[56] 清・金張，《岑老編年詩鈔》（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贈吳元聲三首并序〉，頁 687。

[57] 清・諸昇，〈鏡史小引〉，見清・孫雲球，《鏡史》，頁 1b-3a。

[58] 清・張若羲，〈孫文玉眼鏡法序〉，見清・孫雲球，《鏡史》，頁 2b-4a。

[59] 清・孫雲球，《鏡史》，頁 10a。

[60] 清・諸昇，〈鏡史小引〉，見清・孫雲球，《鏡史》，頁 2b-3a。

[61] 清・范方，《默鏡居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四，〈題周白公併似君天行小像贊〉，頁 676。

覷。」[62] 當時，在杭州城鎮之間存在一種流動販售眼鏡者。方薰 (1736-1799) 繪圖，趙知聿、李春橋等人圖說的《太平歡樂圖》，就繪及村鎮間提筐沿路叫賣荷包、眼鏡、梳子、牙刷、剔牙籤等物的小販。[63]（參見圖七）

如上所論，清初蘇州孫雲球為製造眼鏡專家，後來製造技術一直傳衍下來。據說孫雲球死後，「市坊依法製造，各處行之」。[64] 但材質已經不再是玻璃，而是水晶。由於蘇州玉工擅長琢磨珊瑚、玳瑁、玻璃等物，[65] 製造水晶眼鏡亦頗專精。嘉慶年間，蘇州眼鏡業加入珠寶、琢玉業合設的珠晶玉業公所。[66] 清人所繪《蘇州市景商業圖冊》，其中一幅畫了閶門外山塘街五人墓旁有一家益美齋水晶眼鏡舖，另一幅則畫了北寺街上有一老人戴眼鏡。（參見圖八、九）江南人甚至認為蘇州專諸巷所製水晶眼鏡是最好的，如吳江畫家迮朗 (1737-1803) 談到眼鏡說：「夫追琢之精，吳門專諸巷為最，京師所鬻皆吳工也。」[67] 而據顧震濤《吳門表隱》記載，褚三山眼鏡亦有名於世。[68]（參見圖一〇、一一）錢思元《吳門補乘》則說造眼鏡作多位於蘇州城的新郭。[69]

明朝末年，眼鏡已名列閩南名產，清初漳州漳浦亦以製水晶眼鏡著名。康熙四十五年 (1706)，楊賓 (1650-1720) 擔任福建巡撫李斯義 (1644-1707) 的幕友，欲購買水晶眼鏡，斯義因水晶產於漳浦，派人送去信函與銀兩，囑託漳浦知縣陳汝咸購置。汝咸退還銀子，自購數函交給差使，差使在中途遭遇強盜，眼鏡亦被搶去。後來汝咸得知此事，再次購買四函送上。次年正月十八日，斯義命人將這四函水晶墨晶眼鏡，送到楊賓書齋給他挑選。楊賓試了之後，各留下一副。[70] 另

---

[62] 清・周廣業，《過夏續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眼鏡〉，頁 572。

[63] 道光七年 (1827)，董棨 (1772-1844) 曾據舊圖臨摹，圖記依舊未改，現已影印出版。承蒙王振忠教授告知董棨《太平歡樂圖》相關資訊，特此誌謝！

[64] 清・宋如林、石韞玉等修纂，道光《蘇州府志》（清道光四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卷一八，〈物產〉，頁 34a。

[65] 清・雅爾哈善、傅椿修纂，乾隆《蘇州府志》（清乾隆十三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卷一二，〈物產〉，頁 17a。

[66] 孫無痕，〈專諸巷的眼鏡——兼記古代光學專家孫雲球〉，《江蘇地方志》1999.4：54。

[67] 清・迮朗，《繪事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八，〈眼鏡〉，頁 783。

[68] 清・顧震濤撰，甘蘭經等校點，《吳門表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附集〉，頁 352。

[69] 清・錢思元、孫珮輯，朱琴點校，《吳門補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二，〈物產補〉，頁 93。

[70] 清・楊賓，《楊大瓢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八日條，頁 520。

外，乾隆初年，劉埥 (1694-1768) 曾說：水晶以福建之漳浦最佳，但原石產於粵東之饒平，土人趁雨後撿取，售予漳浦之工匠，長寬盈尺大小，價僅百餘錢。而當地治石器之工匠，不分老少皆戴著眼鏡。[71] 即使石材來自饒平，但製成品還是以漳浦而出名。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八年 (1756-1763)，德福 (?-1781) 任福建布政使期間所編《閩政領要》，記述漳浦名產，亦有眼鏡一項。[72]

就像漳浦因為接近晚明通商口岸海澄縣月港，故以製造眼鏡知名，廣州也因靠近通商口岸澳門而頗擅長製造眼鏡。而且，廣州眼鏡還揚名國外，日本享保元年 (1716) 成書的《崎陽群談》第八〈中華十五省府縣等之大概〉，就記載廣東土產有眼鑑。[73] 雍正年間，范端昂《粵中見聞》亦記載粵人多以水晶為眼鏡。[74] 中國人甚至以水晶眼鏡為傲，認為其優於西洋玻璃眼鏡，如趙翼 (1727-1814) 在《陔餘叢考》談到：「此物在前明極為貴重，或頒自內府，或購之賈胡，非有力者不能得，今則遍天下矣。蓋本來自外洋，皆玻璃所製，後廣東人仿其式，以水精製成，乃更出其上也。」[75] 撇開水晶眼鏡是否較玻璃眼鏡為上這個問題不論，廣州的水晶眼鏡早已行銷四方。嘉慶末年，黃芝 (1778-1852)《粵小記》即云：廣州水晶眼鏡遍天下。[76] 另據道光《南海縣志》記載，太平門外有眼鏡街。[77] 方濬頤 (1815-1889) 亦記廣州書坊街之西有眼鏡街，「市人皆以眼鏡為業」。[78]

在清前期，閩南、江南的商船曾將眼鏡輸往日本。最早的記載為正保元年 (1644)。其中最多的幾次，乾隆十一年 (1746) 是 3,480 個，乾隆二十一年 (1756) 是 2,560 個，乾隆三十三年 (1768) 達 11,699 個，乾隆三十四年 (1769) 為 3,850 個。（參見附表一、附表二）又據《唐蛮貨物帳》與《長崎御用留》記載：日本正德元年 (1711)，長崎入港的唐船一隻，所載貨物中有鼻眼鏡 300 個，小眼鏡

---

[71] 清・劉埥，《片刻餘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二，頁 385。

[72] 清・德福，《閩政領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各屬物產〉，頁 86。

[73] 白山晰也，《眼鏡の社會史》（東京：タイヤモンド社，1990），頁 96。

[74] 清・范端昂撰，湯志岳校注，《粵中見聞》（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卷二一，〈粵中物・水晶〉，頁 246。

[75] 清・趙翼著，欒保群、呂宗力校點，《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卷三二，〈眼鏡〉，頁 581。

[76] 清・黃芝撰，林子雄點校，《粵小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卷四，頁 442-443。

[77] 清・潘尚楫、鄧士憲等修纂，道光《南海縣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卷六，〈輿地略二・都堡〉，頁 147。

[78] 清・方濬頤，《二知軒詩續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四，〈獨坐西園偶成三言一章〉，頁 60。

9,440 個。[79] 這些輸往日本的眼鏡，雖亦有可能係轉口貨物，但主體上應該是中國製造的。

北京開始出現眼鏡舖，起始時間不明。直至嘉慶末年，北京的眼鏡舖仍然不多。道光二年 (1822) 年底，朝鮮使臣徐有素 (1775-?) 奉命出使北京，隔年正月二十八日曾至王景文開設的眼鏡舖實鑑齋，舖中「積眼鏡萬計」。他說琉璃廠眼鏡店計有九家，而以王景文最為有名。[80] 至道光末年，李光庭 (1773-?) 云：「數十年前，琉璃廠眼鏡舖不過數家，今則不啻倍蓰矣。」[81] 宮中甚至也常向琉璃廠店家採買眼鏡，北京故宮現藏道光皇帝的眼鏡盒中，就留下一些類似出廠證明的單子，如：「啟明齋製，水晶眼鏡，如假包換。」又如：「洪興局，本局自製水晶眼鏡，如假包換，開設在京都琉璃廠東門路北。」[82]（參見圖一二）道光《都門紀略》推薦的水晶眼鏡名店餘潤齋、王一元，則位於琉璃廠東門略南，所賣眼鏡「邊框純厚，玳瑁勻淨」。[83] 直至清末，餘潤齋仍在琉璃廠東門路南營業。[84] 同治年間，又有記載提到萬元齋，開設在琉璃廠東門內路北。[85] 啟元齋則在琉璃廠東門路南第一家。[86] 而位於前門外西打磨廠街的三山齋眼鏡店，係同治三年 (1864) 由河北深縣、冀縣人劉、張、李三姓合資創辦。[87]

前引迮朗《繪事瑣言》曾說京師所賣眼鏡「皆吳工」。[88] 而據民初夏仁虎 (1873-1963) 記載：北京眼鏡舖的工人皆金陵籍，聚處琉璃廠，「今猶世其業」。[89] 另據民國《北京市志稿》記載眼鏡工云：「水晶產於海州，製於蘇州；

[79] 白山晰也，《眼鏡の社會史》，頁 95-96。

[80] 徐有素，《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81 冊，서울〔漢城，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癸未正月二十八日條，頁 239。關於眼鏡在朝鮮的流行，參見盧彥名，〈試論西洋眼鏡在朝鮮半島的早期傳播〉，《歷史教學》567 (2009)：81-86。

[81] 清・李光庭著，石繼昌點校，《鄉言解頤》（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四，〈物部上・雜物十事・眼鏡〉，頁 76。

[82] 毛憲民，〈清代宮廷眼鏡研究〉，頁 15。

[83] 清・楊靜亭，道光《都門紀略》（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北京：首都圖書館藏），卷上，〈都門雜記・服用〉，頁 13a。

[84] 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頁 194。

[85] 清・楊靜亭編，張琴等增補，同治《都門紀略》（揚州：廣陵書社，2003），〈都門雜記・對聯〉，頁 30-31；孫殿起，《琉璃廠小志》，頁 194。

[86] 清・楊靜亭，同治《都門紀略》，〈都門雜記・服用〉，頁 56-57。

[87] 王永斌，《北京的商業街和老字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頁 195。

[88]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3。

[89] 夏仁虎著，駢志騫整理，《舊京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卷九，〈市肆〉，頁 102。

茶晶產於山東即墨之勞山及山西渾源縣，與外蒙庫倫等處，成於北京，故北京實為製造鏡片之總匯。以與玉器作坊相近，多入玉器工會，多集於琉璃廠等處。」[90]

上海的眼鏡舖出現亦甚早，如吳良才眼鏡公司的前身澄明齋珠寶玉器號，開設於康熙五十八年 (1719)，店址在城隍廟大門前大街馬姚弄口，以經營珠寶、玉器為主，兼營天然水晶、玳瑁、茶晶眼鏡業務。到嘉慶十一年 (1806)，傳至店主吳良才手中，見到眼鏡生意要比珠寶、玉器好，於是逐步擴大眼鏡的經營，並掛出了「吳良才眼鏡店」的招牌，但店堂內「康熙五十八年，澄明齋珠寶玉器號」這塊招牌仍然掛著。吳良才的眼鏡以純自製手工為主，每副鏡架上都刻有僅半粒米大小的「吳良才制」四個字。由於做工講究，產品精良，深受顧客讚賞。[91] 據葛元煦《滬遊雜記》記載，上海的眼鏡店多集中在新北門內。[92] 晚清上海眼鏡舖開設日多，由於競爭激烈，甚至有仿冒之事。同治十一年 (1872) 七月，《申報》上有義盛祥主人刊登告白提到：「本號開在上洋新北門內直街有年，專辦真晶眼鏡，不惜工本，以圖久遠。近有無恥之徒附近開張，巧取音同字別，假冒本號招牌，擅將低貨欺騙客商。凡貴商賜顧者，須認明本號仿帖加官為記，特此佈聞。」[93]

在臺灣，眼鏡亦不難買到。原籍廣東嘉應州，後遷至臺灣中部的士人吳子光 (1819-1883)，在其所撰的〈眼鏡考〉一開頭就說：「今事佩中有質最纖最輕清，且取攜如寄，為老人觀物所必需者，惟眼鏡之功獨奇。」後文中又云「值不踰數金」，「眼鏡之用普矣」。[94] 臺南府城中也有專業修理眼鏡的工匠。光緒年間，《安平縣雜記》記載修理眼鏡司阜云：「販賣各樣眼鏡及修理舊眼鏡。」[95]

---

[90]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第 3 冊，〈貨殖志・工業二・器用・眼鏡工〉，頁 434。

[91] 王錦光、洪震寰，《中國光學史》，頁 158；陳春舫，〈話說百年南京路 (18)：三足鼎立說眼鏡〉，《上海商業》2001.12：65；和風，〈沒有創新，就沒有老字號的今天——記「吳良材」和「茂昌」〉，《上海質量》2008.4：47。

[92] 清・葛元煦，《滬遊雜記》（臺北：廣文書局，1972），卷二，〈各貨聚市〉，頁 14b。

[93]《申報》，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二日，第 6 頁，〈義盛祥告白〉。

[94] 清・吳子光，《一肚皮集》（板橋：龍文出版社，2001），卷一三，〈眼鏡考〉，頁 766-770。感謝陳光祖先生惠賜此一資料。

[95] 清・佚名，《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工業〉，頁 84。

（三）眼鏡的售價與稅率

康熙中葉，上海人葉夢珠 (1624-?) 在《閱世編》（約成書於康熙三十二年）回憶：幼時（崇禎初年）偶爾見老年人用眼鏡，但不知其價格，稍長後聽聞西洋所製者最佳，每副值銀四、五兩，「以玻璃為質，象皮為幹，非大有力者不能致」。順治以後，價格漸賤，每副值銀不過五、六錢。近年以來（康熙以降），蘇、杭之人多能製造，「遍地販賣，人人可得」，最貴者每副不過銀七、八分，甚而四、五分，亦有二、三分一副者，一般人也用得起。[96] 這是玻璃眼鏡價格走貶的一個歷程。而導致價格大跌的原因，究竟是「進口擴張」或「生產過剩」，資料缺乏，無從斷言。

康熙十四年 (1675) 秋冬，耶穌會士魯日滿 (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 在蘇州，曾幫柏應理 (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 神父買眼鏡，先付訂金銀二錢六分五釐；康熙十五年 (1676) 春季，又為柏應理神父買一副眼鏡，花了銀三錢。[97] 魯日滿為柏應理所買的眼鏡究係玻璃或水晶並不清楚，但半年內出現兩次記載，前者寫明是訂金，則後者應該是拿取時的餘款，加起來這副眼鏡是銀子五錢多。

康熙初年，孫承澤 (1592-1676) 曾談到北京有三種眼鏡，一為山東米汁燒料者，一為玻璃眼鏡，一為水晶眼鏡。燒料者甚便宜，銀子三、五分即可得。玻璃則較貴，但還是比不上水晶者，墨色水晶眼鏡更貴至銀七、八兩一副，其餘的價格依次而減。[98] 按所謂山東米汁燒料眼鏡，係由山東博山一帶米珠小爐所生產的玻璃眼鏡，[99] 其價格最低，可能品質較差。另外，劉廷璣 (?-1676) 記載眼鏡曾言：

> 黑晶者價昂難得，白晶者亦貴。惟白玻璃之佳者，不過數星。今上下、貴賤、男女無不可用，真寶物也。人人得用，竟成布帛菽粟矣。[100]

---

[96] 清・葉夢珠撰，來新夏點校，《閱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卷七，〈食貨六〉，頁 163。

[97] Noël Golvers 著，趙殿紅譯，《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河南：大象出版社，2007），頁 126, 143。

[98] 清・孫承澤，《硯山齋雜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四，〈眼鏡〉，頁 187-188。

[99] 參見干福熹等，《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發展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6），頁 204-206。

[100]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四，頁 465。

劉廷璣係鑲紅旗人，在北京居住多年，並歷任浙江、江西、淮北等地官員，與孫承澤一樣，皆死於康熙十五年。此段文字未指明地點，但據他說，價錢最貴的墨色水晶眼鏡極難購得，白色水晶眼鏡也貴，而最好的白玻璃眼鏡，僅需數兩銀子即可得。清朝初年，魏一鰲 (1613-1692) 曾以銀一錢多買了一副眼鏡。[101] 其價格不算高，材質不太可能是水晶，但到底在哪裡購買則不清楚。實際上，即使在水晶眼鏡的重要產地漳浦，其價格還是很高。康熙年間，汀州府上杭人劉坊 (1658-1713) 曾託漳浦人蔡衍鎤 (1661-?) 在當地購買水晶眼鏡，後者回信說：「水精眼鏡極貴，其價數倍於常，鼇兄左眼全無所用，但售其半可也。」[102]

水晶，為石英的一種。石英的種類甚多，無色全透明者稱為水晶。純淨的石英能夠讓一定波長的紫外線、可見光和紅外線通過；經過琢磨後，稱為白石，可製成賤價飾石（如製印章）及供光學上之應用（如製眼鏡）。煙水晶顏色煙褐，黑煙水晶顏色黑，遇熱後顏色會變淡。[103] 煙水晶即棕黃水晶，顏色有深有淺，帶有煙的味道與煙熏黃魚的顏色。中國人稱之茶晶，常用來做眼鏡。上等的眼鏡店中，常常陳列有茶晶標本，表示茶晶眼鏡是真正從水晶磨出來的。[104]（參見圖一三、一四）水晶做為一種高級的礦石，製作眼鏡所需料石更須嚴格揀選，從而與物稀為貴的定律相伴，也注定消費群侷限於某些群體或階層。

自明代以來，眼鏡是廣為流通的商品。據崇禎《北新關商稅則例》記載：眼鏡每百個抽稅銀四分。[105] 清代稅則也列有眼鏡的稅率，如康熙八年題定的《督理崇文門商稅鹽稅》記載：眼鏡一個抽稅銀六釐，[106] 即每百個抽銀六分。另雍正《北新關志》記載：眼鏡每百個抽稅銀四分。[107] 雍正《常稅則例》的分類較細，但稅率較高：水晶眼鏡每個抽銀五錢，玻璃眼鏡、西洋眼鏡每百個抽銀五

---

101 清・傅山著，張海瀛等編，《傅山全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卷四三，〈雜記十〉，頁 898。

102 清・蔡衍鎤，《操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一三，〈答劉鼇石牘〉，頁 399。

103 杜其堡，《地質礦物學大辭典》（香港：新亞書店，1956），頁 198-199；並參考《維基百科》石英條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8%8B%B1，讀取 2017.10.10)。

104 張心冶，《珠寶世界》（臺北：婦女雜誌社，1972），頁 54。

105 明・杭州北新關制訂，李志庭標點，崇禎《北新關商稅則例》（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十八・雜貨等類・後定比例貨物類〉，頁 363。

106 清・佚名，康熙《督理崇文門商稅鹽稅》（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頁 29321。

107 清・許夢閎編纂，李志庭等標點，雍正《北新關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卷一三，〈稅則・什物家伙雜貨等類〉，頁 185。

錢，土眼鏡每百個抽銀一錢。[108] 土眼鏡有可能即孫承澤所提到的米汁燒料眼鏡。在這幾種眼鏡中，水晶眼鏡的稅率，百倍於玻璃眼鏡、西洋眼鏡，而高於土眼鏡五百倍。

關稅高低與消費價格呈正比，高稅率不利於商品普及。從這個角度看，由於水晶眼鏡稅率高，其市面流通價格自然也貴；反之，西洋眼鏡與玻璃眼鏡則因關稅低而售價便宜。由於稅率低，玻璃眼鏡與西洋眼鏡大量輸入與流通，在市面上極容易購得，而且價格低廉。乾隆五十三年 (1788)，清高宗 (1711-1799)〈眼鏡〉詩就說：「眼鏡有二種，水晶與玻璃。玻璃價實廉，水晶貨居奇。」[109] 盛清以來，水晶眼鏡被視為奢侈品，並抽取高額貨物稅，按常理推斷並不利於水晶眼鏡業者。但由於玻璃眼鏡與西洋眼鏡價格低廉，本土玻璃眼鏡產業相較之下獲利空間縮小。清代雖然還是有生產低價品的眼鏡作坊，但在高價格、高獲利的心理驅使下，業者可能轉而投入水晶眼鏡生產。這或許可以解釋起初擅長製造玻璃眼鏡的蘇州眼鏡業者，為何在盛清以後逐漸轉而以製造水晶眼鏡為主。（水晶眼鏡，參見圖一五）

海關方面，西洋眼鏡、水晶眼鏡與土眼鏡的稅率差距較小，如道光十二年修《廈門志》記載，水晶眼鏡百個抽銀五錢，西洋眼鏡百個抽銀五錢，土眼鏡百個抽銀一錢。[110] 水晶眼鏡與西洋眼鏡稅率相等，而土眼鏡則為其五分之一。又據道光《粵海關志》（記載止於道光十八年）所列，番眼鏡每百箇抽銀一兩，土眼鏡則每百箇抽銀五分，[111] 兩者相差二十倍。（玻璃眼鏡，參見圖一六）

在清中葉，水晶眼鏡的價格仍然頗高。道光三年 (1823) 年正月，朝鮮使臣徐有素到琉璃廠王景文眼鏡舖選購眼鏡，與店主人有一段對話：

> 問：「貴肆所儲眼鏡中，品好者價幾何？」曰：「不過三兩銀。」又曰：「吾以不欺名聞天下，豈欺老爺哉？今諸肆中稱好品而索高價者，皆謊話也，不可信聽也。」[112]

這段對話中提到的高級眼鏡要三兩銀子，應該是水晶眼鏡。同治九年 (1870)，李

---

[108] 清・佚名，《常稅則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二，頁 432-433。

[109] 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四〇，〈眼鏡〉，頁 239。

[110] 清・周凱纂修，道光《廈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卷七，〈關賦略・海關・關稅科則・用類〉，頁 216。

[111] 清・梁廷枏，《粵海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九，〈用物〉，頁 614。

[112] 徐有素，《燕行錄》，癸未正月二十八日條，頁 239。

慈銘 (1829-1894) 在北京任職，二月十一日赴大街買眼鏡，在日記上提到：「年來鐙下看書過多，目漸昏，不能及十步之外，不得不用此物矣。」五月初五日，付了眼鏡錢一千八百文。[113] 當時，他剛過四十歲，而買的極為可能是水晶眼鏡。

三・老花、近視與配戴、配鏡法

自古以來，人類受生理制約，老年多為眼花所困擾，即老花眼 (presbyopia)。傳統中醫較早記述老花者為唐代的孫思邈 (?-682)，他在《備急千金要方・七竅病》中提到：「凡人年四十五已後，漸覺眼暗。」[114] 至於老花的成因，長期以來認為與陰陽失衡有關，金代李杲 (1180-1251) 論遠視就說：「能遠視不能近視者，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也，乃氣虛而血盛也。血盛者，陰火有餘；氣虛者，氣弱也。此老人桑榆之象也。」[115] 至明末，傅仁宇《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反其說，認為是「陰精不足，陽光有餘，病於水者，故光華發見散亂，而不能收斂近視」。[116] 順治年間，王子固《眼科百問》則說：「腎虛不能近視也，年老人多有之。」[117] 乾隆年間，黃庭鏡 (1704-?) 著《目經大成》，亦指出病因係「陰不配陽，病於水者」。[118] 依據現今醫學知識，老花的原因乃是眼睛晶狀體彈性及睫狀肌肌力下降，引起調節不足，聚焦只能拉遠，無法拉近。其臨床表現為視遠清楚，視近模糊。老花眼乃是正常生理現象，不屬於疾病，故亦無法預防，矯正的方法，就是配戴老花眼鏡。[119]

依據現今醫學知識，近視 (myopia) 的形成與遺傳有關，而生活環境也是重

---

113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桃花聖解盦日記》（臺北：文光圖書公司，1963），甲集，同治九年二月十一日，頁 2307；乙集，同治九年五月初五日，頁 2377。

114 廖品正、陸綿綿編，《中醫眼科學》（臺北：知音出版社，2001），頁 309。

115 金・李杲，《東垣醫集・東垣試效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卷五，〈眼門〉，頁 484。

116 明・傅仁宇，《傅氏眼科審視瑤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五，〈能遠怯近癥〉，頁 652。

117 廖品正、陸綿綿，《中醫眼科學》，頁 309。

118 清・黃庭鏡，《目經大成》（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卷二下，〈似因非癥・遠視〉，頁 445。

119 卓達雄編修，《視光學基礎》（中和：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07），頁 168-169；另參見健康常識網，〈老花〉(http://www.jiankangchangshi.com.cn/post/80.html，讀取 2011.03.13)。

要因素，鄉下小孩因常看遠處，故較少近視，城市小孩則相反；至於長時間近距離工作（如看書、寫字、繪畫等），更是造成近視的殺手。[120] 傳統醫家論近視，起初認為是肝氣虛所致，如隋代巢元方云：「夫目不能遠視者，由目為肝之外候，腑臟之精華，若勞傷腑臟，肝氣不足，兼受風邪，使精華之氣衰弱，故不能遠視。」[121] 金代李杲則從陰陽與血氣立論：「能近視不能遠視者，陽氣有餘，陰氣不足也，乃血虛氣盛。血虛氣盛者，皆火有餘，元氣不足。火者，元氣、穀氣、真氣之賊也。」[122] 李杲對於遠視、近視的解釋影響深遠，元明清許多醫家大多依循其說。元代醫家王海藏則提出「不能遠視，責其無火，法當補心」。[123] 明末傅仁宇《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則與李杲相反，認為是「陽不足，陰有餘，病於火少者也。無火，是以光華不能發越於遠，而拘斂近視」。[124] 乾隆年間，黃庭鏡《目經大成》沿襲其說，症因是「陽衰過陰，病於火者。火病則光華偎斂，安望繼晷傳薪？」[125]

（一）老花：四十為眼關

明朝初年，老花眼鏡已經傳入中國，但並非所有人都像胡濙、屠滽、吳寬等人那般幸運，通常是沒有眼鏡可戴。因此，史傑有詩句說「老眼昏花認字差」。[126] 秦夔 (1433-?) 也有類似的感懷：「窓前覽鏡滿頭雪，燈下讀書雙眼花。」[127] 而沈周 (1427-1509) 有老年三病詩，分別說到眼花、耳聾、齒痛，其中的〈眼花〉詩云：「俛眉作字仍虛畫，觸鼻看書反差行。」[128] 其後，隨著海路交通日盛，

[120] 廖品正、陸綿綿，《中醫眼科學》，頁 307；卓達雄，《視光學基礎》，頁 84-86；另參見高雄醫學院附設眼科，〈近視原因〉(http://www.kmuh.org.tw/www/ophthal/myopia2.htm，讀取 2011.12.28)。

[121] 隋・巢元方著，丁光迪等校注，《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1992），卷二八，〈目病諸候〉，頁 792。

[122] 金・李杲，《東垣醫集・東垣試效方》卷五，〈眼門〉，頁 484。

[123] 廖品正、陸綿綿，《中醫眼科學》，頁 306。

[124] 明・傅仁宇，《傅氏眼科審視瑤函》卷五，〈能近怯遠癥〉，頁 653。

[125] 清・黃庭鏡，《目經大成》卷二下，〈似因非癥・近視〉，頁 443。

[126] 明・史傑，《穢線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一，〈和復千戶陶舜卿〉，頁 23。

[127] 明・秦夔，《五峰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九，〈雨中有懷東黃公祿〉，頁 228。

[128] 明・沈周著，張修齡、韓星嬰點校，《石田先生詩鈔》（收入《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卷八，〈老年三病・眼花〉，頁 190。

不少士紳得以獲得眼鏡，但普及性仍然不高。入清以後，老花眼鏡越來越容易買到，而且有專著提到老花眼鏡。清朝初年，孫雲球在《鏡史》述及昏眼鏡云：「用鏡則物形雖小而微，視之自大而顯，神既不勞而自明也。」[129]

對於老花眼鏡之發明，老人自是相當感激，海寧名士陳確 (1604-1677) 在〈眼鏡頌〉中就說：「西國之寶，曰惟斯鏡，巧奪天工，妙益人性。昏者使昭，眩者使定；微者使著，遼者使徑。明德遠矣，日月與並，惠我老人，感言匪罄。」[130] 康熙末年，嘉興平湖士人沈岸登 (1650-1702) 在詩中，也談到有了眼鏡後，抄書不再感到困擾。[131]

有趣的是，蘇州褚人穫 (1625-1682) 則將眼鏡列入草堂四友之中：「書卷為益友，毛穎為健友，眼鏡為明友，草花為趣友，莫逆於心，無時不接也。」[132] 陶季 (1626-1699) 晚年，則以眼鏡與唾壺、背搔、柱杖為四友。[133] 另外，孔尚任 (1648-1718) 在《節序同風錄》曾記載八月初一「老人試鬚鬣」的特殊風俗。[134]

眼鏡也是老朋友之間互相饋贈的好物品。康熙二十八年 (1689)，廣東南海人彭演被發配至漳州，康熙三十四年 (1695) 曾寄送水晶眼鏡給順德友人陳恭尹 (1631-1700)。[135] 康熙年間，福建侯官縣人林佶 (1660-?) 亦嘗以水晶眼鏡贈送桐城士人方世舉 (1675-1759)。[136] 乾隆七年 (1742)，浙江餘姚人陳梓 (1683-1759) 收到李鍇 (1686-1755) 從四千里外的燕北盤山寄贈的墨晶眼鏡，曾賦詩報謝。[137]

一般情況下，人們在四十歲左右，眼睛即開始老花，故有所謂「四十為眼

---

129 清・孫雲球，《鏡史》，頁 1a。

130 清・陳確，《陳確集・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一五，〈眼鏡頌〉，頁 356。

131 清・沈岸登，《黑蝶齋詩鈔》（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二，〈冬日村居・眼鏡〉，頁 29。

132 清・褚人穫，《堅瓠集・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四，〈書齋各友〉，頁 71。

133 清・陶季，《舟車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八，〈得友四首〉，頁 166-167。

134 清・孔尚任，《節序同風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八月・初一〉，頁 846。

135 清・陳恭尹，《獨漉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六下，〈彭艾庵寄水晶眼鏡率筆賦謝〉，頁 94。

136 清・林佶，《樸學齋詩稿》（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一，〈以水晶眼鏡贈方扶南承以十六韻見酬因次為答〉，頁 20。

137 清・陳梓，《刪後詩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六，〈李鍊君自慶青山寄贈秘閣印色曹墨晶鏡報以詩〉，頁 164。

關」之說。對於這種困擾，年紀輕者殊難體會，正如沈蓮〈眼鏡詩〉所云：「四十曰眼關，俗語殊費解。當其至四十，目力隨時改。」[138] 康熙年間，揚州府通州生員陳世咏，四十歲開始老花，感到很不舒服，「購得西洋玻璃鏡」，眼睛才又能看清楚。從此不能沒有眼鏡，一早起來盥漱整裝之餘，就急取要戴上它。[139] 康熙三十年 (1691)，孔尚任「行年四十餘，兩眸漸覺眊」，在〈試眼鏡〉詩提到這副眼鏡，「西洋白玻璃，市自香山墺」。戴了之後，「暗窗細讀書，猶如在年少」。[140] 從許多年譜的記載，亦可印證四十歲開始老花之說，如道光十四年 (1834)，吳文鎔 (1792-1854) 四十三歲，升職順天學政，十一月出京歲試保定、深州、冀州三棚，在冀州過年。他原本眼力甚好，夏秋間病眼數月，剛痊癒不久，「晨夕披閱試卷，目力遂漸減，始用眼鏡」。[141] 另外，光緒二十四年 (1898)，張謇 (1853-1926) 四十六歲，四月十八日保和殿試散館，始用初花眼鏡。[142]

由於價格日降，乾隆末葉以降，各階層多使用老花眼鏡。杭州仁和人曹斯棟就說：「明參政孫景章以良馬向西域易得一具，在當時蓋不易得也。今則人懷一具，價亦甚廉，大率以水晶、玻璃為之。」[143] 而此在現存圖像中不乏其例，如官員、農夫、鞋匠、醫生及算命師等均有戴眼鏡者。（參見圖一七至圖二〇）

士大夫更是使用眼鏡的最大群體。（參見圖二一）乾隆三十八年 (1773)，曹庭棟 (1700-1785) 撰《老老恒言》，列舉老人必備之物，其中說到老花眼鏡云：「光分遠近，看書作字，各有其宜，以凸之高下別之」；但須是水晶眼鏡，天晴時用茶晶、墨晶，陰雨及燈下用水晶、銀晶。[144] 文人作畫，眼鏡尤不可少。[145]

---

[138] 清・馬星冀，《東泉詩話》（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卷三，〈記詩一・近代〉，頁 235。

[139] 清・王豫、阮亨輯，《淮海英靈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己集卷一，〈陳世咏・眼鏡歌〉，頁 327。

[140] 清・孔尚任著，徐振貴等輯校，《岸堂稿》（收入《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第 3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4），〈試眼鏡〉，頁 1331。

[141] 清・吳養原編，《文節府君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道光十四年，頁 195。

[142] 清・張謇，《嗇翁自訂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卷下，光緒二十四年，頁 83。

[143] 清・曹斯棟，《稗販》（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八，頁 262。

[144] 清・曹庭棟，《老老恒言》（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三，〈雜器〉，頁 290。

[145]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2-783。

而在清中葉，由於鏡片變大，使用者反而有些不便。鄭復光 (1780-?) 在《鏡鏡詮癡》談論老花鏡時曾云：舊時鏡價昂貴，故鏡式甚小，戴眼鏡看書，偶爾一看遠處，則眼珠往上注視，便超出眼鏡之外，這也算是妙用。近年晶片變薄而價格下跌，「眾皆取其大樣，以為美觀」，則差了。他並提到其姻家洪範，曾訂做一具老花眼鏡，上半平光，下半凸光，以為臨畫時之用，殊為方便。[146] 實際上，這種眼鏡的製造技術，應該是由外國傳入的。

（二）近視與近視眼鏡

明清士人患近視者，例子多不勝數。如艾南英 (1583-1646) 因患近視，進考場看不見牌上試題，必須小聲詢問傍舍考生。[147] 而馮夢龍 (1574-1646)《廣笑府》有一首〈嘲近視詩〉云：「笑君雙眼忒希奇，子立身邊問是誰。日透窗櫺拿彈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畫壁磨傷鼻，為鎖書箱夾著眉。更有一般堪笑處，吹燈燒破嘴唇皮。」[148] 近視者擔任御前經筵講官，往往失誤。據楊士聰 (1597-1648)《玉堂薈記》記載：「日講與上共憑一几，寘講章其上，以牙籤倒讀，非預誦精熟，往往致誤，短視者尤苦之。」崇禎年間，何吾騶 (1581-1651) 擔任講官，講《尚書》至「弗慮胡獲，弗為胡成」，就因近視不能終講，翌日上疏請罪。崇禎十五年 (1642) 冬，國子監司業韓四維擔任講官，「舊本短視，牙籤所指，多非其處，講未及半，偶有遺忘，不能復措一語而罷，又數日復然」，於是上疏請辭日講之職。[149]

明末清初，緣於東西方文化交流熱絡，許多西方的眼鏡型式曾出現在中國。如崇禎末年，方以智 (1611-1671) 在《通雅》記載：「西洋人製小鏡於扇角，近視者可使之遠。」[150] 這種型式的扇角眼鏡，在西方確實曾經存在。（參見圖二二）

---

[146] 清・鄭復光著，李磊譯注，《鏡鏡詮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卷四，〈述作・作眼鏡〉，頁 301。

[147] 明・艾南英，《艾千子先生全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卷首，〈前歷試卷自叙〉，頁 233。

[148] 明・馮夢龍編，馬清江校點，《廣笑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一，〈儒箴・嘲近視詩〉，頁 13。

[149] 明・楊士聰，《玉堂薈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三，頁 194。

[150] 明・方以智，《通雅》（北京：中國書店，1990），卷三四，〈器用雜用諸器〉，頁 415。《通雅》撰於崇禎十三至十四年間，後來這段內容被抄入明・張自烈原纂，清・廖文英補輯的《正字通》（康熙間刊本）卷一一中。

而此種眼鏡應該是在明末被帶到中國，方以智在崇禎年間似乎見過，而且可能是單眼，故說是小鏡。清代以前，近視眼鏡除《通雅》之外，別無其他直接記載。至清初，孫雲球《鏡史》已認知到近視的原因，與配戴近視眼鏡可以矯正：

> 凡人目不去書史，視不踰几席，更於燈燭之下，神光為火光爍奪，則能視近而不能視遠。又有非由習慣，因先天血氣不足，視象不圓滿者。用鏡則巧合其習性，視遠自明。量人目力廣隘，配鏡不爽毫釐。[151]

這段內容已點出讀書過度、燭光閃爍不定與近視之間的關係，而且提到近視亦與個別人群的先天體質相涉。以上這些病兆，都可透過配眼鏡來彌補。康熙前葉，宋正之告訴山東諸城人王鉞 (1623-1702) 說：「眼鏡帶二付，妙不可言。」[152] 隨身帶兩副眼鏡，應該是近視與老花各一。

近視眼鏡傳入之初，其型式應為單眼。乾隆年間，周廣業至北京參加會試，聽說一眼鏡店的對聯係輯《四書》文字而成，其上聯云：「吾惛，知斯二者，如用之，皆自明也」；下聯云：「或近，則有一焉，苟合矣，不亦遠乎！」上聯乃指「老眼用雙以牿鼻」，下聯則指「短視用隻以便携行」。[153] 根據此段文字，這一眼鏡店所賣的近視眼鏡為單照，或許是清初留下之對聯。

另據葉夢珠《閱世編》記載，康熙三十年 (1691) 前後，有一種西洋進口、鏡片比皮還厚的眼鏡，能使近視者看細小皆清晰，每副值銀二兩，街坊尚未有能製造者。他認為「恐再更幾年，此地巧工亦多能製，價亦日賤耳」。[154] 則當時上海尚無人能製造近視眼鏡。

由於是稀有之物，皇帝曾將近視眼鏡賜給若干大臣。如康熙三十九年 (1700)，王士禎 (1634-1711) 年六十七歲，十月初以刑部尚書參與武進士殿試讀卷。初六日晚上清聖祖秉燭御西暖閣，欽定第一甲三名、二甲前五名。是日清聖祖並垂問士禎年紀、科舉年分甚悉，又命人取西洋近視眼鏡讓他戴。[155] 黃叔琳 (1672-1756) 也是近視，雍正元年 (1723) 二月，清世宗召見他，奏對間獲知此事，特賜給近視眼鏡二副。[156] 這年他五十一歲。（參見圖二三）

---

151 清・孫雲球，《鏡史》，頁 2a。

152 清・劉翼明，《海上隨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眼鏡〉，頁 411。

153 清・周廣業，《過夏續錄》，〈眼鏡〉，頁 572。

154 清・葉夢珠，《閱世編》卷七，〈食貨六〉，頁 163。

155 清・王士禎，《居易錄》（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卷三三，頁 622。

156 清・顧鎮，《黃侍郎公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卷中，雍正元年條，頁 43-44。

在清代，近視曾經成為逃避兵役的好理由。康熙十三年 (1674)，耿精忠 (1644-1682) 在福州起兵，邵武府遴選武生從軍，眾人都怕被選上。朱師望素有膽量與機智，欣然前往報名，主事者將其登記在冊，次日赴演武堂比試射箭，師望從懷中取出眼鏡掛在鼻端，假裝做近視狀，主事者見後失笑說：「腐儒，安用之？」下令立即放出。[157] 乾隆四十年 (1775) 二月，清廷舉行武會試，驗看騎射之王大臣奏稱：考試者一百二十五人中，報近視眼者七十三人，檢驗後令二十人照常比試，其餘五十三人屬實，俱未令其騎射。清高宗看後頗為生氣，降旨說道：「馬步騎射，係旗人根本，即讀書人亦不可不學。今考試者一百二十餘人，內報近視眼者竟有七十餘人之多，明係捏報，希圖規避。滿洲習氣，竟至若此，實堪憤恨！」除不能騎射之五十三人俱令停試外，清高宗並命令：「嗣後考試人內，若有似此不能騎射者，俱著停其考試，著為例。」[158]

武生以近視而被勒令不准考試，文士則未有此例。但考試時帶上眼鏡，是必須的預備工作。乾隆初年，廣東順德士人羅天尺 (1686-1766) 北上參加會試，友人鄧彪以近視眼鏡相贈，天尺曾賦絕句二首答謝。[159] 另外，光緒九年 (1883)，《庸叟編年錄》的作者二十二歲，據編年記載：「是年因院試，伯修大兄惠近視眼鏡一付，為帶鏡之始。入場一試，清晰倍常，可感也。」[160]

除了考試之外，近視的士人在平時也多需要眼鏡協助。袁棟 (1697-1761) 三十歲以前近視，「眼鏡刻不可離，以資讀書、作字之一助」。[161] 朱鳳起也是年輕時就近視，「不能一日去眼鏡」。[162] 翁方綱 (1733-1818) 亦患近視，「一切皆需眼鏡，惟作書則去之，且能作蠅頭細楷」。[163] 乾隆末年，《揚州畫舫錄》

157 清・王琛等纂，光緒《邵武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卷三〇，〈雜記・叢談〉，頁 826。

158 清・慶桂等奉敕撰，《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卷九七七，乾隆四十年二月丁酉條，頁 14347-14348。

159 清・羅天尺，《癭暈山房詩刪》（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一二，〈計偕北上鄧炳園以近視眼鏡見餉謝以二絕〉，頁 586。

160 清・庸叟，《庸叟編年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光緒九年，頁 21。

161 清・袁棟，《書隱叢說》（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三，〈眼鏡〉，頁 442。

162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二三，〈書朱振翮遺迹〉，頁 240。

163 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三，〈翁覃溪先生臨文待詔書跋〉，頁 707。

亦記載揚州之短視者多戴眼鏡。[164] 另外，乾隆五十八年 (1793)，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出使中國，其隨員曾繪下中國人戴眼鏡的圖像，從戴者面貌年輕且無鬍鬚看來，應該是近視眼鏡。（參見圖二四）

有趣的是，吳縣汪縉 (1725-1792) 的八伯父汪元份不喜歡近視，每次遇到近視戴眼鏡者，便取笑說：「何似闚觀女郎之甚也。」[165] 偷看女子與近視，就此被聯結在一起，雖然這並非真正的原因。

清中葉，鄭復光曾見到近視者因雙眼度數不同，向眼鏡舖訂做鴛鴦眼鏡。[166] 李棠階 (1798-1865) 也是一個近視眼，咸豐四年 (1854) 在老家河南河內縣鄉居，二月十五日曾前往廟會欲購買近視眼鏡，結果是「無此物」。[167] 這時他已經五十六歲，仍需要近視眼鏡輔助。光緒五年 (1879)，殷葆誠 (1862-?) 十八歲，三月間因清明節放假，得以在家十日。由於節近清明，墳頭飄紙，他遠望五色繽紛，以為是雉雞尾巴，擬偷偷捕捉，於是低身前行，到十步之遙，才發現不是，鄉人見狀大笑，葆誠羞愧臉紅不已。後來，他應該是買了近視眼鏡。光緒十五年 (1889) 二十八歲，六月十三日參加江陰童試，十五日入城前往考院照牆看榜，但見人頭攢動，有出有入。他趕忙取出眼鏡，架在鼻樑上，看到自己名在榜上。[168] 而據晚清圖像資料顯示，士人家庭中近視戴眼鏡者頗多。（參見圖二五）

光緒二十一年 (1895)，徐潤 (1838-1911) 赴熱河督辦實業，發現當地的識字者，百人中不過六、七人，而行經口外五千里，從未見過戴眼鏡者。[169] 口外之人少戴眼鏡，或許與其廣袤的綠色大地相關，但不常看書或許也是一個因素。清朝末年，由於印刷字體日趨細小，更導致讀書人近視問題日益嚴重。光緒二十三年 (1897)，陳無我 (1880-1963)〈眼鏡說〉就提到這一問題：「眼鏡之製既多，

---

164 清・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二，〈草河錄下〉，頁 48。

165 清・汪縉，《汪子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九，〈八伯父傳〉，頁 267。

166 清・鄭復光，《鏡鏡詮癡》卷一，〈明原・原目〉，頁 59。

167 清・李棠階，《李文清公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咸豐四年二月十五日，頁 48。

168 清・殷葆誠，《追憶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光緒己卯，頁 570；光緒己丑，頁 602-604。

169 清・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食貨出版社，1977），光緒二十一年乙未條，頁 161。

而戴眼鏡之人愈眾，無論老光、近光、平光，幾於人置一付，而近視鏡尤多，大半係讀書者始有此疾，其原蓋出於看洋板印書，以致目力益損。」[170] 由此看來，晚清以降近視問題似乎更加嚴重。畢竟，傳統的刻本字較大，閱讀起來舒服，而清末以降，不論是石印或鉛印，其文字與字距均已大幅縮小，閱讀時眼睛更加吃力，近視即越來越多。宣統年間，全昌金鋼鑽號的一則廣告也指出：

> 西人目力素佳，患近視者百人中祇三人。華人近視者，百分中得二十人。其故由于喜看石印細字書，而燈光如豆大，足以逼小瞳人。設不早備眼鏡以護目力，將來愈老愈近，必有不堪設想之一日。[171]

另外，也有人指出桌案設計與近視的關係：

> 國人之目多近視，文儒尤多，譽之者謂伏案功深之證。亦實以案為平面，朝夕俯觀，頭低背傴而有以養成之，非若西人所用之案為斜面，可端坐讀書，目與案之距離為均等也。[172]

以上這些觀點，或許均有其道理。包天笑 (1876-1973) 年幼時，在昏暗的東書房與廁所中看石印的小字書以致近視，字小與光線不足是致病的重要原因之一。[173] 而由於中國近視比例高，曾被德國人譏笑是「戴眼鏡」的民族。[174] 比較特別的是，有人認為近視與種族有關：「東亞人種之近視眼較西洋為多，以東亞國古種族舊也。加以近世事物之多，而東亞人之執業處事，又不知調護之法，近視眼之進步，其度更速。」[175] 但這個觀點或許倒果為因。本文一開始曾提到的雷茂盛醫生，二十世紀初在天津等處從事眼科醫療，特別談到中國人近視之嚴重：「中國在過去和現在，仍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幾乎處於近視的狀態，戴眼鏡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配近視眼鏡。」他並認為：食物攝取中缺乏維生素 A，可能是中國近視高於西方的重要原因，而過度專注於書寫與閱讀又是造成眼睛疲勞的一大

---

170 載《遊戲報》154 號，光緒丁酉十一月初一日 (1897.11.24)，第 1 版；又載《寓言報》211 號，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1901.10.01)，第 1-2 版，〈勸人勿戴眼鏡說〉；後收入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上海：大東書局，1928），下冊，〈眼鏡說〉，頁 226-227。

171 清・環球社編輯部，《圖畫日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 2 號第 12 頁，〈全昌金鋼鑽號新創備險眼鏡〉。

172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第 4 冊，〈譏諷類・無遠慮有近憂〉，頁 1718。

173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頁 40-42。

174 佚名，〈「戴眼鏡」的民族〉，《北大廣東同鄉會年刊》4 (1930)：186。

175 徐珂，《清稗類鈔》第 8 冊，〈疾病類・眼病〉，頁 3535-3536。

因素。另外，玻璃窗與合適桌椅的缺乏，也為工作上視力帶來損害。[176]

（三）配戴：從耳繩到鏡腳

從現存少數記載看來，明代的眼鏡已是雙照，如宣宗賜給胡濙的眼鏡雖係柄持，吳寬獲贈的眼鏡也是以手持照，但包括郎瑛所得到的眼鏡在內，均是雙照而非單照。至於田藝蘅提到的林大春，其眼鏡已架在鼻樑上，再綁上絲絹繫在腦後。清代使用者所戴的眼鏡，是繫上絲線，勾掛在耳朵上。即使近視眼鏡傳入，其使用方式不變。

關於這樣的配戴方式，在清人詩文中不難見到。康熙六十一年 (1722)，宗室文昭 (1681-1732) 所賦〈眼鏡〉詩，就有「挂耳紅絛墜古錢」之句，[177] 顯見文昭的眼鏡以絲線繫銅錢，用時掛在耳朵上。乾隆年間，江都文人方本近視，離不開眼鏡，「有二小玉垂耳後」；言談間興高采烈，「則耳後玉搖」。[178] 蘇州吳江畢沅 (1730-1797) 墓出土的老花眼鏡，就是這種型式。（參見圖二六）另外，嘉慶初年，迮朗談到眼鏡，說鏡框材質有銀邊、角邊之殊，又有以馬尾鬚結為邊，及剪皮為邊再上黑漆者。鏡橋也有數種，「或中連而不斷，或中斷而紐連，線穿邊以鉤耳，或晶墜、玉墜以垂於耳後」。[179]（參見圖二七）

眼睛與耳朵的這一層關係，許多文人常常提到，江昱 (1706-1775) 的〈墨晶眼鏡歌〉詩就提到：「嗚呼目根與耳關，神明制器乃能同。」[180] 正如趙翼〈初用眼鏡〉詩所云：「長繩雙耳繫，橫橋一鼻跨。」[181] 然而，由於絲線並無支撐力，故鼻樑的負擔甚重，且耳朵也很不舒服。乾隆年間，張若瀛〈詠眼鏡〉詩云：「終日耳邊拉短縴，何時鼻上卸長枷。」[182] 幽默地傳達出使用者的痛苦。

---

[176] Alan Macfarlane and Gerry Martin 著，黃世毅譯，《玻璃如何改變世界》（臺北：商周出版公司，2006），頁 189-199。

[177] 清・文昭，《紫幢軒詩集・飛騰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下，〈眼鏡〉，頁 224。

[178] 錢祥保、桂邦傑等修纂，民國《續修江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卷三〇，〈雜錄〉，頁 1945。

[179]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3。

[180] 清・江昱，《松泉詩集・香山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卷一，〈墨晶眼鏡歌〉，頁 179。

[181] 清・趙翼撰，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一〇，〈初用眼鏡〉，頁 186。

[182] 清・袁枚著，王英志校點，《隨園詩話補遺》（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卷五，頁 657。

另外，嘉慶初年迮朗亦言：「余聞明代人近視者，止用一眼之鏡，蓄於袖中，有需用處取出一照，否則藏之，未有如今人之從朝至暮雙雙罩眼，以至耳廓生痕、鼻端成繭者也。」[183] 而一旦可以不戴，即有如釋重負的感覺。袁枚 (1716-1798) 五十歲開始戴眼鏡，戴了三十年，偶然間拿掉，視力轉覺清朗，於是不再戴，並作〈別眼鏡詩〉云：「從此鼻端兼耳畔，永無牽挂累餘生。」[184]

嘉道年間，鄭復光遊廣州時，曾見當地有所謂「雙副鏡」，其方法是在眼鏡兩旁用樞軸安加一副眼鏡，用時合上重疊，不用時打開置於兩旁太陽穴處。後來形式更加小巧方便。由此，帶眼鏡一副而具備兩副之用。缺點是壓迫鼻樑，故不可久用。這一方法，不但老花、近視眼鏡皆可通用，亦頗方便。[185] 如是看來，廣州眼鏡業者似乎不斷推陳出新。

眼鏡使用者，通常有特殊需要。路德 (1785-1851) 就指出，眼鏡係為看書、作字、女工、匠作及近視者而設。[186] 清中葉，中國眼鏡的鏡框與鏡片越來越大。[187] 由於以繩掛於耳上，眼鏡的固定性不佳，鏡片常碰到眼睫毛，以致影響視物。後來，製鏡匠乃在聯結兩鏡片的拱形樑中間添加額托裝置，使鏡片與眼鏡保持一定距離，增加其穩定度。[188]（參見圖二八至三〇）中國眼鏡出現額托，應在嘉慶以後。畢沅的老花眼鏡，就沒有這種裝置。

而在十九世紀初中國人發明額托之前，大約在西元一七二七至三〇年間，英國人 Edward Scarlett 發明了有腳的鬢角眼鏡 (temple spectacles)；有人認為其出現應該更早，可以上溯至一七〇二年。此後，鬢角眼鏡傳往日耳曼、法國及西班牙等地。（參見圖三一）早期鬢角眼鏡的鏡腳多用鐵，一七八一至八九年間，銀邊暨銀腳的鬢角眼鏡出現在法國，但其普及則要到十九世紀。[189] 一八二〇年代以後，又出現折腳的鬢角眼鏡 (turnpin temple spectacles)。[190]（參見圖三二）

---

[183]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3。

[184] 清・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三六，〈余五十歲用眼鏡今八十矣偶爾去之轉覺清朗作別眼鏡詩〉，頁 1030。

[185] 清・鄭復光，《鏡鏡詮癡》卷四，〈述作・作眼鏡〉，頁 303-304。

[186] 清・路德，《椶華館全集・椶華館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答劉監泉廉訪源灝問養目法書・最忌者□□事・不帶眼鏡說〉，頁 599。

[187] 清・鄭復光，《鏡鏡詮癡》卷四，〈述作・作眼鏡〉，頁 301。

[188]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4），頁 36。

[189] Corson, *Fashions in Eyeglasses*, pp. 69-78.

[190] Corson, *Fashions in Eyeglasses*, pp. 120-140, 166-187.

有腳的眼鏡何時傳入中國，其具體時間不明。而從圖像資料推斷，澳門可能是較早使用的地方。一八二七年，英國醫生郭雷樞 (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1796-1879) 在澳門開業，專看眼科。一八三三年，英國畫家錢納利 (George Chinnery, 1774-1852) 曾繪《郭雷樞醫生治病圖》，畫中的女患者戴的是西洋風格的鬢角眼鏡。[191]（參見圖三三）不過，這種鬢角眼鏡在內地並未普及。一八三六年，英國駐華商務監督 Davis 出版《中國》(*China*) 一書，書上所附眼鏡圖仍無腳。（參見圖三四）一八四〇年，法國公使 T. de Lagrené (1800-1862) 的隨員 Melchoir Yvan (1803-1873) 在廣州城中，見到一位藥材商人戴著玳瑁眼鏡，鏡片是無色水晶製成，同瓶底一樣大。眼鏡由兩條線連著，架在鼻子上，線的末端都有一小塊翡翠或鉛塊，放在耳朵後面。[192]

中國的水晶眼鏡業者為了與西洋有腳的眼鏡競爭，應該在五口通商以後即開始仿製鬢角眼鏡。咸豐年間，鬢角眼鏡在珠江三角洲已不難見到。一八六〇年代初，Milton Miller 在廣東拍攝到官員戴鬢角眼鏡，看起來就是中國風格。同一時期，香港下階層婦女戴的眼鏡依然沒有腳，綁住眼鏡的細線是套在腦後。（參見圖三五、三六）一八七〇年代初，John Thomson (1837-1921) 在北京拍到的官員照片，鬢角眼鏡的鏡框也是中國風格；另外，他在廣州拍攝到一位老先生戴著土產眼鏡，鏡框比他們英國曾祖父輩用的眼鏡還要沉重，鏡片則是用優質的水晶製成。[193] 但在九江，有算命先生猶戴著舊式的掛耳無腳眼鏡。（參見圖三七至三九）一八八二年前後，Archibald Ross Colquhoun (1848-1914) 在廣州見到的畫匠與算命師也還戴著掛耳的眼鏡，而在雲南開化府則一位教師已經戴鬢角眼鏡。（參見圖四〇至四二）這反映了新舊產品使用的交叉與並存，無腳眼鏡猶為消費能力弱的群眾所使用，而高價鬢角眼鏡的消費圈正慢慢形成中。無腳的舊式眼鏡，或許一直持續至清末才停止使用。

筆者遍查相關圖錄，發現晚清土產的鬢角眼鏡，存世者泰半為折腳，直腳者極少，或許當時主要係仿製折腳鬢角眼鏡，而其鏡框與鏡腳的材質有玳瑁的。（參見圖四三）光緒初年，衛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提到：外

---

[191] 香港歷史博物館編，《東方印象：錢納利繪畫展》（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2005），頁 108, 204。

[192]（法）伊凡著，張小貴、楊向豔譯，《廣州城內——法國公使隨員 1840 年代廣州見聞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頁 52。

[193] John Thomson,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An Unabridged Reprint of the Classic 1873/4 Work*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2), vol. 1, plate 11.

國的眼鏡樣式，逐漸替代舊的掛耳，但中國人還是偏愛水晶鏡片。[194] 光緒八年(1882)，李杕 (1840-1911) 主編之《益聞錄》有〈眼鏡考〉一文提到：

> 愚少時見有摺疊鏡，以綫懸耳；後加以小柱子，抵于額，其形頗陋，然搖撼之不動，故父老皆喜用之；又後則有銅邊與無邊鏡，均用二足夾于首，而不復可摺疊。[195]

李杕為川沙人，小時候看到的是無腳舊式眼鏡，後來有了額托，更為方便；接著仿製的鬢角眼鏡出現。另外，包天笑十歲時，即光緒十年 (1884)，在蘇州穿珠巷配近視水晶眼鏡，花了墨西哥洋銀一圓。當時，外國貨的眼鏡還未流行到蘇州，而他配的中式折腳眼鏡，已經略帶腰子形狀，只是邊腳仍是玳瑁材質。當時玳瑁邊腰圓式眼鏡，分為新舊兩式，舊式仍是二分闊邊，取折腳的形式；新式是一種線邊，不取折腳形式，俗稱一根蔥。可是，這種玳瑁邊腰圓式眼鏡，許多老先生認為輕佻，不願意戴。他們喜歡戴那種舊的大圓眼鏡。[196]

比較特別的是，晚清華人戴鬢角眼鏡多習慣呈 45 度角。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五月二十二日的《倫敦新聞畫報》，畫了一場廣州街頭的洋人叫賣會，洋人助手中有一位年輕人，鬢角眼鏡戴法與洋商不同。（參見圖四四）一八五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的《倫敦新聞畫報》上所畫廣州中醫的戴鬢角眼鏡法類似。[197] 迄至一九〇〇年，廣東一位牙醫的戴法也是如此。（參見圖四五）清末民初在天津執業的眼科醫生雷茂盛，還曾特別提到這一現象。[198]（參見圖四六）

（四）十二支配鏡法

長期以來，中國市面上的眼鏡，皆是工匠先行製好，分為十二或二十四種度數，顧客上門選擇適合者。清朝初年，孫雲球曾將昏花鏡、近視鏡、童光鏡各磨

---

194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3), vol. 2, p. 22.

195 清・李杕主編，《益聞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第 161 期，〈眼鏡考〉，頁 164。

196 天笑生，〈我之眼鏡歷史〉，《世界畫報》32 (1922)：20-21；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 43。

197 黃時鑒編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中國圖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8），頁 176；沈弘編譯，《《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晚清 1842-1873》（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中冊，頁 379。

198 Rasmussen, *Old Chinese Spectacles*, p. 30.

製二十四種度數，合計為七十二種。他之所以如此做，乃為了讓顧客「隨目配鏡」，提供二十四種選擇，使其試戴出適合的度數。[199] 清朝初年，孫雲球在《鏡史》記載昏眼鏡提到：「量人年歲多寡，參之目力昏明，隨目置鏡，各得其宜。」[200] 這是他本人貼心之處。而市面上普遍提供的，都是十二種度數，如張璐 (1617-1699)《張氏醫通》指出：

> 西洋玻璃眼鏡，人但知宜於老人，不知原為望氣者而設。其最精者，咸以十二鏡，編十二支為一套。無論老少，其間必有一者能察秋毫。則知人眼有十二種偏勝，故造眼鏡者亦以十二等鉛料配之，取鉛以助陰精、料以助陽氣也。少年血氣本旺，原無藉此，若鉛料之輕重，與眼之偏勝不相當，則得之反加障礙矣。老人氣血皆衰，但借此以籠住其光，不使散漫，不必論其鉛料之孰重孰輕也。[201]

張璐為蘇州長洲人，在其行醫的年代，江南一帶玻璃眼鏡盛行，故得悉賣眼鏡者以十二種度數的鏡片供人選購。在這段文字中，其解釋玻璃鏡片純以陰陽、血氣的角度立論，又言玻璃鏡片所含的鉛、料，可補老人陰精與陽氣之不足，當中也提到鏡片鉛、料成分之多寡，與眼睛度數之間的關連。其所論雖未必與現今醫學知識相符，但可以了解當時對此的一種認知。

以十二種固定度數搭售的方式，對眼病患者僅具有參照作用，無法完全符合使用者的確切需求。康熙初年，太原名士傅山 (1607-1684) 配過數副眼鏡皆不合用，偶然間於道臺魏一鰲處，發現其眼鏡的度數與自己眼睛相合。傅山本想向他買，又恐他不賣，故未曾開口。[202] 這種度數不合的困擾，應該不只發生在傅山一個人身上。不過，市場上所提供的選擇僅只如此而已。劉廷璣在《在園雜志》提到的眼鏡業者，也是「按其年歲，以十二時相配合」。[203] 康熙年間，山東士人成芸對此已經很滿足，曾在《珠船錄》上說：西洋奇器「最便於用者，尤在眼鏡，昏者使之明，小者使之大，近者使之遠，且能按其年歲，以十二支配合，用之無差誤者」。[204] 雍正朝宮中檔案所記，眼鏡片的度數也是以十二個時辰做為

---

199 孫承晟，〈明清之際西方光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頁 367。

200 清・孫雲球，《鏡史》，頁 1a。

201 清・張璐，《張氏醫通》（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八，〈七竅門・目妄見〉，頁 345。

202 清・傅山，《傅山全書》卷四三，〈雜記十〉，頁 898。

203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卷四，頁 465。

204 清・成芸，《雪巖五種・珠船錄》（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頁 260。

區別。[205] 嘉慶初年，迮朗《繪事瑣言》談到眼鏡：

> 遠光、近光，玻瓈、水精，制各不同，用亦迥殊。中微凹為近視鏡，視愈近則凹愈深。中微凸為老花鏡，亦為顯微鏡。眼花愈老，則凸愈厚。凹者，所以斂而使之小也。凸者，所以拓而使之大也。不凹不凸為平光，即為養目鏡。總以十二辰為差，寅卯為最老，亥午為中，申酉為最少。[206]

嘉慶二十四年 (1819)，學秋氏詠道：「近視人人戴眼鏡，鋪中深淺製分門。」[207] 可見眼鏡鋪按度數深淺製為成品分別擺列。道光末年，李光庭則提到北京眼鏡鋪所製眼鏡，「以十二辰編號，從亥逆數，由淺入深」。[208] 迮朗與李光庭的說法互異，或許各地做法有所不同。另據眼鏡收藏家指出：清代開設於上海小東門的澄明齋珠寶玉器號（即吳良才眼鏡店），內設驗光配鏡，以「對光牌」做為驗光工具。對光牌是以天干地支作出凸凹透鏡分類，以及光度深淺排列等級，據此給顧客進行度數測定。這種驗光法，源出於孫雲球的「隨目配鏡」法。[209]

眾所皆知，眼睛隨著年齡增長，度數不斷變化，眼鏡常必須更換。康熙四十一年 (1702)，徐豫貞 (1642-?)〈老來〉詩詩註就說：「眼與鏡相對則明，眼益昏則治鏡之法異，約閱十年須一換也。」[210] 有些人老花的速度快，如戴震 (1724-1777) 屢次更換眼鏡，最後至乾隆四十二年 (1777)，賣眼鏡的跟他說：「此老光之最者，過此無可換矣。」[211] 阮元 (1764-1849) 約五十初開始戴眼鏡，前後十餘年，水晶眼鏡一再更換，至道光九年 (1829) 六十六歲，已用了七十歲老光。[212] 而曾國藩 (1811-1872) 在給友人的信上說：「年甫六十，精力已極衰憊，兩目近益蒙翳，雖於老花之上又復加光，而看字仍如隔霧。」[213]

---

[205] 于善浦，〈雍正帝的喜好〉，《紫禁城》1989.4：13。

[206]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2-783。

[207] 清・學秋氏，《續都門竹枝詞》（收入路工編選，《清代北京竹枝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頁 64。

[208] 清・李光庭，《鄉言解頤》卷四，〈物部上・雜物十事・眼鏡〉，頁 76。

[209]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65。

[210] 清・徐豫貞，《逃莽詩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九，〈老來〉，頁 189。

[211] 清・段玉裁編，《戴東原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條，頁 655。

[212] 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九，〈秋祭東園齋居時四十韻〉，頁 1162。

[213]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三二，〈復陳虎臣〉，頁 684。

晚清名士俞樾 (1821-1907) 是輕度近視，晚年仍有老花問題，他在八十二歲所撰自述詩的詩註說：「短視者例不昏花，余短視不深，故昏花仍所不免。今年買昏鏡試戴之，似視物較清。昏鏡有深淺，余所用者猶六十花也。」[214] 實際上，有一個問題常困擾著近視者，即開始老花時幾乎無法看書寫字。光緒二十四年 (1898)，《格致新報》上有人問解決的辦法：「素來近視用近光鏡，遠視用遠光鏡，本無不合，惟近視將變為遠視，用近光鏡視遠則可，視近則茫然，難于書寫。不知能有法可得對光鏡否？」答者稱：

> 近視因眼睛罩過於凸出，故用凹鏡以濟之。近視將變為遠視，則其罩不甚凸，仍戴舊鏡，自然難於書寫。故平光之人，如戴凹鏡，視遠尚明，視近則茫然。欲求對光，能有數法，一調換其鏡，二或去其鏡，三或將其鏡半為近光、半為遠光。至妥之法，即至名醫處，懇其代覓一對光鏡。然華醫素不講求此道，不如配以稍淺之近光鏡，或視近則除去其鏡。[215]

解答者提供三種辦法，一者換眼鏡，二者摘掉眼鏡，三者訂製一副半看近、半看遠的特殊眼鏡。但要找到好的眼科醫生，配到合適的眼鏡並不容易，麻煩還是難以解決。在此情況下，有老先生看書，眼睛戴著眼鏡，手裡還拿著放大鏡一起使用。（參見圖四七）

四・使用的禮儀、思維與心態

就使用者的角度而言，眼鏡與其產生許多聯繫，而眼鏡盒是不可或缺的一環。早期的眼鏡盒，為了契合持柄的部分，其造型應該較為特殊，惜目前未能獲見。後來不再使用柄持，而改為繫耳，其造型又有變化，通常為瓠形、圓形或橢圓形。清代後期出現固定架橋與鏡腳，長形眼鏡盒才隨之增多。（參見圖四八至五二）

清代諸帝當中，康熙帝晚年是否戴眼鏡，不得而知。雍正帝則特別喜愛眼鏡，自己也常配戴眼鏡。乾隆時期，因高宗並不戴眼鏡，因此清宮這段期間竟無下旨製造眼鏡之記錄。至於嘉慶、道光二帝的態度，與乾隆帝正好相反，是極力

---

[214] 清・俞樾，《春在堂全書・曲園自述詩》（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頁 5785。

[215] 清・格致新報編，《格致新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第 7 冊，光緒二十四年閏三月二十一日，〈第五十三問〉（青浦竹林居士），頁 9a-b。

推崇，津津樂道。清朝諸帝的眼鏡，多半來自西洋人進獻，和王公大臣及粵海關官員的上貢，以及清宮總管內務府在京城古玩市場購買，或清宮內務府養心殿造辦處製作等。其鏡片有水晶、茶晶、墨晶及玻璃之分，一般均為圓形或橢圓形。鏡框有金、銀、銅、骨、牙、玳瑁、牛角、黑漆木描金花及絲繩等，所謂絲繩即在眼鏡兩邊安絲繩，繫繞在兩耳或兩側帽沿上。眼鏡盒的材質，有綠鯊魚皮套、絲綢、綀絲及錦緞質套，還有紫檀木盒、錦盒、絨盒、漆盒等。[216] 另外，有些使用者以錦袋裝眼鏡或眼鏡盒。（參見圖五三）康熙六十一年，宗室文昭四十二歲，曾賦〈眼鏡〉詩，其中提到「繫腰錦袋盛圓盒」。[217] 顯見文昭的眼鏡有圓盒裝著，再放入錦袋中掛在腰際。

值得注意的是，眼鏡盒做為士大夫文化的一環，具有藝術性與區隔性。嘉慶初年，迮朗曾經談到：若要攜帶眼鏡遠行，鏡匣有黑漆、鯊魚皮、褚繡、五色緞等幾種。[218] 一般而言，清代眼鏡店均提供眼鏡盒，但士大夫常另製更為高雅或具有「文人味」的眼鏡盒，從而使其擁有的眼鏡盒更具獨特性，以與市面上的眼鏡盒相區隔。（參見圖五四、五五）另一方面，許多女性亦需要眼鏡，但記載相對稀少。不過，可以印證的是，有些上階層婦女所用的眼鏡盒也相當雅致。（參見圖五六）

（一）戴眼鏡的禮儀

清代社會使用眼鏡，牽涉到場合與對象。官員在御駕之前，就有不許戴眼鏡的不成文規定。早朝之時，百官亦不准戴眼鏡。乾隆年間，黃登賢 (1709-1776) 陞任太常寺卿，某日朝會剛要退朝，他因有近視，不知聖駕猶未起，即於朝班後坐下，為此遭到論處，吏部議奏將其革職，後奉旨得以留任。[219] 由此可見，他在朝會時並未戴眼鏡。但有畫師曾特別被允許戴眼鏡。如繆炳泰 (1744-1807) 擅長寫真，「妍媸少長，無不宛肖」。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客居杭州，大學士阿桂 (1717-1797) 奉命至浙江，見到他後頗為贊賞，於是帶他北上，並向清高宗奏

[216] 毛憲民，〈故宮珍藏的眼鏡〉，頁 32-34；毛憲民，〈清代宮廷眼鏡研究〉，頁 13-19；郭福祥，〈乾隆與眼鏡〉，頁 19-22；侯皓之，〈佩察秋毫細〉，頁 52-60。

[217] 清・文昭，《紫幢軒詩集・飛騰集》卷下，〈眼鏡〉，頁 224。

[218]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3。

[219]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三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提督山東學政忍廬黃公墓誌銘〉，頁 69。

報此事。次年 (1783)，炳泰捐納為國子監生，二月奉命為清高宗畫像，「以短視，許戴眼鏡」。[220]

至於官員上任引見，或因其他事召見，均不許戴眼鏡。包天笑就談到其友人祖上曾當大官，卻是高度近視。某日，在便殿召見，皇帝東向而坐，對面安座一面大穿衣鏡屏風，他因近視看不清，糊里糊塗向大穿衣鏡下跪。太監看了，掩口而笑，將他拉過來，說道：「皇上在這裏。」[221] 另外，左宗棠 (1812-1885) 平定新疆後返京，初春某日，慈安太后 (1837-1881) 召見群臣。按朝廷規矩，臣下朝見皇帝不得戴眼鏡，左宗棠患有眼疾，以致兩眼流淚。太后詢知他平日戴墨晶眼鏡，於是命他戴上。不料在取鏡時，眼鏡不小心掉在地上摔碎。太后即將咸豐皇帝所用黑色平光眼鏡，賜給左宗棠配戴，用以遮蔽風日。[222] 外國使節覲見皇帝，也必須依照中國習慣行事。何天爵 (Holcombe Chester, 1844-1912) 在《真正的中國佬》(*Real Chinaman*) 一書就談到：美國有位代表是高度近視，摘掉眼鏡便成盲人。中國官員說：按照中國人的禮儀，在皇帝面前戴眼鏡實屬不宜，故要求這位代表晉見皇帝時把眼鏡放在家裏，於是他祇能由另一同事牽著胳膊進宮拜見。[223]

在皇帝面前戴眼鏡，可能涉及藐視，故官員不敢戴，而下級官員晉見上司亦然。光緒末年，吳趼人 (1867-1910)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說：「官場的臭規矩，見了上司是不能戴眼鏡的。」[224] 實際上，清代在君上、高官、長輩和神道之前，都不可戴眼鏡，以示尊敬；即在朋友面前，若要表示客氣，也不應戴眼鏡。一位有目力缺憾的知縣，某日去晉見兩江總督，因為除去眼鏡，幾乎如同眼瞎，就在總督面前一百多碼處跪下，在方磚上磕頭。旁人告訴他，應該再走九十碼再磕頭。知縣方向走偏差，在距總督十碼處又再下跪，但全堂哄堂大笑，原來他朝一位受審的匪徒磕頭。[225] 由此引申，百姓晉見官員，乃是以下對上，應

[220] 清・董沛，《正誼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一五，〈奉政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繆君墓碣銘〉，頁 349。

[221]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 43。

[222] 王庭顯，《左宗棠的幼年、青年和中年》（上海：燎原印刷廠，1991），頁 126。

[223] Holcombe Chester 著，鞠方安譯，《真正的中國佬》（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頁 197。

[224] 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臺北：世界書局，1959），第二一回，〈作引線官場通賭棍・嗔直言巡撫報黃堂〉，頁 79。

[225] 原見上海英文《大美晚報》1935 年 9 月 19 日袁仁倫的文章，轉引自來生，〈中國眼鏡的歷史〉，頁 1086-1087。

該也不能戴眼鏡。換言之，相見時仍可戴著眼鏡者，必是尊長之流。辛亥革命以後，北京這一禮儀才改，唯在總統府尚存舊習，見總統仍需除去眼鏡。[226] 但在地方上，曾有記者在縣官面前未摘眼鏡而被處罰。[227]

這種戴眼鏡的文化，與外國不同，因此張德彝 (1847-1918) 出使法國時，在日記上曾提到：「不論男女老幼之雙眸，短視者皆公然高懸眼鏡，街行遇人，不有摘去之禮。」[228] 而張蔭桓 (1837-1900) 出使美國，日記上也有類似記載：「華人見客以摘眼鏡為敬，西人見客以摘眼鏡為慢，意謂不願見此人，故不加鏡相視。雖臣民見君主，短視者皆帶眼鏡，中西殊制，此其小焉。」[229]

（二）水晶眼鏡清目之說

清代社會上有玻璃眼鏡損目、水晶眼鏡養目之說。水晶眼鏡養目之說，係有人以中醫陰陽五行理論，認為眼睛是肝臟在身體表面的開竅之處，肝臟與眼睛皆屬木，木能生火，故火使眼變黃變紅。水能剋火，水能生木，水晶為至陰至涼的水之精，因此可養目除火。[230]

清朝初年，玻璃眼鏡損目之說還未盛行。康熙年間，清聖祖曾以玻璃眼鏡賜給大臣，如康熙四十二年 (1703) 五月初一日賜查慎行 (1650-1727) 玻璃眼鏡。[231] 雍正年間，清世宗所用雖以水晶眼鏡為主，但也下旨製造玻璃眼鏡備賞，如雍正十二年 (1734)，養心殿造辦處眼鏡作奉旨造六十歲、七十歲玻璃眼鏡各一副；雍正十三年 (1735)，眼鏡作奉旨造六十歲玻璃眼鏡二副。[232]（參見圖五七）由此可見，上位者對玻璃眼鏡似還沒有太大的「敵意」，否則不會將其賜給大臣。

玻璃眼鏡有害之說，其具體出現時間不明，但在十八世紀後半相當流行。乾

---

226 馬敘倫，《石屋續瀋》（上海：建文書店，1949），〈官場陋習〉，頁 35；平人，〈眼鏡與禮節・民三四年間的趣史〉，《立報》，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第 2 張。

227 來生，〈中國眼鏡的歷史〉，頁 1086。

228 清・張德彝，《三述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五，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條，頁 221。

229 清・張蔭桓，《三洲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四，光緒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條，頁 415。

230 佚名，〈中醫五行說——水晶眼鏡清除眼火〉，《中國眼鏡科技雜誌》1995.2：64。

231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二九，〈謝賜玻瓈眼鏡二首〉，頁 385-386。

232 朱家溍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雍正十二年・眼鏡作〉，頁 280；〈雍正十三年・眼鏡作〉，頁 291。

隆三十八年，曹庭棟在《老老恒言》就叮嚀使用者說玻璃眼鏡損目，選用以水晶眼鏡為佳。[233] 乾隆四十六年 (1781)，清高宗〈眼鏡〉詩云：「玻瓈者過燥，水晶溫其性。」[234] 乾隆五十三年，其〈眼鏡〉詩又提到：「水晶雖艱致，用之無害滋。玻璃出冶鍊，薰蒸火氣貽。」[235] 在他認為，水晶眼鏡雖然很難買到，但若要用的話，還是它比較好。乾隆五十六年 (1791)，〈賦得眼鏡〉詩詩註又言：「眼鏡多以玻璃為之，近更以水晶者為貴，以玻璃出於冶鍊，不若水晶無火氣，不致損目也。」[236]

由此看來，十八世紀並非沒有玻璃眼鏡，而且價格相當便宜，但中國人何以要用不易獲得，而且價格較貴的水晶眼鏡？其一是「物以稀為貴」的社會心理，還有一個可能是，由於玻璃眼鏡價格越來越便宜，遂使水晶眼鏡業者必須想出辦法，以對抗廉價的玻璃眼鏡。亦即從價格戰的角度，水晶眼鏡貴，玻璃眼鏡便宜，如何吸引具有購買力的上階層，自然必須有一套好的說詞，而玻璃具火氣、損目之說，自有一石二鳥之攻擊力。

另一方面，可能牽涉到玻璃鏡片的品質。清朝初年，玻璃眼鏡曾經流行於江南等地，當時傳教士可能擔任技術指導之角色，但隨著傳教士被集中至京師，甚至後來被遣送至澳門，鏡片製造技術可能出現斷層。嘉慶初年，迮朗《繪事瑣言》曾談到廣東所造玻璃，「用砒燒成，色綠，不可作眼鏡」。[237] 追溯玻璃損目說之出現，可能就因為若干玻璃鏡片品質不佳，戴者出現眼痛等疾病，遂使坊間以偏概全，誤以為玻璃眼鏡都不好。又，曾衍東 (1751-?) 在〈水晶眼鏡考〉曾對玻璃眼鏡與水晶眼鏡的發展有所對比，是一則有趣的眼鏡史料：

> 今閩廣出產水晶，好醜、顏色各有不同。其白而無綿者為上，為器玩最夥。明三保太監出西洋，攜燒玻璃人來中國，制如水晶。用以硝礁，無所不燒，如燈、瓶、珠、簪之屬。鏡之制，本範銅為之，粉以元錫，磨以白茹，則鬚眉毫髮，可得而察。移之玻璃，愈倍其光，因之以有玻璃之鏡。更即鏡收之於目，為眼鏡焉。昏者亦可借鏡而視，故玻璃遂綴於眉睫間。充其類為老花、為少花、為短視，因人而施，量力而厚薄之以為的。是眼

[233] 清・曹庭棟，《老老恒言》卷三，〈雜器〉，頁 290。

[234] 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七八，〈眼鏡〉，頁 560。

[235] 清・蔣溥等，《御製詩・五集》卷四〇，〈眼鏡〉，頁 239。

[236] 清・蔣溥等，《御製詩・五集》卷六三，〈賦得眼鏡〉，頁 615。

[237]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2-783。

> 之有鏡，實創於明。……時人復以水晶之無綿者作眼鏡，更較玻璃而著明。是眼鏡之初作於假，而今乃變為真。玻璃之猶嫌於火，而水晶則實取于水也。[238]

這段話可以分為三個層次，首先提到鄭和下西洋帶回燒製玻璃之技工，因此而有玻璃器、玻璃鏡，以及玻璃眼鏡。其次，當時人模仿玻璃眼鏡製法，以無綿之水晶礦石製造眼鏡，比玻璃眼鏡更為明晰，眼鏡才由假而歸真。其三，玻璃有火，水晶含水。曾衍東所謂鄭和下西洋帶回燒製玻璃技工之說，現存資料並無記載，可聊備一格，但難以確證。至於水晶眼鏡何以較玻璃眼鏡清晰，正可證明本土眼鏡玻璃 (ophthalmic glass) 的製造技術不佳。而水晶眼鏡製造者亦藉此大肆宣傳，想出「玻璃損目」、「水晶清目」之說以打擊玻璃眼鏡，並增進顧客對水晶眼鏡的購買慾。不過，《鏡鏡詮癡》引《博物要覽》說：墨色亦有作偽者，用久退色。[239] 因此，有些業者在所賣的眼鏡盒中特別蓋上「真正水晶」的印記。（參見圖五八）

值得注意的是，迮朗在《繪事瑣言》記載：「或曰目本好煖，宜用玻璨，不宜用水精。水精性大寒，甚於玻璨，恐有損於目也。」[240] 這一說法有可能是玻璃眼鏡業者所提出，為的是與「目本好涼」之說相抗。路德〈不帶眼鏡說〉也質疑水晶可以治眼火之說：市井上的說法，「水晶乃壬癸之精，病目有火，正宜以水勝之」；但他患眼病多年，遠方朋友餽贈厚度一分許的墨晶眼鏡不下五、六副，每次戴上，眼睛就不舒服，晝夜戴著，眼病更加嚴重。抑且，水晶無氣、無味、無津、無液，原本就非藥物，何以能療眼疾？若它真能治療眼疾，則嶺南富商以水晶做窗戶、桌几、牆壁及雜器，日夜坐臥其中，目疾便能解脫？實際上不然。[241]

西洋人亦對清代社會崇尚水晶眼鏡感到相當奇怪。乾隆五十八年，George Macartney 奉命使華，其隨員 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 曾在遊記中，談到廣州工匠以水晶磨成薄片做為鏡片，並說中國工人大概不懂光學原理，無法按照人的視力缺陷磨製相應度數的凹片與凸片，僅是磨出各種不同度數的水晶鏡

---

238 清・曾衍東著，盛偉校點，《小豆棚》（濟南：齊魯書社，1991），卷六，〈水晶眼鏡考〉，頁 140-141。按：標點有改正。

239 清・鄭復光，《鏡鏡詮癡》卷一，〈類鏡・鏡色〉，頁 83。

240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3。

241 清・路德，《椶華館全集・椶華館雜錄》，〈答劉監泉廉訪源瀕問養目法書・最忌者□□事・不帶眼鏡說〉，頁 599-600。

片，讓客人自行試驗配戴。[242] 道光十二年 (1832) 年底，朝鮮使臣金景善 (1788-1853) 出使北京，在其《燕轅直指》一書中，記載其十二月二十二日至西天主堂，見到傳教士劉松齡 (Augustin Ferdinand von Hallerstein, 1703-1774)、鮑友官 (Anton Gogeisl, 1701-1771) 皆戴著眼鏡，景善問道：「西洋鏡亦以水晶乎？」劉回答說：「水晶不可作鏡，以傷眼也。我輩皆不用。」[243]

若從價格高低決定購買取向的角度看，庶民百姓使用玻璃眼鏡的比例應該高於水晶眼鏡。可是，「水晶不致損目」之說，經過清高宗撰寫詩文加持，其話語權的崇高性致使社會上隨之人云亦云。故十九世紀，文字記載還是以清高宗的看法為主流，認為玻璃眼鏡不宜用。鄭復光在《鏡鏡詮癡》提到：

> 少年目力至足，無須於鏡。然終日一編，用之過度，遂生眦火。水晶性涼，故能清目而保光也。患目羞明，更宜墨晶。若玻璃，經火而成，不惟無益，且有害矣。或行路暫取遮塵，用舊玻璃如舊磁然，久則退火差可耳。[244]

鄭復光認為玻璃眼鏡，用於出門遮塵則可，居家看書則不行，比不上水晶眼鏡，這是當時人的既定觀念。後來，普通人亦以戴水晶眼鏡為高尚，故至清代後期，「水晶眼鏡徧天下，市井駔儈且用之矣」。[245] 至光緒初年，上海賣眼鏡者仍然標榜水晶眼鏡養目這一特點，如《申報》上金利源昌順隆號的〈真茶晶眼鏡售〉廣告說：「此品佩帶，清涼養目，如假包換。」[246] 另其〈真晶眼鏡玉鐲大減價〉廣告亦云：「此晶養目，辟風塵、熱毒。」[247]

對於社會上這樣的說法，清末傳教士希望藉由介紹西方精製玻璃眼鏡的科學性以破除迷思。光緒二十四年，《格致新報》嘗有問答涉及此一觀念，問者云：「中人謂水晶眼鏡為不損目，西人則謂精製之玻璃眼鏡為不損目，此玻璃如何製法？是否用藥製？何種有損？」答者稱：「玻璃以所入砂鉛多少，別其種類。西人製眼鏡玻璃，較別種尤加審慎，欲阻日光，則和以色，其質料亦較平常玻璃為

---

[242] 斯當東 (George Staunton) 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頁 437-438。

[243]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 71 冊），卷三，〈留館錄上・西天主堂記〉，頁 240-241。

[244] 清・鄭復光，《鏡鏡詮癡》卷四，〈述作・作眼鏡〉，頁 298。

[245] 清・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一二，〈水晶眼鏡〉，頁 544。

[246]《申報》，光緒庚辰年六月十四日，第 6 頁，〈真茶晶眼鏡售〉。

[247]《申報》，光緒辛巳年七月初三日，第 6 頁，〈真晶眼鏡玉鐲大減價〉。

細，故不致損目。」[248] 而據包天笑說，他初次配眼鏡時，社會上有一種迷信，配眼鏡要配水晶，不能配玻璃的，因為玻璃會戴壞眼睛。又說外國人所戴的眼鏡，是用一種藥水玻璃製成的，愈加要不得。[249]

（三）眼鏡不可常戴之說

除了玻璃眼鏡屬火損目、水晶眼鏡屬水清目的觀念之外，清代社會上另一觀念，是眼鏡不可常戴。有些近視患者甚至不戴眼鏡，如鄂爾泰 (1677-1745) 之弟鄂爾奇 (?-1735)，就是不戴眼鏡的大近視眼。某日，爾泰正在洗腳，爾奇突然到來，家人不及阻擋，爾泰急忙將雙腳盤入懷中，爾奇竟以煙筒敲擊他腿。爾泰為之愕然，爾奇說：「大白貓，何罕物，而兄珍之於懷，何也？」當時傳為笑談。[250] 另外，台州士人侯嘉繙 (1698-1746) 頗具文才，有來求取詩文者，他即在几上展開紙張，振筆疾書，「篇幅無定程，率以紙盡為度」。但他眼睛近視，「不能左右顧」，必須在旁伺候寫字者告訴他紙盡才停筆。[251] 又如常州畫家孟覲乙 (1764-1833)，「目短視，作畫時常以筆醮色，每誤醮水，則以水塗之，及紙乾，但存魂而已」。[252] 戴敦元 (1768-1834) 眼睛亦近視，「觀書以紙磨鼻，一磨則竟一紙」。[253] 他們不戴眼鏡，應該不是買不起，而是受到既有觀念之誤導。

最有名的例子應屬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 (1781)，清高宗在〈眼鏡〉詩註指出：「余昔年喜作蠅頭細書，今所藏卷冊甚多。近作〈憶昔詩〉，仍書冊尾，目力頗覺遜前矣。」但他還是覺得眼鏡不可戴，因為「一用眼鏡，則不可捨，將被彼操其權也」，而這不啻是太阿倒持。[254] 嘉慶三年 (1798)，其〈戲題眼鏡〉詩按語又云：自古以來無眼鏡，元明始來自西洋，「余向以其資人巧而失天真，從不用之」；「今且將望九矣，雖目力較遜於前，然披閱章奏及一切文字未嘗稍

---

248 《格致新報》第16冊，光緒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二百二十一問〉（睡園覺廬齋主人），頁 13b。

249 天笑生，〈我之眼鏡歷史〉。

250 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二，〈鄂爾奇短視〉，頁 44-45。

251 清・鄭虎文，《吞松閣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卷三三，〈國子助教侯君墓志銘〉，頁 330-331。

252 清・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五，頁 119。

253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二一，〈金蘭畦尚書事略・附戴簡恪公敦元〉，頁 437。

254 清・蔣溥等，《御製詩・四集》卷七八，〈眼鏡〉，頁 560。

懈，有以眼鏡獻者，究嫌其借物為明，仍屏而弗用」。[255] 或許在清高宗看來，他跟眼鏡的「權力」關係是不可逆的，祇有他拋棄眼鏡，而不是被眼鏡控制。[256]

受到這一特殊觀念的影響，甚至有人討厭別人戴近視眼鏡，江寧句容人駱正綸 (1748-1792) 就是一例，其理由是「古無眼鏡時，人已有目，今人多苦鼻挂耳」，「非天性所有，故可惡」。[257] 嘉慶初年，迮朗也談到：

> 或曰：未有眼鏡以前，人皆不用眼鏡也，故毅然不用，則終不用矣。苟一用之後，而欲復去，斷斷不能。……由斯以談，少年固不宜用，即四十、五十時，目力雖衰，亦宜強為禁止，立意不用眼鏡，則過此眼運關頭，可以終身不用矣。[258]

以現代醫學觀之，當用不用，絕不可能渡過眼關，反而會使視力越來越差。這一似是而非的觀念，或許延誤更多近視或老花的患者。而即使熟悉光學的鄭復光，在《鏡鏡詮癡》論老花鏡亦云：眼鏡初自外洋傳來，祇用一片，用時持而照之，不知何時增為兩片，掛於耳際，「便則便矣，而終日不除之弊由此而生，必有陰受其害者」。[259]《鏡鏡詮癡》又云：

> 讀書人微帶短視，至老不花，不足為累。惟短視大甚，非聞聲不能辨人，誠不能不藉凹鏡為用。不知者竇而用之，或並戴以觀書，致短視日甚，則用之者過也。法宜少用，凹甯稍淺為妙。[260]

如此看來，他覺得微有近視，不必戴眼鏡；即使戴，也不宜度數太足。直至晚清，這一觀念依然流行。光緒十年，包天笑因為近視眼，配了近視眼鏡，戴著眼鏡去見祖母，其祖母說：「小孩子不能戴眼鏡，只怕愈戴愈深，藏起來，到要看遠處的地方才戴罷。」據他說：不但小孩不能戴眼鏡，當時蘇州書香子弟雖多近視，年輕時也不大許戴眼鏡。[261] 光緒末年《時務通考》亦記載：「近視者不可使眼鏡太深，深則竭其目力，離鏡即不能見。若用淺鏡，明角罩有漸低之望，近

---

255 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一八，〈戲題眼鏡〉，頁 777。

256 參見：郭福祥，〈乾隆與眼鏡〉，頁 19-22；燕山，〈乾隆皇帝與眼鏡〉，頁 49-50；楊豔麗，〈乾隆皇帝與眼鏡〉，頁 49-51。

257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一五，〈駱君小傳〉，頁 201。

258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3。

259 清・鄭復光，《鏡鏡詮癡》卷四，〈述作・作眼鏡〉，頁 301。

260 清・鄭復光，《鏡鏡詮癡》卷四，〈述作・作眼鏡〉，頁 302。

261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頁 43。

視有變為不近視者。」[262] 或許由於以上這些觀念，近視戴眼鏡者不多，據馮柳堂回憶，近視眼鏡盛行，在光宣之間，當時之患近視者始多使用眼鏡。[263]

（四）戴眼鏡的高貴性

大致上，戴眼鏡者以讀書人居多。（參見圖五九）對讀書人來說，這本是不得已的事，但後來卻視做是「老成」、「有學問」的象徵，成為非讀書人或年輕人向上模仿 (imitates upwards) 的對象。乾隆六十年 (1795)，楊瑛昶 (1753-1809) 在《都門竹枝詞》詠眼鏡道：「車從熱鬧道中行，斜坐觀書不出聲。眼鏡戴來裝近視，學他名士老先生。」[264] 而許多年輕人為了顯示自己老成，爭相購買眼鏡來戴。嘉慶初年，迮朗就指出：「今有少年子弟，雙眸炯炯，翻以眼鏡為可羨，爰假養目之名，漫飾老成之貌，遂至習慣成自然，須臾不可離，一生長對水晶盤，豈不謬哉！」[265] 道光年間，楊靜亭詠眼鏡仍然提到：「眼鏡戴來裝近視，教人知是讀書人。」[266] 鄉下人甚至以為戴眼鏡就能識字。[267]

自清初以來，上階層多半喜愛戴墨晶眼鏡。清朝後期，士大夫這樣的流行趨勢未變，故段光清 (1798-1878) 說：「余素無玩好之物，惟喆兒送一墨晶眼鏡，余愛用之。」[268]（參見圖六〇）西北地區，士人戴墨晶眼鏡亦有其例。（參見圖六一）而在同治、光緒年間，江浙的男子服飾，「眼鏡咸用墨晶」。[269]

當官的自然要戴墨晶眼鏡。在清代，茶晶與墨晶眼鏡為官員所必備，大官接見下屬，將茶晶眼鏡臨時戴上，可看見下屬神情，而自己的神情則不會被下屬窺出。墨晶眼鏡則為夏季郊行及平常在紅紙上寫字，唯一的保護眼睛工具。是以茶晶與墨晶在清代最為流行。[270] 李伯元 (1867-1905) 所撰小說《官場現形記》，

---

262 清・杞廬主人等，《時務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三一，〈醫學二〉，頁 589。

263 馮柳堂，〈眼鏡考〉。

264 清・楊米人，《都門竹枝詞》（收入路工，《清代北京竹枝詞》），頁 20。

265 清・迮朗，《繪事瑣言》卷八，〈眼鏡〉，頁 783。

266 清・楊靜亭，道光《都門紀略》卷下，〈都門雜詠・時尚門〉，頁 10a-b。

267 清・英國教士湛約翰主編，《中外新聞七日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第 145 號，同治六年十月十九日，〈轉錄上海新報〉，頁 293。

268 清・段光清撰，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點校，《鏡湖自撰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60），同治四年乙丑，頁 211。

269 徐珂，《清稗類鈔》第 13 冊，〈服飾類・江浙人之服飾〉，頁 6148。

270 Hommel, *China at Work*, pp. 196, 198；王素存，《閒話玩古》（臺北：視聽教育出版社，1977），〈談水晶〉，頁 54。

多次提及官府老爺們神氣地戴著大圓墨晶眼鏡。[271]（參見圖六二）另據謝興堯說：「聞之故老云：咸同以來，凡地方官審案時，必戴玻璃眼鏡以助威嚴。」[272] 官員出門，即使端坐在輿轎之中，亦必戴著墨晶眼鏡，恍若非此不足以示威嚴。[273] 商人在捐官後，也學到這一習慣，戴上墨晶眼鏡。宣鼎 (1832-?)《夜雨秋燈錄》就述及萬佳兒以販賣阿芙蓉發財，長期往來於齊、楚之間，後捐納得九品官，在籍貫候缺，「煌煌章服，腰珮玉、腕跳脫、襟洋表，面架墨晶鏡」。[274]

清中葉以後，下階層也戴黑晶眼鏡。一八四〇年，法國公使隨員伊凡在廣州城中，見到江湖術士戴著黑水晶做的眼鏡，看起來既莊嚴又可怕。[275] 正由於墨晶眼鏡戴起來貴氣，北京的騙子與上海的翦綹、扒霋，也都架著墨晶眼鏡裝富貴人，以便降低受害者的心防。[276] 而在清末，墨晶眼鏡已經不是奢侈品。光緒十一年 (1885)《益聞錄》報載：「中西未經通聘之時，墨晶一物視謂奇珍，近則物賤價廉，俾不足道矣。……京中之墨晶眼鏡價值驟廉，而倡優隸卒之倫，無不以此為美飾矣。」[277]

必須說明的是，墨晶眼鏡不全然是太陽眼鏡 (sunglasses)，而是以墨晶材質製成的眼鏡，分為近視、遠視與平光三種，僅平光墨晶眼鏡具有保護鏡片的性質。據《清稗類鈔》轉抄的資料記載：

> 人之戴眼鏡也，非短視即老花，繼而視為妝飾之品，藉以壯觀瞻，曰平光，其取材普通者為白色之水晶。又有茶晶、墨晶，短視、老花、平光皆有之。遇必除之，以示謙，以示敬也，反是則為傲。[278]

戴墨晶眼鏡雖可裝點高尚，趕流行者應該還是會考慮其實用性，畢竟墨晶眼鏡價格甚高，買墨晶平光眼鏡亦須花費不少錢。光緒三十二年，頤安主人《滬江商業

---

271 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臺北：世界書局，1957），卷三，〈苦鑽差黑夜謁黃堂・悲鐫級藍呢糊綠轎〉，頁 20；卷六，〈急張羅州官接巡撫・少訓練副將降都司〉，頁 43；卷一七，〈三萬金借公敲詐・五十兩買摺彈參〉，頁 145；卷三六，〈騙中騙又逢鬼魅・強中強巧遇機緣〉，頁 329。

272 蒉公（謝興堯），〈漫談眼鏡〉。

273 徐珂，《清稗類鈔》第 4 冊，〈譏諷類・官吏視民如傷〉，頁 1737。

274 清・宣鼎，《夜雨秋燈錄》（臺北：文光圖書公司，1977），正集卷四，〈假五通神〉，頁 69。

275 伊凡，《廣州城內》，頁 72。

276 徐珂，《清稗類鈔》第 11 冊，〈盜賊類・上海飛口有神技〉，頁 5373；〈棍騙類・老人為某所騙〉，頁 5431。

277 清・李杕，《益聞錄》第 458 期，〈墨晶眼鏡〉，頁 208。

278 徐珂，《清稗類鈔》第 4 冊，〈譏諷類・官吏視民如傷〉，頁 1737。

市景詞》詠中式眼鏡店所云：「眼花無鏡不清明，備禦風塵助老成。亦有平光兼近視，趨時爭買墨茶晶。」[279] 正可說明墨晶眼鏡的時尚，並不全然只是為了遮風防塵，還有矯正老花或近視的功能。

五・土洋消長：清季眼鏡業的巨變

西方眼鏡的發展，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形式變化愈來愈多，其中最大的一個特徵，是鏡框越來越小與鏡腳越來越細。（參見圖六三）另外，一八二〇年代以後，玻璃的彩色鏡片有明顯發展，顏色從先前僅有的墨色，增加了綠色、藍色及各種彩色鏡片。而無邊框的眼鏡、鏡片上半與下半焦距不同的眼鏡等，也在十九世紀中葉出現。至該世紀最後二、三十年，材質開始使用黃金，一八九〇年代金邊、銀邊眼鏡成為時尚。而鉤耳的細邊眼鏡，也在十九世紀末走向流行。[280]

道光末年，沿海五口開放通商，其後口岸不斷增加，特別是英法聯軍以後，在此情況下，西洋舶來品的輸入量大幅擴增，價廉物美的洋貨成為流行時尚。[281] 西洋新式眼鏡就是其中之一。十九世紀後半葉，西洋玻璃眼鏡逐漸受到中國人青睞。咸豐八年 (1858) 十月五日，王韜 (1828-1897) 曾到上海西洋眼鏡店，代溫葆淳購買眼鏡。[282] 新傳入的西洋玻璃眼鏡，其形式不同往昔，這樣的眼鏡在中國從來沒有過，成為一種新奇而且可以炫富的物品。同治年間，王嘉誠（字樂山）嘗詠北京的洋料眼鏡：「玻璃眼鏡最為高，作闊由來是富豪。」[283] 足見西洋玻璃眼鏡價格較貴，成為富豪擺闊的物品之一。光緒八年，《益聞錄》的〈眼鏡考〉提到：

> 側聞西人之鏡，當初亦作圓形，今鄉農村嫗猶有用之者。若近代所製，則俱改卵形，大如棗，甚輕便，雖馳馬亦不墜。近年來，華人中亦有張西洋

[279] 清・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顧秉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頁 143。

[280] Corson, *Fashions in Eyeglasses*, pp. 120-140, 166-187.

[281] 喬志強主編，《中國近代社會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頁 247-248；李長莉，《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頁 124-135。

[282] 清・王韜著，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34。

[283] 清・楊靜亭，同治《都門紀略》，〈都門雜詠・技藝門〉，頁 329-300。

> 眼鏡者，特是華人鼻脊多平，而雙目反出于鏡上，瞻觀實有所不便，又有以西鏡倒置于鼻上者，其狀殊不雅觀，非莊重者所為也。[284]

晚清新款式西洋眼鏡傳入，土產眼鏡逐漸面臨西洋眼鏡的衝擊。以上海為例，光緒初年，水晶眼鏡業者開始降價促銷。如光緒五年 (1879) 六月，金利源昌順隆號刊登〈茶晶眼鏡賤售〉的廣告，每副一元六角。[285] 至八月，又登減價廣告：「淡茶晶一元四角，深茶晶一元七角，墨晶兩元。」[286] 光緒七年 (1881) 五月，茶晶降至一元，墨晶二元。[287] 光緒十四年 (1888) 十二月，金利源昌順隆號又刊登「墨晶減八折」的啟事：「現貨好過上年，市淡，沽一元六，茶晶八角。」[288] 光緒十六年 (1890) 七月，該店又刊登啟事：「此次到貨，好過上年，暫減七折發售，茶晶七角，墨晶一元四角。」[289]

（一）金銀鏡邊與格致鏡片

有學者指出，晚清的上海經歷了一場消費革命，而追求時髦是「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的一大主流。[290] 光緒年間，伴隨著西方眼鏡發展的新浪潮，以及市場開放持續加劇，各式西洋眼鏡湧入上海。其一，如細邊的折腳眼鏡。光緒十四年的〈老順司鏡出售〉廣告，就是這款的眼鏡。[291] 一九〇二年訪華的英國畫家 Mortimer Menpes (1855-1938) 也有畫作描繪中國人戴著折腳鬢角眼鏡。（參見圖六四）上海還有店家專賣硃光鏡架。光緒三十二年 (1906)，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詠硃光鏡架店云：「硃光鏡架製重重，金漆花邊鳳與龍。」[292] 這種硃光鏡架是特殊金屬材質，上面還鏤刻著龍鳳。

光緒末年，許多洋行在《申報》上刊登眼鏡廣告，上海雙龍洋行 (Agthe & Ismer) 即為其一。[293] 雙龍洋行兼售各式西洋器物，並非獨售眼鏡。專營眼鏡的

---

[284] 清・李杕，《益聞錄》第 161 期，〈眼鏡考〉，頁 164。
[285]《申報》，光緒己卯年六月廿五日，第 7 頁，〈茶晶眼鏡賤售〉。
[286]《申報》，光緒己卯年八月十一日，第 7 頁，〈茶晶眼鏡減價〉。
[287]《申報》，光緒辛巳年五月十二日，第 7 頁，〈真晶眼鏡玉鐲大減價〉。
[288]《申報》，光緒十四年十二月初三日，第 6 頁，〈墨晶減八折〉。
[289]《申報》，光緒十六年七月初七日，第 7 頁，〈眼鏡七折〉。
[290] 樂正，《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 (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頁 97-132。
[291]《申報》，光緒十四年九月初五日，第 5 張，〈老順司鏡出售〉。
[292] 清・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頁 151。
[293]《申報》，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五日，第 7 頁，〈上海雙龍洋行啟〉。

洋行在《申報》刊登廣告，以光緒三十年 (1904) 的明晶洋行 (Lazarus & Company) 為最早：「天下頭等眼鏡，無論年老年輕，或各種眼光，均可合用。其玻璃白、藍、黑等色，及眼鏡架金、銀、鋼、銅，各色俱有。價由洋二元起碼，至洋百元為止。」[294] 最高級的西洋新式眼鏡，要價洋圓百元，可說是貴中之貴。為了增加市場占有率，明晶洋行在光緒三十四年 (1908) 三月刊登降價廣告：「新到之貨，按尋常出售之價減半。」[295]

另外，高德 (John Goddard, ?-1909) 醫生開設的高德眼鏡洋行，也在光緒三十三年 (1907) 十一月跟進，刊登眼鏡廣告。[296] 宣統元年 (1909) 正月，高德醫生又刊登廣告：「邇來新發明之砑力克鏡片，較各種更為精美，現已名馳四海，試過諸君，莫不滿口讚美，世之苦無目力者，請嘗試之也。」[297] 所謂砑力克鏡片，即 Toric 鏡片，基本成分為鈉鈦矽酸鹽，無色透明，清晰度較高，其引進上海，為眼鏡業帶來一大變革。半個月後，高德洋行「因生意日增，舊址狹窄」，將店址由江西路遷往大馬路。[298]

上海的西藥房也在這生意上插上一腳，如宣統二年 (1910) 正月中英大藥房的〈借光〉廣告說：「本藥房今又運到西國各種時式精巧眼鏡，凡金邊、銀邊、軟腳、硬腳、離鼻等類，一應俱全；其片子顏色，或白或黑或藍，亦任憑揀選。」[299] 眼科醫生也兼賣眼鏡。宣統三年 (1911) 七、八月間，《申報》上即有愛倫眼醫生的眼鏡廣告。[300] 由此可見，清季上海的眼鏡市場競爭是越來越激烈。

新式的眼鏡特別吸引年輕人的目光。光緒初年，鄧文濱 (1811-?) 在《醒睡錄》談到：「眼鏡之設，原為年老或短視者用之，行遠路亦可避風塵，人巧濟天工之窮也。乃近日紈綺子弟以此炫耀，嘗於尊長前作睥睨狀，而京都宦習尤多。」[301] 光緒末年，傅崇榘《成都通覽》亦記載：「青年子弟好戴眼鏡冒充學生。」[302] 由於金絲、銀絲眼鏡比中式眼鏡更具裝飾性，故成為晚清的流行時尚

---

[294]《申報》，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第 7 頁，〈喇司勞士〉。
[295]《申報》，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廿八日，第 4 張第 3 版，〈喇司勞士〉。
[296]《申報》，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第 1 張第 7 版，〈高德洋行〉。
[297]《申報》，宣統元年正月初六日，第 2 張第 7 版，〈高德醫生〉。
[298]《申報》，宣統元年正月廿五日，第 1 張第 1 版，〈上海高德眼鏡洋行遷移廣告〉。
[299]《申報》，宣統二年正月廿八日，第 1 張第 8 版，〈借光〉。
[300]《申報》，宣統三年七月廿六日，第 1 張第 1 版，〈愛倫眼醫生廣告〉。
[301] 清・鄧文濱，《醒睡錄》(臺北：廣文書局，1970)，〈世運類・薄眼鏡之陋習〉，頁 21。
[302] 傅崇榘編，《成都通覽》（成都：通俗報社，1909），〈成都人之性情積習〉，頁 118b。

之一，頤安主人〈詠外國眼鏡店〉詩所云：「西人眼鏡小而輕，式仿腰圓製最精。旁用金銀絲掛耳，趨時爭買愛光明。」[303] 就傳達出這一情況。光緒二十三年，陳無我〈眼鏡說〉也談到：

> 余見舊製眼鏡，有以灰漆為框，用繩繫於耳者；有以墜子垂於耳後者；又有以銅邊銅腳，而橋樑處則出一物撐於鼻上者。自後愈製愈精，鑲以玳瑁，益形燦美。降至近年，競效西法，多戴洋眼鏡矣。金絲銀絲，其制不一。式如腰子，而其小不能蓋眼，質甚輕薄，戴之如覺無物也。[304]

陳無我這段回顧，概括了清代眼鏡的使用歷史，鏡框從灰漆到銅邊，固定眼鏡的方式從繩子、墜子到銅腳，又談到鼻樑上的額托。其後，出現鑲玳瑁邊的眼鏡，更屬上乘。這是中國風眼鏡的內部變遷。清末洋式眼鏡大行其道，金邊、銀邊眼鏡成為時尚，加上鏡片輕薄短小，使用上更加舒適。與前此的耳朵受累、鼻樑壓迫，不啻天壤之別。

當時，戴金絲眼鏡者不乏其例。（參見圖六五、六六）連李鴻章 (1823-1901) 晚年都戴上無邊的新式眼鏡。（參見圖六七）相較之下，金絲黑晶眼鏡更是時髦。宣統年間，《圖畫日報・營業寫生》就提到：「近來眼鏡尚尖式，金絲蠟黃晶黑黑。」[305] 當時，金奇中在上海某公司上班，「挾一小籐篋，戴一金絲眼鏡」。[306] 由於新式的眼鏡用起來較為舒適，故宣統元年上海全昌金鋼鑽號在《申報》及《圖畫日報》創刊號所刊登的廣告，強調其所賣的「新式離鼻眼鏡，可免壓鼻生痕、鉤耳生厭。折腳眼鏡，異樣玲巧簡便」。[307] 金絲眼鏡的流行，一直持續至民國以後。民國初年，羅漢〈漢口竹枝詞〉詠金絲眼鏡云：「近日例同裝飾品，鏡邊歡喜鏤金絲。」[308]（參見圖六八）

但金邊眼鏡的價格並不便宜。北京方面，據光緒三十四年《崇文門商稅現行則例》記載，稅率的高低依序是：真金邊洋眼鏡、墨晶與茶晶眼鏡、眼鏡與洋眼

---

[303] 清・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頁 149。

[304] 陳無我，〈眼鏡說〉、〈勸人勿戴眼鏡說〉。

[305]《圖畫日報》第 56 號第 8 頁，〈營業寫生・賣眼鏡〉。

[306] 徐珂，《清稗類鈔》第 4 冊，〈譏諷類・金奇中願與古人晤對〉，頁 1689。

[307]《申報》，宣統元年六月廿八日，第 1 張第 1 版，〈全昌新到各色格致晶片〉；宣統元年九月初七日，第 1 張第 8 版，〈自造新發明金銀離鼻眼鏡〉；《圖畫日報》第 1 號第 10 頁，〈全昌新到各色格致晶片〉。

[308] 羅漢，〈漢口竹枝詞〉，徐明庭、張穎、杜宏英輯校，《湖北竹枝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頁 152。

鏡、洋眼鏡之次者。但金邊眼鏡的關稅高於其他眼鏡非常多，為墨晶與茶晶眼鏡的 6.25 倍，一般眼鏡的 12.5 倍。[309]（參見表一）而高稅負必然轉嫁在售價上，故真金邊洋眼鏡的價格不可能便宜。

表一：光緒《崇文門商稅現行則例》眼鏡每十副抽銀稅額

種類	眼鏡	墨晶、茶晶眼鏡	洋眼鏡	洋眼鏡次者	真金邊洋眼鏡
稅額	0.12 兩	0.24 兩	0.12 兩	0.06 兩	1.50 兩

至於上海，據包天笑〈我之眼鏡歷史〉提到：光緒後半，外國貨最高尚的是金絲眼鏡，上海只有幾家洋行發售，非貴公子不能御此物，聽說配鏡就要二十兩銀子。[310] 宣統三年四月，上海中英大藥房的廣告中，曾提到銀邊眼鏡每副洋圓二元，金邊眼鏡六元至二十元。[311] 金絲眼鏡則因 K 金成色不同而價格有別。民國元年 (1912)，謀得利洋行 (Moutrie and Co.) 上海分公司大減價廣告提到：金絲眼鏡每副四元，包用十年；另有每副三元五角、二元五角者。鋼絲眼鏡亦分等級，每副洋一元、八角、五角。[312] 民國二年 (1913)，謀得利洋行又有廣告：十四開金絲眼鏡洋三元五角，十開金絲眼鏡洋二元五角。[313] 民國三年 (1914)，全昌號廣告標價：真金眼鏡每副洋十二元、金無邊眼鏡每副洋七元、墨金文明眼鏡每副洋三元。[314] 有作者提到，民國初年在精益眼鏡店，花了六元三角大洋，買了一副托力克眼鏡。[315]

另外，還流行西洋彩色眼鏡。光緒年間，北京流行「西洋人水晶眼鏡」，有水晶、黃晶、墨晶，價高者至數十兩。[316] 西洋眼鏡一向用的是玻璃，這種「西洋人水晶眼鏡」，是不同於水晶的一種新材質鏡片，具有各種顏色，而價格很貴。清朝末年，曾廣銓 (1871-1940) 在光緒二十六年 (1900) 庚子和議擔任翻

[309] 清・佚名，光緒《崇文門商稅現行則例》（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玉石珍玩類〉，頁 2590-2591。

[310] 天笑生，〈我之眼鏡歷史〉，頁 21。

[311]《申報》，宣統三年四月廿八日，第 1 張第 6 版，〈夏令家用必需之品〉。

[312]《申報》，民國元年十月廿三日，第 2 張第 1 版，〈謀得利分公司大減價〉。

[313]《申報》，民國二年十一月四日，第 2 張第 11 版，〈謀得利分行新到吒力克眼鏡片〉。

[314]《申報》，民國三年五月廿五日，第 2 張第 8 版，〈全昌・中國新發明自造愛國貨〉。

[315] 昨非，〈余之眼鏡歷史〉，《清華週刊》161 (1919)：15。

[316] 清・周家楣、繆荃孫等修纂，左笑鴻標點，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京師志十八・風俗〉引《都門雜記》，頁 581。

譯，李鴻章厭惡其戴綠眼鏡，叫他「荒唐小鬼」，又說將來必要砍頭。次日，廣銓得詩句云：「荒唐鬼說荒唐話，頑固人看頑固花。」[317] 曾廣銓為曾紀鴻 (1848-1881) 之子，後過繼曾紀澤 (1839-1890) 為嗣，早年隨紀澤出使英國，故擅長多種外語。他喜歡戴綠眼鏡，可能是模仿外國人，所以是「荒唐小鬼」。

女性方面，光緒中葉以後，婦女之好裝扮者，也都戴眼鏡以為美觀。[318] 而且，模仿男性配戴墨晶眼鏡。《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就提到：「上海的風氣，眞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總是借助脂粉，誰知上海的婊子，近來大行戴墨晶眼鏡。你想這杏臉桃腮上面，加上兩片墨黑的東西，有甚麼好看呢？」[319] 後來，上海婦女跟隨流行，也戴金絲眼鏡。據《圖畫日報》報導：

> 眼鏡一物，向惟男子之有目疾者用之。自墨晶眼鏡盛行，人喜其可蔽風日，於是戴者漸眾。自金絲眼鏡出，而閨閣中乃有藉此以為美觀者。近則上自官署，下至娼妓，幾於數見不鮮。[320]

清末女性崇尚金絲眼鏡的情況，同樣存在於武漢三鎮。宣統二年 (1910)，惲壽祺〈南城竹枝詞〉就有一首述及妓女戴金絲墨晶眼鏡：「墨晶眼鏡戴金絲，笑倚龜奴故故遲。」[321]（參見圖六九）民國時，勰廬曾提到：有清一代男子，戴眼鏡者雖多，然見人必去之，否則以不敬論，女子戴眼鏡者，則殊不多見。清末至今，外國眼鏡大宗輸入，「趨時者往往以戴眼鏡為美觀，女子戴眼鏡者亦觸目皆是，蓋至是而都會之地，男女戴眼鏡者，幾乎有十分之三四，與同光以前之風氣，迥乎不同矣」。[322]

後來，上海時髦的眼鏡又變了。民國十年，李涵秋 (1873-1923)《美女活動寫真・初集》〈鼻架眼鏡之姿態〉圖說云「大多數的時髦女郎，多用黑色玳瑁邊的圓式眼鏡，時髦名稱叫做羅克眼鏡」。[323]（參見圖七〇）羅克眼鏡的鏡框是黑

---

317 清・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齋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二，〈李鴻章庚辛議和時氣燄〉，頁 514。

318 徐珂，《清稗類鈔》第 13 冊，〈服飾類・眼鏡〉，頁 6220。

319 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一一回，〈紗窗外潛身窺賊跡・房門前瞥眼睹奇形〉，頁 37。

320《圖畫日報》第 88 號第 7 頁，〈婦女競帶金絲眼鏡之時趨〉。

321 惲壽祺，〈南城竹枝詞〉，徐明庭等，《湖北竹枝詞》，頁 143。

322 勰廬，〈眼鏡考〉。

323 李涵秋，《美女活動寫真・初集》（上海：世界書局，1922），〈鼻架眼鏡之姿態〉，頁 49。筆者所見版本係上海圖書館藏本，該書原擁有者曾在黑白圖上上色，更添雅趣。

色玳瑁邊，但為何叫羅克？劉聲木 (1876-1959) 曾記民國十四、十五年間，有所謂「時髦三克主義」，其一為目戴克羅克，克羅克為「外國一種眼鏡玻璃片名，譯音如此」。[324] 克羅克鏡片即 Crookes lenses，係英國人 Crookes 發明的一種新鏡片。[325] 李涵秋所說的「羅克」，似應為「克羅克」。民國十一年，包天笑也提到，當時腰圓式的鏡框退時髦，又變成正圓形，且流行玳瑁邊。[326]

（二）西式驗光法的傳入

早期西方人選購眼鏡，同樣僅能就製成品中加以挑選（參見圖七一），現場檢驗視力的方式要到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才出現。一八五四年，維也納之 Edward Jaeger，及一八六〇年，英國之 Longmore，各曾製作特殊的視力表。荷蘭之 Herman Snellen 加以改良，於一八六八年維也納眼科學會會議上發表，自是始有標準的視力表。一八八八年，Landolt 又根據 Snellen 所製加以改良製成新的視力表，二十一年後經國際眼科學會採用為國際標準視力檢驗表。[327]（參見圖七二、七三）

眼鏡除平光鏡防塵埃、避光線，可以不測驗度數之外，近視、遠視眼鏡均須測定度數之遠近。[328] 光緒年間，許多洋眼鏡店開始採用新法驗光。如光緒三十年三月明晶洋行的眼鏡廣告：「本行售出之各種眼鏡，均包貴客合用，如驗眼光，不取分文，特此佈告。」[329] 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高德醫生的眼鏡廣告亦云：「余驗貴客眼光，時能包所配之品無誤，因敝人于光學一門，精究多年矣。」[330]

更重要的是驗光機器的引進。關於驗光機器的發展，一八七三年 F. Cuignet

---

324 清・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九，〈時髦三克主義〉，頁 202。

325 俞醉仙，〈眼鏡之研究〉，《小報》9 (1923)：32。

326 天笑生，〈我之眼鏡歷史〉，頁 21。

327 山田幸五郎著，程思進譯，《眼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頁 122-124；Lawrence Lewison, *You and Your Eyes* (New York: Trinit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60), pp. 58-59; Ruth Brindze, *Look How Many People Wear Glasses: The Magic of Lenses* (New York: Atheneum, 1975), pp. 33-36.

328 徐珂，《可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一一，頁 170。感謝陳光祖先生惠賜此一資料。並見徐珂，《清稗類鈔》第 13 冊，〈服飾類・眼鏡〉，頁 6220。

329《申報》，光緒三十年三月二十日，第 7 頁，〈喇司勞士〉。

330《申報》，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廿八日，第 1 張第 7 版，〈高德洋行〉。

首先發明檢驗鏡，對各種屈光狀態進行觀察。一八八〇年，法國人 H. Parent 嘗試運用透鏡，準確測算出屈光狀態及度數，並將 F. Cuignet 的檢驗法定名為「視網膜鏡檢查法」(skiascopie)。早期檢驗鏡所投射出的是圓形光斑，稱為點狀光檢影鏡 (spot retinoscope)。二十世紀初，Copeland 發明帶狀光檢影鏡 (band retinoscope)，使檢影法更往前跨了一大步。[331] 上海新式機器驗光之引進，始於高德眼鏡洋行。宣統元年五月，高德醫生在廣告上說：

> 余常見諸君患正視、老花、散光者多矣，然然若髫齡時配得合宜眼鏡，今日目光定能較好。爰特備新法電器，專為青年子弟考驗一切目疾，則幼孩年長時眼光必佳。孩子有時忽患目疾，未知之焉。然既知，不准戴者亦有之。延至長年欲配，往往太遲，故為父兄者須注意耳。況察出無病，或無須戴眼鏡，亦不取驗資。[332]

這一廣告除指出華人不准小孩戴眼鏡的後果，也將客源設定在年齡層較低的青年。宣統元年七月間，高德眼鏡洋行的高德醫生去世，八月以後由其摯友裴恆醫生接手。[333] 裴恆醫生也是光學畢業的眼科醫生，曾在蘇州醫院行醫十二年。[334] 十一月間，高德洋行的廣告上說：「驗光者暫請光學畢業家裴恆醫生執掌，以俟新醫生費德君由美蒞華。」[335] 宣統二年三月，費德雷（即裴迪睞）醫生抵達上海，廣告上說：「本行股東費德雷醫學博士現已抵申，接辦一切事務，仍在原處驗光，並新添各種驗光器具。」[336]

面對高德洋行的驗光機器，華人眼鏡店僅能強調配鏡時請醫生驗光。如宣統元年六月，兼賣眼鏡的全昌金鋼鑽號在《圖畫日報》的廣告上說：「配時必經醫生考驗，不論年老、年輕，均能深淺合度，保護目力。凡來購本號眼鏡者，設欲醫生看驗眼光，不另取資。」[337] 宣統二年五月，全昌金鋼鑽號在《申報》的廣告則說「如配鏡片，有光線表校正」。[338] 宣統二年正月，中英大藥房的眼鏡廣告〈借光〉也特別指出：「其貨皆經高明光學醫士審定，並備有較量目界光線

---

[331] 劉曉玲主編，《驗光技術》（中和：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2007），頁 8-9。
[332]《申報》，宣統元年五月廿一日，第 4 張第 7 版，〈高德醫生光學專家〉。
[333]《申報》，宣統元年八月初十日，第 1 張第 1 版，〈高德眼鏡洋行緊要告白〉。
[334]《申報》，宣統元年十月廿一日，第 1 張第 8 版，〈高德洋行〉。
[335]《申報》，宣統元年十一月廿一日，第 1 張後幅第 8 版，〈高德洋行〉。
[336]《申報》，宣統二年三月初四日，第 1 張後幅第 8 版，〈美國優等光學家費德雷醫生〉。
[337]《圖畫日報》第 49 號第 11 頁，〈對光配晶之善法〉。
[338]《申報》，宣統二年五月廿八日，第 1 張後幅第 8 版，〈全昌自製金銀離鼻眼鏡〉。

表，除平光外，若患短視或老花，只須將表比到，便能確知目線之遠近淺深，以求適合其度數，當面鑲配，絲毫無差。」[339]

全昌金鋼鑽號、中英大藥房所用的驗光表，對比高德洋行採用的機器驗光，仍屬較為落伍。但這在上海似乎是普遍的現象，因為除高德眼鏡之外，尚無其他商行標榜新式機器。不過，大部分的眼鏡店均強調聘請西洋醫生驗光，如宣統三年閏六月明晶洋行的廣告：「本行設上海四十五年矣，所售各種眼鏡，能養目光，久而不變，早為仕商學界所稱許。茲復特聘西洋光學著名醫科，專為向本行購置眼鏡配光之用。」[340]

（三）上海眼鏡店的廣告戰

光緒年間，金絲、銀絲、鋼絲眼鏡進來，蘇州眼鏡店也知道玳瑁邊漸不合適，也有仿造銀絲邊的，雖不及外國公司的輕便，但據包天笑說，也算是一種抵制外國貨。[341] 當時，上海首飾店常兼賣眼鏡，除了前面提到的金利源昌順隆號外，光緒末年以降極為活躍的全昌金鋼鑽號、時和號首飾店也都兼賣眼鏡。全昌金鋼鑽號所賣西式眼鏡可能是仿製品，但自光緒三十三年起，不斷在《申報》刊登的廣告上，標榜「自造金邊折腳眼鏡，各色花樣，比眾不同，無論黑、白、藍片，近光、老光，均備批發，格外公道，劃一不二」。[342] 宣統元年三月，其廣告標題為「全昌自製改良金銀絲眼鏡」，內容提到「新出離鼻眼鏡、折腳眼鏡，並請醫生驗究格致晶片，均能保護目光」。[343]

對於全昌號「誇大不實」的行銷廣告，高德洋行頗不以為然。宣統元年八月，高德洋行在廣告中說：「海上一隅，眼鏡舖子林立，大抵首飾家而矣，於光學一門不甚考究，故其光線裝配，往往諸公大不滿意。」[344] 顯然對兼賣眼鏡的華人首飾店有挑釁的意味。宣統二年六月，高德洋行在廣告上又說：「本行磨片之考究，驗光之詳細，裝配之特色，莫不甲於東方，非平常首飾家所能及焉。」[345]

339《申報》，宣統二年正月廿八日，第1張第8版，〈借光〉。
340《申報》，宣統三年閏六月十八日，第2張第8版，〈明晶洋行專售養目眼鏡特別廣告〉。
341 天笑生，〈我之眼鏡歷史〉，頁21。
342《申報》，光緒三十三年十一月廿一日，第1張第7版，〈異樣玲巧簡便〉。
343《申報》，宣統元年三月廿八日，第1張第1版，〈全昌自製改良金銀絲眼鏡〉。
344《申報》，宣統元年八月十一日，第1張第8版，〈高德洋行〉。
345《申報》，宣統二年六月十八日，第2張後幅第8版，〈高德洋行〉。

在此情況下，全昌號的廣告開始改變策略。宣統二年九月，全昌號在《申報》的全版廣告上提到：「竊思外洋競爭實業」，該行「熱心祖國，挽回利權」，故不惜工本，發明離鼻眼鏡、折腳眼鏡等；在廣告的中間正上方，並繪有驗光圖案。[346]（參見圖七四）明顯以商戰與愛國的概念，試圖激發中國人的族群意識以相抗衡。宣統三年三月，全昌號為反駁外界的攻擊，在廣告上還特別刊出揚州巨商卞少山稱讚其所配鏡片明亮等內容之親筆信函。[347] 然而，高德洋行對全昌號依然窮追不捨。九月間，在廣告中又提到：

> 海上一隅，眼鏡舖子林立，然大抵首飾家或金匠所設者耳。彼于光、醫二門從未研究，故所驗之光及所配之鏡洵可知矣！[348]

民國元年以後，全昌號的廣告主要以愛國做為號召，如六月的廣告說：「本廠創辦自造眼鏡以來，歷有餘年，挽回利權，日日改良，新造各種研究完全離鼻眼鏡十有餘種，可免壓鼻鉤耳之恨。別出心裁，想出種種妙法，環球第一。」[349] 其廣告雖係老王賣瓜，但特別標舉「挽回利權」。同月另一廣告又云：「非徒牟利，實欲推廣土貨，想熱心同胞必樂顧焉。」[350] 民國元年十一月，全昌號在刊登的配驗眼光圖下，仍然強調其「推廣土貨」的心意。[351]（參見圖七五）十二月的廣告標題則直接寫「中國新發明自造愛國貨」。[352]

全昌號以「愛國」與「推廣土貨」做為訴求，其實與晚清的商戰意識相連繫。[353] 而全昌號的廣告訴求，後來也為其他眼鏡公司所取法。宣統三年九月，上海中國精益眼鏡公司的廣告，也強調以商戰爭回利權：

> 華人愛用洋貨之原因，實因中國無美術之製造品。眼鏡一項，華人向無製

346《申報》，宣統二年九月廿六日，第 1 張後幅第 7 版，〈全昌〉。

347《申報》，宣統三年三月初九日，第 1 張後幅第 7 版，〈全昌有目共賞〉。

348《申報》，宣統三年九月廿八日，第 2 張後幅第 5 版，〈高德洋行〉。

349《申報》，民國元年六月十九日，第 2 張第 5 版，〈今造各種改良完全離鼻眼鏡〉。

350《申報》，民國元年六月廿四日，第 1 張第 4 版，〈全昌新出精造玲便眼鏡〉。

351《申報》，民國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第 1 張第 4 版，〈全昌配驗眼光圖說〉。按：此驗光圖與宣統二年九月全版廣告中所見完全一樣，只是放大甚多。

352《申報》，民國元年十二月廿五日，第 3 張第 12 版，〈中國新發明自造愛國貨〉。

353 關於晚清的商戰觀念，參見王爾敏，〈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 (1976)：1-91；向娟，〈民族主義語境下的國貨運動與《申報》廣告 (1912-1926)〉（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0）；秦勝青、解潔瓊，〈從廣告語看近代的國貨運動——以 1912~1919 年《申報》廣告語研究為例〉，《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4.12：104-107。

> 造專家，於是洋商爭運其出品來華，遂成為漏卮之一。本公司同人於此研究有年，特出心裁，巧製各種眼鏡，物質、形式皆力求華美堅固，合乎貴客心理，即以之與向來著名之外國貨相較，亦有過之無不及，蓋以期精益求精，名實相副爾。

廣告中並強調其五大特色，即製造之特色、驗光之特色、裝配之特色、顏色之特色、邊腳之特色。驗光時「備有最新式之驗光室及驗光儀器，驗費不取」。鏡片顏色有紅、藍、黃、白、黑諸色，「其中尤以淡茶綠與玫瑰紅兩種，為最新色、最美觀。並備有中國天產水晶、墨晶、茶晶等鏡片，亦能驗準眼光，碾磨配合」。[354] 民國元年四月，中國精益眼鏡公司的廣告籲請愛用國貨者光臨。[355] 包天笑曾說：上海華人開了一家新式眼鏡公司後，因為是挽回中國利權，國人上門購買的甚多，他本人從此被這家眼鏡公司吸引，一連配了五、六副眼鏡。[356]

隨後不久，全昌號面臨洋行與華人眼鏡公司的雙面夾擊。民國元年六月，中國精益眼鏡公司的廣告提到：「本公司實事求是，與販售舶來品而專恃大言欺人者絕然不同也。」[357] 最後一段話，顯然是針對全昌號。十二月間，高德洋行又在廣告上強調：

> 海上之販售眼鏡者有之，西醫驗光者有之，然欲得真正醫學博士而兼精明光學者無聞也，惟小行獨擅其長。設或諸君至別處西醫驗光，其查驗費至少須自五兩至十兩，若另配鏡架，亦須付尋常之價值。小行為便客起見，凡除疾驗光，分文不取；倘貴客不諳英語，又有華人接洽。而所售之貨，皆美國最新之式，色色俱備，無美勿臻，可以隨意選擇。設諸君誤購偽貨，非僅浪費金錢，而往往犧牲一世之眼光，務望問津諸君幸勿草率從事。醫學博士費德雷、華經理周憲章同啟。[358]

廣告中提到一般西醫驗光，費用至少須要銀五兩至十兩，大部分人負擔不起。在此情況下，驗光表可能還是主流。其實，全昌號一再標舉其眼鏡為自行製造，高德洋行對此早有不滿，而現在又暗諷其為「偽貨」。對此，全昌號在同月稍後的廣告中，除再次強調其眼鏡乃自行研發外，也提到「敝行配光，有黑間電光

354《申報》，宣統三年九月初十日，第 1 張第 1 版，〈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355《申報》，民國元年四月二十日，第 2 張第 8 版，〈新國民之新枝〉。
356 天笑生，〈我之眼鏡歷史〉，頁 21。
357《申報》，民國元年六月五日，第 3 張第 9 版，〈精益眼鏡公司〉。
358《申報》，民國元年十二月四日，第 2 張第 8 版，〈高德洋行創製托力克化學彎形鏡片〉。

驗目，並有光線表校正目力」。[359] 直至民國三年三月，高德洋行在廣告中仍然提到：

> 曩者華人於眼鏡一道頗尠研究，自敝行張幕以來，近視、老花、半明蒙昧等光使之復原光者不勝枚舉矣。以後，滬上步敝行之後塵者一而再矣。邇來竟有未諳光學，炫其利而立幟於報紙上，豐詞揚言，有名無實，無用贅評，深得其中三昧者，自能明其鼎鼐也。[360]

當時，上海的時和金銀首飾號也在廣告中言及販售「最新式吒力克藥水眼鏡片」，[361]「各種托力克眼鏡，配眼較光，無不盡其奧妙」，[362] 從來不敢像全昌號那般吹噓自己研發等等說詞，因此高德洋行的攻擊實際上主要針對全昌號。而對全昌號的譏諷，隨著其他新眼鏡公司成立，也持續出現在該公司的廣告中。

為了爭取客源，民國二年新成立的華明製造眼鏡公司，廣告上標榜以商戰爭回利權：「慨乎商戰競爭潮流日亟，我國工藝未振，坐令利源外溢，舶來如雲，漏巵莫塞，而眼鏡亦實其一大宗矣。同人等久已有志於此，欲思挽回利權，用特邃意攷察，專心研究，雖未敢獨具經驗自詡，然竊欲造福眼界自任，蓋費盡心力者已數載於茲矣。」[363] 民國三年一月，華明製造眼鏡公司還登出機器驗光的圖像（參見圖七六），並在廣告中說：

> 本公司自製各種光學鏡片，最能補助目力，保護視官，久為中外所歡迎，而尤以托力克一種鏡片，為本公司研究獨到發明最新之製品，凡眼科光學專家莫不交口稱美，謂非特獨步中華，實是以駕陵歐西，此則仝人等所敢據誠宣布，問心無愧，非如他家之專恃吹牛，大言欺世者也。且本公司設有暗房電光驗目室，特聘光學博士，用最新式之機器驗目配光。[364]

其廣告說「托力克一種鏡片，為本公司研究獨到發明最新之製品」，自然也是誇大之詞，但內容中指摘「他家之專恃吹牛，大言欺世」，可能也是針對全昌號。這年三月，中國明明眼鏡公司開幕，其廣告標舉六大特色：驗光之周密、裝配之

---

[359]《申報》，民國元年十二月十二日，第 1 張第 4 版，〈全昌新製改良軟樑眼鏡〉。

[360]《申報》，民國三年三月廿八日，第 3 張第 9 版，〈高德洋行〉。

[361]《申報》，民國二年二月十二日，第 2 張第 7 版，〈時和金銀首飾號〉。

[362]《申報》，民國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第 1 張第 4 版，〈時和金銀首飾號・洋冬送禮最宜之品〉。

[363]《申報》，民國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國始創華明製造眼鏡公司聘取美國醫生驗光格致托力克眼鏡片〉。

[364]《申報》，民國三年一月二十日，第 1 張第 4 版，〈華明製造眼鏡公司〉。

優點、製造之美備、邊腳之精緻、顏色之完全、豐采之增加。[365] 七月的廣告上還說：「環球獨步、為大中華第一家眼鏡製造廠、並駕歐美。」[366] 民國三年十月，中華眼鏡公司開幕，聘高德洋行的華經理周憲章，與中國明明眼鏡公司經理俞聖祚主持業務，廣告中提到：

> 本公司以最新出品，發極大之思，願欲使中華人人得補助之法，以完其光，命名曰中華公司，因聘特色人材，組織鉅眾，為中華光學放一異彩。庶知二君之實驗，較諸市上之大言欺人，以不對光之鏡片，自詡專家者，真有天壤之別。

廣告並談到該公司暗室中的「電光驗目器具，均最新新發明之品，分寸不差，纖微周至」；驗光則周憲章、俞聖祚二人「朝夕參商，凡遠近、斜正、聚散各光，毫芒累黍，度差悉合，非尋常以舶來品自為合度者可比」。[367] 由以上的敘述可見，上海的新眼鏡公司不斷設立，彼此競爭日益激烈，而專業人材也成為重要角色，至此是否有「黑間」、「暗室」驗光已非關鍵，專業驗光師才是致勝的最佳利器。而此，似乎是全昌號的最大弱項，難以讓同業信服。

有趣的是，民國二年開設的茂盛洋行 (Watts & Company)，採取與精益眼鏡公司合作的態度，其鏡片由後者供應。該年十月，雷茂盛醫生在廣告上，除談到先前曾與高德醫生同事五年，高德醫生死後，他回美國坎爾福尼光學專科學校就學，經過四年，取得光學士文憑，重返上海開業，而其驗準後所需鏡片，一概委託中國精益眼鏡公司承辦，「緣該公司之出品，與歐美最上鏡片相並，允為東方第一特製，久為社會所懽迎也」。[368] 茂盛洋行這一舉措，無異為精益眼鏡公司打廣告，即以其專業驗光吸引顧客，又能兼顧中國人愛國心理，正所謂共創雙贏。

此後，中國精益眼鏡公司的業務不斷擴大。民國三年 (1914) 初開設北京分公司於前門外觀音寺西，[369] 五月間又獲得農商部批示獎勵，在廣告上除照錄批示原文之外，十一月甚至刊出獎狀。[370] 最終，該公司成為全國最大的眼鏡公

365《申報》，民國三年三月十二日，第 1 張第 4 版，〈新開中國明明眼鏡公司〉。
366《申報》，民國三年七月十四日，第 2 張第 7 版，〈新開中國明明眼鏡公司〉。
367《申報》，民國三年十月十六日，第 1 張第 4 版，〈新開中華眼鏡公司〉。
368《申報》，民國二年十月十三日，第 1 張第 4 版，〈茂盛洋行〉。
369《申報》，民國三年三月四日，第 2 張第 7 版，〈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370《申報》，民國三年五月三十日，第 1 張第 1 版，〈農商部批示褒狀・中國精益眼鏡公司照錄〉；民國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第 2 張第 8 版，〈農商部獎勵中國精益眼鏡公司出品〉。

司，各地皆有分號。而這套所謂科學驗光的制度，也隨著其陸續在南北各大城市開設分號而傳播。總之，驗光制度的出現，使固定度數的傳統眼鏡完全失去市場，而新式「格致」鏡片之傳入，也使水晶眼鏡一敗塗地。

（四）水晶眼鏡的衰落

民國初年，有資料提到：我國所製眼鏡，皆以水晶為之，「有色者，淺之為茶晶，深之為墨晶」。自外國之托力克片輸入，用水晶者遂少。[371] 在此情況下，一些老字號的眼鏡店不得不改弦易轍，店中常兼賣中西各式眼鏡，以便吸引各種喜好的顧客。民國三年，上海泰來裕正記眼鏡老店廣告道：

> 本號開設新北門內數拾餘載，貨真價實，各省馳名。茲特重行整理，採辦水晶、茶晶、墨晶、金銀絲邊及泰西各式眼鏡。至貨物之精良，工作之靈巧，素承各界許可。今更定價克己，以廣招徠，如蒙惠顧，請即駕臨小號，無任歡迎。小號只此一家，並無分出，如漢口有不肖之徒，隱□敝處牌號，魚目混珠，希圖射利，望惠顧諸君注意，勿墮其欺。[372]

這則廣告雖係為申明「只此一家，別無分店」，但從其出售各式中外眼鏡看來，可能反映出當時眼鏡店普遍的經銷模式。而上海最有名的老字號眼鏡店吳良才，也面臨西洋及華人新開眼鏡店的競爭。據民國七年 (1918) 修纂的《上海縣續志》記載：「吳良才號肆，設梧桐弄南口大街，所製玳瑁邊、銀邊眼鏡有名。近因西式眼鏡盛行，貿易稍遜。」[373]

這種土洋消長的情況，也發生在中國其他城市。齊如山 (1875-1962) 在《北京三百六十行》談到眼鏡舖時曾經說：乾隆以後，眼鏡大行，眼鏡舖開設日多。從前之風尚，以水晶、墨晶、茶晶三種為貴。自洋眼鏡盛行後，水晶眼鏡舖幾無立足之地。不但鏡光厚、重量太重，其所磨之光子亦不及機器所磨之平，故於眼睛較有害；且銅架、銅叉重量也比樹膠者重得多。[374] 另據民國《北京市志稿》記載眼鏡工云：「新式眼鏡，其片皆來自外洋，其驗光、配架備極精巧，時尚咸

---

[371] 徐珂，《清稗類鈔》第 13 冊，〈服飾類・眼鏡〉，頁 6220。

[372]《申報》，民國三年三月廿七日，第 1 張第 4 版，〈泰來裕正記眼鏡老店廣告〉。

[373] 吳馨、姚文枏等修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八，〈物產〉，頁 612。

[374] 齊如山，《北京三百六十行》（北京：寶文堂書店，1989），卷三，〈商業部・器具類・眼鏡舖〉，頁 151。

爭趨之。此種店舖不下數十家，其洋貨店兼賣及醫院代配者不與焉，以精益一家開設最早。」[375]

天津也一樣。晚清時，天津眼鏡業分為南北兩幫，北幫集中於縣城北門外的估衣街，業者多來自山東寧津、河北冀縣、棗強一帶；南幫則大部分在法租界勸業場附近，業者多為江浙人。北幫所經營以茶晶、水晶與水晶老花鏡，及一些時髦的金絲眼鏡為主，不熟悉近視、散光等驗目技術。隨著民國四年 (1915) 天津精益眼鏡公司開設，驗目配鏡和光學鏡片加工技術傳入天津眼鏡市場，但傳統的北幫眼鏡舖，先是不承認驗目配鏡和光學鏡片加工工藝，後又視其為「假貨」以抵制這兩種新技術，但最後還是無法扭轉趨勢。[376]

上海、北京、天津老式眼鏡店被擊敗的案例，其後也在其他城市不斷上演，水晶眼鏡的時代從此一去不復返。接著，則是精益眼鏡公司新式「格致」鏡片的時代。最終，即使是遠在西北的甘肅小縣，也可以見到精益鏡片的蹤影，如民國《重修鎮原縣志》記載：「邑有近視眼者，非帶鏡則寸步難行。又有老光鏡者，老年人目力不足，帶此則小字可以看大。乃有眼非近視，人正少年，購精益眼鏡公司玻璃片，五色迷離，迎合潮流，見官長亦帶之，惟遇長輩則不然。」[377] 中國境內產製的鏡片也可以是炫耀的流行時尚。不過，仍然有極其保守的一些士人，不願接受這些新的發明，為此眼鏡商仍必須準備一些水晶鏡片的眼鏡。[378]

六・結語

據史料記載，明宣德年間中國人已經使用眼鏡，自此以降的五百年，眼鏡逐步邁入一個極具「中國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或「中國化」(Chinization) 的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晚明以前 (1420-1600)、晚明至五口通商 (1600-1840)、五口通商以後。第一個階段，本土製造不成氣候，眼鏡主要

375 吳廷燮等，《北京市志稿》第 3 冊，〈貨殖志・工業二・器用・眼鏡工〉，頁 434。

376 王樹森，〈老眼鏡店玉華齋及天津的眼鏡業〉，李正中、索玉華主編，《近代天津知名工商業》（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頁 146-147。

377 焦國理、賈秉機等修纂，民國《重修鎮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卷四，〈民族志・風俗〉，頁 488-489。

378 Hommel, *China at Work*, p. 198.

依靠輸入，從涓涓細流（西域進貢），到小溪奔騰（嘉靖以後來自海路），是進口導向時期。第二個階段，從晚明起，玻璃眼鏡進口日增，中國人也開始仿製；更重要的是，盛清時本土的水晶眼鏡興起，而且若干原以製造玻璃眼鏡出名的產地（如蘇州、杭州），後來也轉而生產水晶眼鏡。這一時期，兩種材質的眼鏡在中國各有其市場，江南生產的水晶眼鏡甚至還輸往日本。但本土製造的興起，並不代表其出現所謂的「進口替代」。[379]

消費方面，早期的眼鏡擁有者，非朝廷大臣即邊境官員，取得管道稀少，有錢不見得能獲得，完全談不上市場流通，奢侈品 (luxury goods) 的性格極強。明代後期，這種情況才慢慢改變，但也僅有東南一帶較為常見。明清之際，由於輸入與仿製者越來越多，價格日益便宜。崇禎初年（1630 年代）每副價值銀四、五兩的老花眼鏡，到康熙三十年前後，跌到銀七、八分，甚至二、三分一副。數十年間，中國人在使用老花眼鏡上，經歷了「大眾化」(popularity) 的過程。而在乾隆以後，這種情況更為明顯。至於近視眼鏡，自明清之際傳入後，康熙後半葉以降也慢慢普及。總體而言，清代後期，眼鏡逐漸成為日用品，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自眼鏡發明後，西方人使用眼鏡，雖十六世紀後期曾以線掛耳，但主體上以手持或夾鼻為多，且在十七世紀以後，甚少再採取掛耳的方式。而在中國，非手持的繫於腦後或掛在耳上逐漸成為主流，尤其是後者。因此，就配戴方式而言，十七世紀以後，中國（或是東亞）逐漸與歐美分道揚鑣。這種無腳的眼鏡，常造成鼻子與耳朵的負擔，清人曾戲稱之為耳縴與鼻枷。且隨著年齡變化或眼病日增，必須不斷配置不同度數的眼鏡，鏡片厚度更要添加。為了降低鏡片的壓力，並保持眼鏡的穩定性，額托的出現不啻是一項獨特的發明。

泰半事物在進入異地，與當地社會互動且交融之後，或多或少會出現性質上的變化與認知上的差異，亦即會衍生出各種「在地化」(localization) 現象。上一

[379] 審查人 A 認為：「在明清的中國，眼鏡作為一種舶來品，可以說是在近代早期舶來品本土化最成功的例子之一，我們可以看到明清時期的中國已經具有大量仿製眼鏡的技術，而且在江南製造的眼鏡還外銷到日本。這種現象在研究物質消費者的觀念中稱為『進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就如同英國輸入大量的中國瓷器後，進而在 18 世紀成功的仿造。可惜作者並沒有指出這一點。」筆者對此現象並非沒有思考，只是覺得不應輕率地套用現代概念。在整個清代，本土的水晶眼鏡雖一枝獨秀，但西洋玻璃眼鏡持續輸入，直至清朝滅亡並未終止，「進口」並未被「替代」。在關稅上，包括常關與海關，似乎也看不出特別保護本土的眼鏡。基於本土眼鏡的生產總值，與西洋眼鏡的進口總數無從比較，筆者認為談所謂的「進口替代」，並沒有學術上的意義。

段所談到，就是一例。另一方面，眼鏡在這個過程中被賦予許多意義，特別是在清代尤多異說。最特別的觀點是：玻璃眼鏡經過火冶鍊而成，帶有火性，足以傷眼，不像水晶眼鏡性涼清目，不致有損害。自清初以來，基於物稀為貴的社會心理，水晶眼鏡的價格一直高於玻璃眼鏡。但在乾隆以前，社會上對玻璃眼鏡並未出現「特殊對待」的看法。乾隆以後，貶抑玻璃眼鏡的說法逐漸流行，而水晶眼鏡則受到推崇，清高宗可說是這一觀念的最佳代言人。面對清高宗所謂「玻璃價實廉」的市場衝擊，水晶眼鏡業者必須有其生存之道，製造「說詞」行銷是極為常見的手段。從商業經營角度看，「水晶清目」是清代行銷策略成功的極好案例，雖然這很類似「科學謊言」(scientific lie)，但士大夫囿於陰陽五行的觀念，極為自然地相信這一對比，願意花錢購買水晶眼鏡，而水晶眼鏡也因為這一金字塔頂端的消費群而得以存續，直至清末猶在廣告上主打這一「醫學」觀念。而在另一方面，玻璃眼鏡並不需要太多「代言」，因為面對廣大的低端消費人群，價格低廉已經是一大優勢，昂貴的水晶眼鏡完全無招架之力。或許這是晚清玻璃眼鏡廣告甚少的一個主要因素。

人類與物品，有時存在著緊張關係。清代另一個跟眼鏡有關的觀念，就是眼鏡雖是老人所需，但儘量不要常戴。這種觀念也存在於近視，也認為最好不要戴。特別是清高宗在詩中提到，戴了之後會被眼鏡「宰制」，爾後便不能不戴。為了不「受制」於眼鏡，清代許多高官與文人、畫士，即使是重度近視也不戴眼鏡。與當時西方以手持或夾鼻為主相比，中國人長時間眼鏡掛在耳上，其在眼鏡使用上可能過度，不要常戴的呼籲，或許有利於眼睛休息與耳鼻解脫。不過，假性近視戴度數低的眼鏡得以轉好，但真的近視不戴眼鏡矯正，以致度數越來越深，應是可以想像的。

依照清代社會上的觀念，在尊長面前不得戴眼鏡，反之則尊長具有戴眼鏡的最高位階，面對卑下者不用摘下來。由於上階層具有較高的購買力，且贊同「水晶清目」的說詞，認購水晶眼鏡以符合身分，甚至連眼鏡盒或錦袋也獨樹一格。而在總體使用眼鏡的人群中，戴水晶眼鏡者僅是少數，特別是戴墨晶眼鏡，更是貴中之貴。在此情況下，下階層因眼鏡使用者多為官員或博學之士，遂對戴眼鏡有一種崇拜感。而就如同其他事物，戴眼鏡也出現慣見的社會心理現象——向上仿效。乾隆以降，年輕人或市井之徒在攀比心理驅使下，開始模仿老先生或官員戴眼鏡，甚至是黑晶眼鏡。晚清時，連偷盜之徒也戴著墨晶眼鏡，以降低受害者的心防。

盛清以來，中國本土的眼鏡，基於技術、思維、市場等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導致其在生產、使用上與西方產生歧路。正由於金字塔頂端的高消費群喜愛使用，間接扶持了「奇特」的水晶眼鏡生產，從而使本土眼鏡的產業轉型錯失良機，無法與西方的玻璃眼鏡技術平行發展與銜接，且為晚清水晶眼鏡全面性潰敗埋下禍根。十八世紀，西方眼鏡出現了鏡腳，中國正值十全武功的乾隆盛世。隨後，各種鏡片應運而生，鏡框與鏡腳也越來越輕巧。

五口通商以後，西方各式有腳眼鏡傳入，本土的眼鏡業者展開新一波的模仿，開始製造鬢角眼鏡，但小資本的作坊基於某些原因，無法做出細薄而時髦的輕巧眼鏡；且即使有了鏡腳，又使用玳瑁等高級材質，風格還是顯得笨拙。加上水晶鏡片的折光率原就有其弱點，雖然藉由「清目」之說風行一時，但隨著更加清晰的托力克鏡片傳入，市場接受度開始逆轉，水晶眼鏡店雖降價求售，卻無法躲過被淘汰的命運。光緒年間，是西洋眼鏡與本土眼鏡死亡交叉的轉捩點。原來的舶來品，經過了五百年，變成了土貨，「局部進化」(local evolution) 的中式眼鏡，在美學與舒適度上已相形見絀。與舊式厚重水晶眼鏡相比，新樣式與新材質眼鏡所帶來的舒適感，加上崇洋心理作祟，細邊眼鏡這一炫耀性商品成為流行時尚與消費之所在。而「上自官署，下至娼妓」所戴的墨晶眼鏡，已非傳統的樣式與材質，而是西式金邊、銀邊及托力克鏡片。

明代以降的眼鏡，做為中國社會化的一個物品，在其生命歷程中，從最初的明目功能，持續添加各種中國特性與文化標記，並創造本土化的水晶眼鏡，獲得上階層「主流觀念」(mainstream concept) 的加持，與西方的眼鏡產業史背道而馳，造就近二百年的水晶眼鏡產業榮景。而自盛清以降，即使玻璃眼鏡隨處可見，且價格低廉，卻逐步被敵視、被冷落、被放逐於中國社會話語邊緣。曾經主導上階層尊榮的水晶眼鏡，與中下階層使用的玻璃眼鏡，在那段歷史時空中彼此交錯。水晶眼鏡的生老病死，或許是一個美麗的傳奇。而本土玻璃眼鏡，技術停滯不前，更顯得平淡無奇。這兩者，都在二十世紀以後，逐漸被輕巧明亮的新式眼鏡所取代。

自眼鏡傳入中國以來，店家所提供的眼鏡鏡片，除了孫雲球之外，多半是十二種度數的製成品，選擇性不大。使用者度數無法完全契合，應該在情理之中。清朝末年，驗光表及機器驗光自西方輸入，是中國眼鏡業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進入二十世紀，在土洋眼鏡店的競爭中，上海全昌金鋼鑽號雖販賣西式眼鏡，但刊登廣告時卻還要標榜自創、且以推廣土貨與挽回利權為宗旨，將眼鏡貼上商戰與

民族主義的標籤，從而眼鏡不再祇是眼鏡。面對新舶來品的壓力，若干華商邁出新的步伐，開設新式眼鏡公司，採取機器驗光，使用合成鏡片配鏡，甚至自行製造鏡片，以挽回市場的佔有率。這是本土眼鏡製造業的一個新開端，其中又以中國精益眼鏡公司最為成功。

2008.08.14 初稿，2019.02.12 定稿

（本文於民國一〇七年一月三日收稿；同年八月二十三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文初稿曾多次在學術會議上宣讀，其先後為：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江南與中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2008 年 9 月 6-8 日）；中央研究院「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主題計畫、法國遠東學院臺北中心等單位合辦，“Urban Life in China: from the 15th to the 20th Century” 國際學術研討會 (Paris: the Main Headquarters of the 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December 4-6, 2008)；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新史學雜誌社、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合辦，「《新史學》與臺灣史學二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2009 年 12 月 12-14 日）；並在本所一〇一年度第 20 次講論會（2012 年 12 月 10 日）上報告。感謝鄒振環、范金民、王振忠、Pierre-Etienne Will、陳光祖、戴麗娟等先生惠賜意見。兩位審查人辛勞審閱本文，提出寶貴意見，謹於此頓首拜謝。

附表一：《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唐船貨物改帳》所載眼鏡輸日數量

年代	船番等	種類	個數
承應 3 年 (1654.07.11)	柬埔寨 (V.O.C.)	鼻眼鏡	200
明曆 3 年 (1657.07.14)	安海船 (V.O.C.)	中國眼鏡	150
寬文 2 年 (1662.06.15)		眼鏡	1,600
寬文 3 年 (1663.07.04)	安海船	眼鏡	2,000
寬文 3 年 (1663.07.13)	安海船	鼻眼鏡	700
延享 3 年 (1746.03.10)	七番南京船	眼鏡	3,480
寶曆 4 年 (1754.09.27)	二十六番南京船	眼鏡	300
寶曆 4 年 (1754.10.02)	二十八番乍浦船	擴大鏡	3,350
寶曆 6 年 (1756.04.27)	四番福建船	眼鏡	2,560
明和 4 年 (1767.01.27)	三番乍浦船	眼鏡	1,000
明和 5 年 (1768) 夏	七番乍浦船	眼鏡	600
明和 5 年 (1768.08.02)	八番南京船	眼鏡	10,000
明和 5 年 (1768)	十番乍浦船	眼鏡	110
明和 5 年 (1768)	十一番南京船	眼鏡	650
明和 5 年 (1768.08.08)	十二番乍浦船	眼鏡	300
明和 5 年 (1768.08.08)	十二番乍浦船	眼鏡	39
明和 6 年 (1769) 秋	十四番乍浦船	眼鏡	3,850
安永 2 年 (1773.09.15)	九番乍浦船	眼鏡	90
安永 4 年 (1775.12.28)	十三番乍浦船	眼鏡	30
安永 6 年 (1777.12.09)	九番乍浦船	眼鏡	10
安永 7 年 (1778) 八月	八番乍浦船	眼鏡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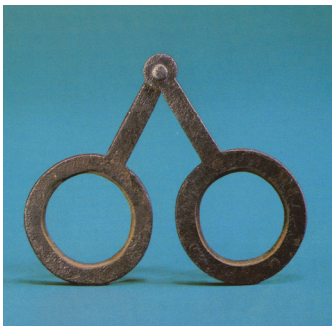
年代	船番等	種類	個數
天明 1 年 (1782.01.24)	九番乍浦船	眼鏡	1,000
天明 4 年 (1784.01.01)	七番乍浦船	眼鏡	15
天明 7-8 年 (1787-1788)	十一番船	眼鏡	30
寬政 7-8 年 (1795-1796)	三番船	眼鏡	550
寬政 12 年–享和 1 年 (1800-1801)	七番船	眼鏡	24
文化 1-2 年 (1804-1805)	九番船	眼鏡	24

資料來源：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 1637-1833 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東京：創文社，1987），第 II 部〈唐船輸入目錄——唐船貨物改帳〉，頁 59, 75, 91-92, 118, 132, 134, 154-156, 158, 166, 170, 173, 175, 181, 187, 194, 205, 212, 218。

附表二：《唐船輸出入品數量一覽》輸入年度目錄所載眼鏡輸日數量

年代	船番等	種類	個數
正保 1 年 (1644.11.14)		鼻眼鏡	1,620
明曆 3 年 (1657.07.14)	安海船等	中國眼鏡	150
萬治 2 年 (1659)	中國、柬埔寨等	眼鏡	4,061
寬文 1-2 年 (1661.09.18-1662.11.05)	V.O.C.	眼鏡	9,745
寬文 2-3 年 (1662.10.20-1663.10.20)		鼻眼鏡	2,700
寬文 5 年 (1665)	V.O.C.	鼻眼鏡	2,045
延寶 8 年 (1680.11.11)	V.O.C.	眼鏡	300
天和 3 年 (1683.11.07)	V.O.C.	眼鏡	450

資料來源：永積洋子，《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 1637-1833 年》，第 IV 部〈附錄——唐船輸入品年度別目錄〉，頁 333, 339-341, 343-346, 348-349。



圖一：歐洲十四世紀的鐵框眼鏡
(Winkler,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p.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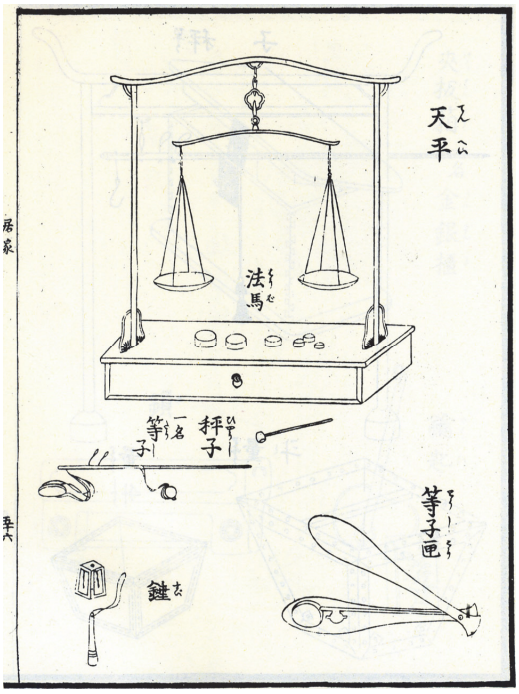
圖二：一三五二年 Tommaso da Modena 繪 Hugh of Saint-Cher 像
（Wikidata 網 Hugh of Saint-Cher 條，
https://www.wikidata.org/wiki/Q1365254，讀取 2018.12.22）



圖三：Girolamo Capivaccio 肖像（約 1580 年）
(Corson, *Fashions in Eyeglasses*, p. 33)



圖四：Fernando Niño de Guevara 樞機主教肖像（約 1600 年）
（Wikidata 網 Cardinal Fernando Niño de Guevara 條，
https://www.wikidata.org/wiki/Q3784753，讀取 2018.12.22）



圖五：等子匣式樣

（中川子信編述，《清俗紀聞》〔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卷二，〈居家〉，頁 177）



圖六：晚明《南都繁會圖卷》中戴眼鏡的兩位老人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著，《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圖 184）



圖七：乾隆時杭州的提盒小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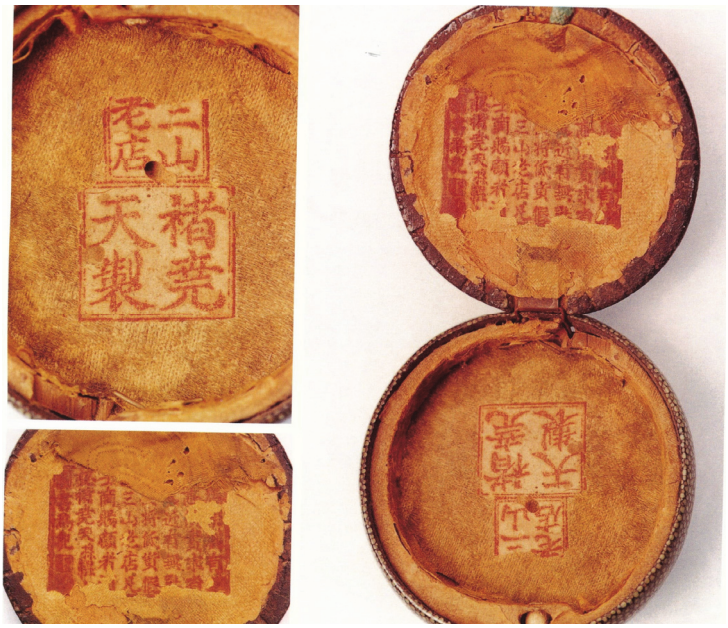
（左圖取自清・方薰繪，《太平歡樂圖》〔清光緒十五年石印重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頁 39a；右圖取自清・董棨彩繪，《太平歡樂圖》〔北京：學林出版社，2003〕，圖 46，〈雜貨籃〉，頁 92）



圖八：清人繪《蘇州市景商業圖冊》中的益美齋水晶眼鏡鋪
（紅葉山房古籍文庫，http://hongyeshan.com/post/7288.html，讀取 2018.1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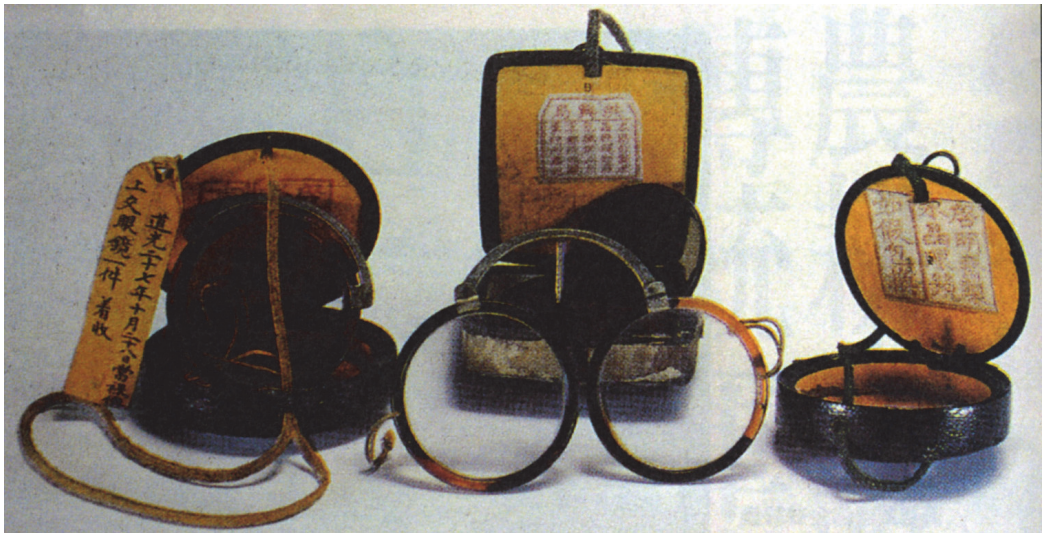
圖九：清人繪《蘇州市景商業圖冊》北寺街上戴眼鏡的老人
（紅葉山房古籍文庫，http://hongyeshan.com/post/7288.html，讀取 2018.12.18）



圖一〇：清中葉褚三山眼鏡老店之眼鏡盒及其廣告（一）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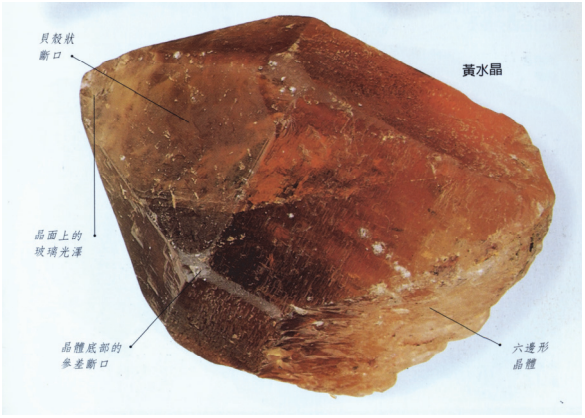
圖一一：清中葉褚三山眼鏡老店之眼鏡盒及其廣告（二）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107）



圖一二：北京故宮藏清宣宗所用眼鏡
（郭福祥，〈乾隆與眼鏡〉，頁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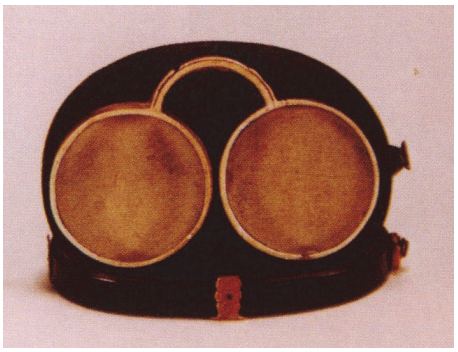


圖一三：天然白水晶、黑水晶礦石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18）



圖一四：黃水晶礦石

（克里斯佩倫特著，朱靜江譯，《岩石與礦物圖鑑》〔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6〕，頁 87）



圖一五：清中葉的茶晶眼鏡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43）



圖一六：一八七〇年廣州製木質鏡框玻璃眼鏡

（廣州博物館編，《廣州歷史陳列圖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頁 277）



圖一七：乾隆末年戴眼鏡的官員

(William Alexander,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Murray by W. Bulmer, 1814], plate 15)



圖一八：乾隆末年戴眼鏡的老農

（劉潞、吳芳思編譯，《帝國掠影——英國使團畫家筆下的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163）



圖一九：清中葉廣州戴眼鏡的補鞋匠

（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廣州市文化局等編，
《18-19 世紀羊城風物——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藏廣州外銷畫》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50）



圖二〇：清代戴眼鏡的醫生、算士

(K. Y. Solonin, *The Bretschneider Albums: 19th Century Paintings of Life in China* [Reading, UK: Garnet Publishing Limited, 1995], pp. 76,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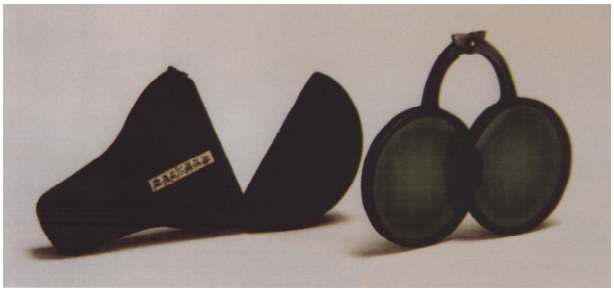


圖二一：清中葉戴眼鏡看書的老人

(Anthony Lawrence, *The Taipan Traders: A Portrait of Hong Kong's Days of Youth from the Finest Collections of China Trade Paintings* [Hong Kong: FormAsia Books Limited, 1992], p. 80)



圖二二：西方十九世紀中葉的扇角眼鏡
(Poulet, *Atlas on the History of Spectacles*, vol. 1, p. 238)



圖二三：北京故宮藏清代玻璃近視眼鏡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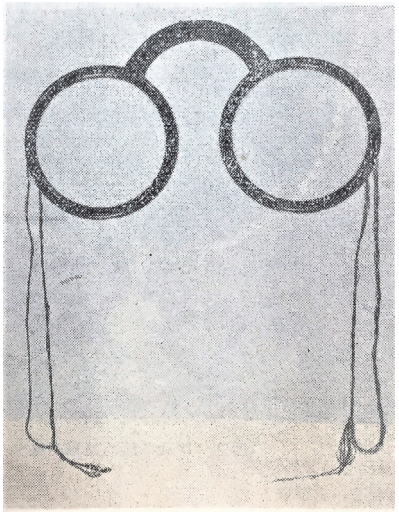


圖二四：乾隆末年戴近視眼鏡的年輕人
(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The Folio Society, 2004], p. 161)



圖二五：晚清一個戴眼鏡家族

(Mrs. Archibald Little, *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 [London: Hutchinson & Co., 1899], p. 107)



圖二六：畢沅的眼鏡

（南波，〈江蘇吳縣清畢沅墓發掘簡報——
十八世紀後期一個官僚地主奢侈腐朽生活的寫照〉，
《文物資料叢刊》創刊號〔北京：文物出版社，1977〕，頁 148）



圖二七：清代無腳的眼鏡與眼鏡盒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39）



圖二八：清代後期的額托眼鏡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37）



圖二九：清代後期有額托的眼鏡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 64)



圖三〇：清後期戴額托眼鏡的老人

（李弘著，Roy Massey 譯，《京華遺韵：西方版畫中的明清老北京 (1598-1902)》〔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頁 18）



圖三一：西方的鬢角眼鏡及其眼鏡盒（約 1740 年）
(Winkler,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p. 71)



圖三二：十九世紀早期的折腳鬢角眼鏡
(Winkler,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p. 103)



圖三三：一八三三年錢納利繪《郭雷樞醫生治病圖》
(Peter Moss, *Chinnery in China* [Hong Kong: FormAsia Books Limited, 2007], p. 65)



圖三四：一八三〇年代西人所見中國眼鏡戴法
(Davis, *China*, vol. 2, p. 261)



圖三五：一八六〇年代初 Milton Miller 在廣東所攝的翻譯官
(Clark Worswick and Jonathan Spence,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 [London: Scolar Press, 1979], p. 73)



圖三六：一八六〇年代初 Milton Miller 在香港鄉間拍攝的婦女
（中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編著，《英國藏中國歷史照片 1860-1930》〔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上冊，頁 99）



圖三七：一八七〇年代初 John Thomson 拍攝的北京官員
（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編著，《約翰・湯姆遜眼中的中國：1868-1872》〔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09〕，頁 31）



圖三八：一八七〇年代初 John Thomson 拍攝的一位廣東老先生
(Thomson,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vol. 1, plate 11)



圖三九：一八七〇年代初 John Thomson 在九江拍攝的算命先生
(Thomson,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vol. 3, plate 14)



圖四〇：廣州戴眼鏡寫真的畫匠（1882 年初）

(Archibald Ross Colquhoun, *Across Chrysê: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 [London: S.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1883], vol. 1, p. 27)



圖四一：廣州戴眼鏡的算命先生（1882 年）

(Colquhoun, *Across Chrysê*, vol. 1, p. 101)



圖四二：雲南開化府一位戴鬢腳眼鏡的教師（1882 年）
(Colquhoun, *Across Chrysê*, vol. 1, p. 360)



圖四三：晚清廣州製水晶折腳鬢角眼鏡
（廣州博物館，《廣州歷史陳列圖冊》，頁 276。
該書編纂者認為這些眼鏡為嘉慶年間所製，筆者表示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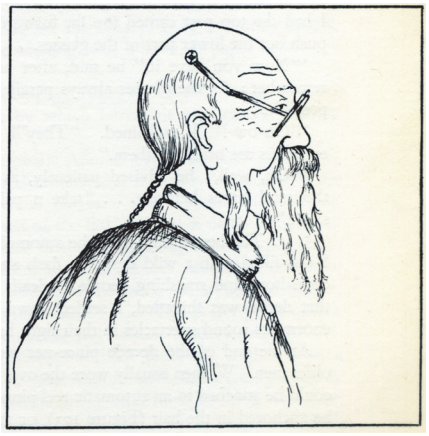
圖四四：一八五八年廣州街頭的一場叫賣會

（沈弘，《《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晚清 1842-1873》中冊，頁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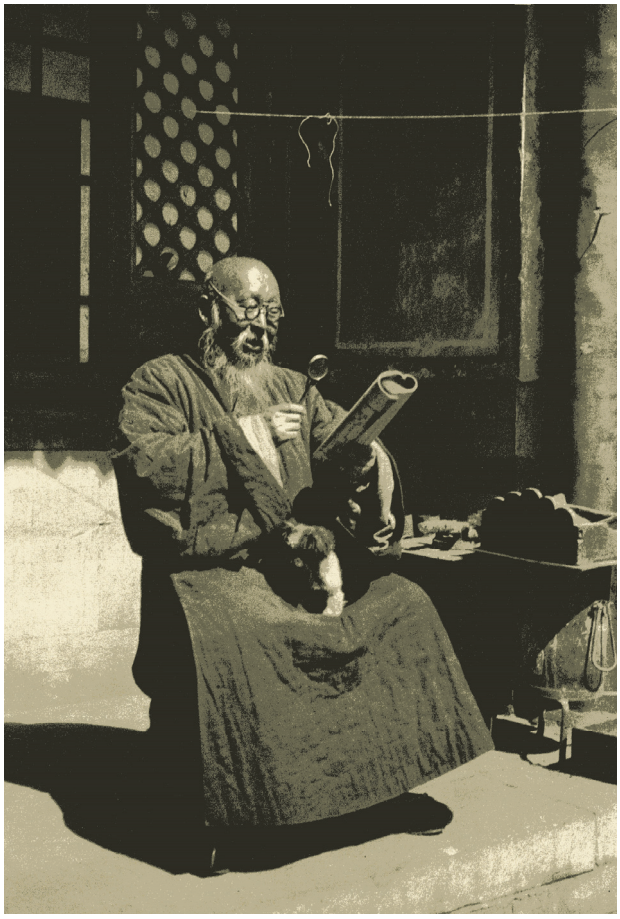
圖四五：一九〇〇年廣東的牙醫拔牙照片

(Worswick and Spence,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 p. 80)



圖四六：清末天津眼科醫生 Rasmussen 所見中國人戴眼鏡方式

(Corson, *Fashions in Eyeglasses*, p. 213)



圖四七：民初老先生看書圖

(Heinz v. Perckhammer,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p. 36)



圖四八：清代的各種瓠形眼鏡盒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 92. 以上均為黑檀木雕）



圖四九：清代各種無腳眼鏡的眼鏡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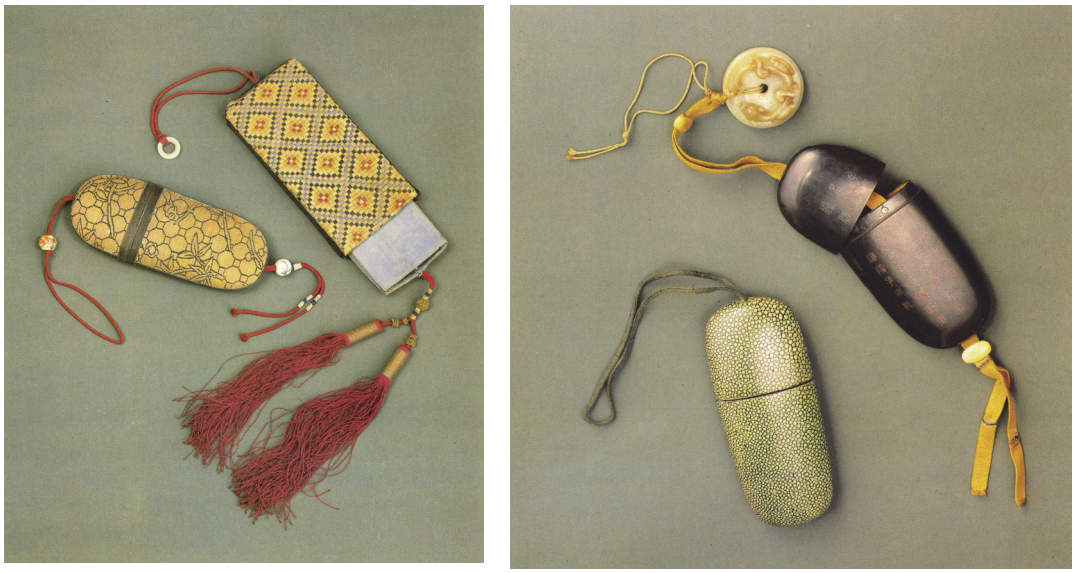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 67.
上排中間可能為黃楊木雕；下排左邊為緙絲，右邊為鯊魚皮）



圖五〇：清代具有吉慶寓意的眼鏡盒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101, 107）



圖五一：清代木雕鑲寶石的眼鏡盒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p. 82, 329)



圖五二：清代後期放置眼鏡的匣盒

(Winkler,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pp. 152-153)



圖五三：清代放置眼鏡的錦囊

(Winkler,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pp. 133, 135)





圖五四：清代文人化的眼鏡盒

（上圖取自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39；
下圖取自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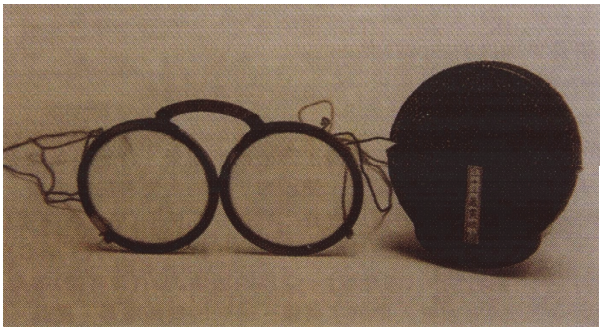
圖五五：清代文人化的眼鏡盒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p. 85, 92. 右圖為象牙材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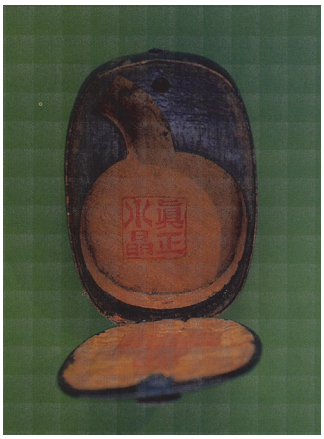


圖五六：清代上階層婦女的眼鏡盒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85）



圖五七：北京故宮藏雍正朝製黃玻璃眼鏡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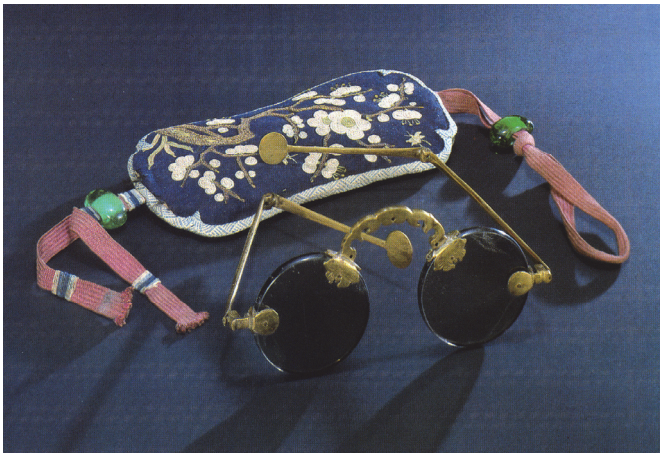


圖五八：清代前期的水晶眼鏡盒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 86)



圖五九：晚清的七學士瓷畫

(Rosenthal,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p. 76)



圖六〇：清末的折腳墨晶眼鏡

(Winkler,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p.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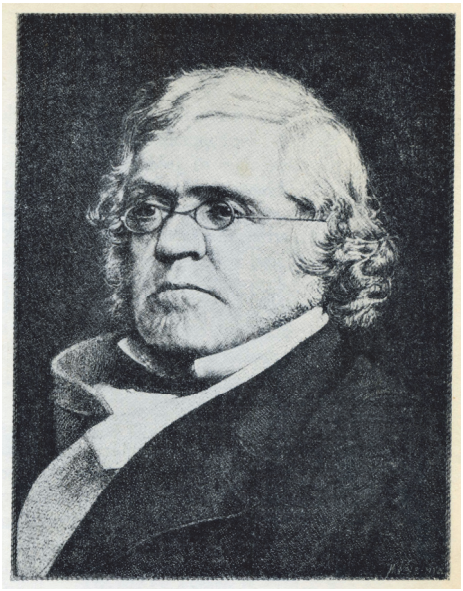


圖六一：一八七四年 A. E. Boyarsky 在西北所攝士人合照
(Vitaly Naumkin, ed., *Caught in Time: Great Photographic Archives—China* [Reading, UK: Garnet Publishing Limited, 1993], p. 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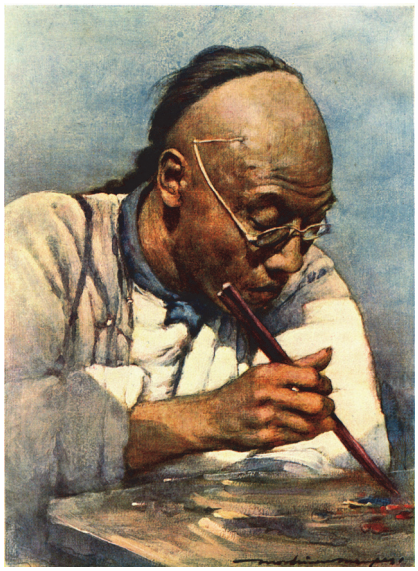


圖六二：晚清戴墨晶眼鏡的縣官

（陳玲、王迦南、蔡小麗編著，林婉媚翻譯，
《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國——1898-1908 年在華西方人明信片解讀》
〔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 48。明信片寄送年代為 1901 年）



圖六三：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 (1811-1863) 照片
(Corson, *Fashions in Eyeglasses*, p. 137)



圖六四：清末戴折腳鬢角眼鏡者
(Mortimer Menpes and Henry Arthur Blake, *China*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09], p. 33)



圖六五：金城 (1878-1926) 著清裝照片

（Cyril Pearl 著，沈嘉蔚編撰，竇坤等譯，《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北京的莫理循》〔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頁 115）



圖六六：晚清上海的人力車夫與戴金絲眼鏡的乘客
(Arthur Hacker, *China Illustrated: Western Views of the Middle Kingdom* [Boston, MA: Tuttle Publishing, 2004], p. 134)





圖六七：戴無邊金絲眼鏡的李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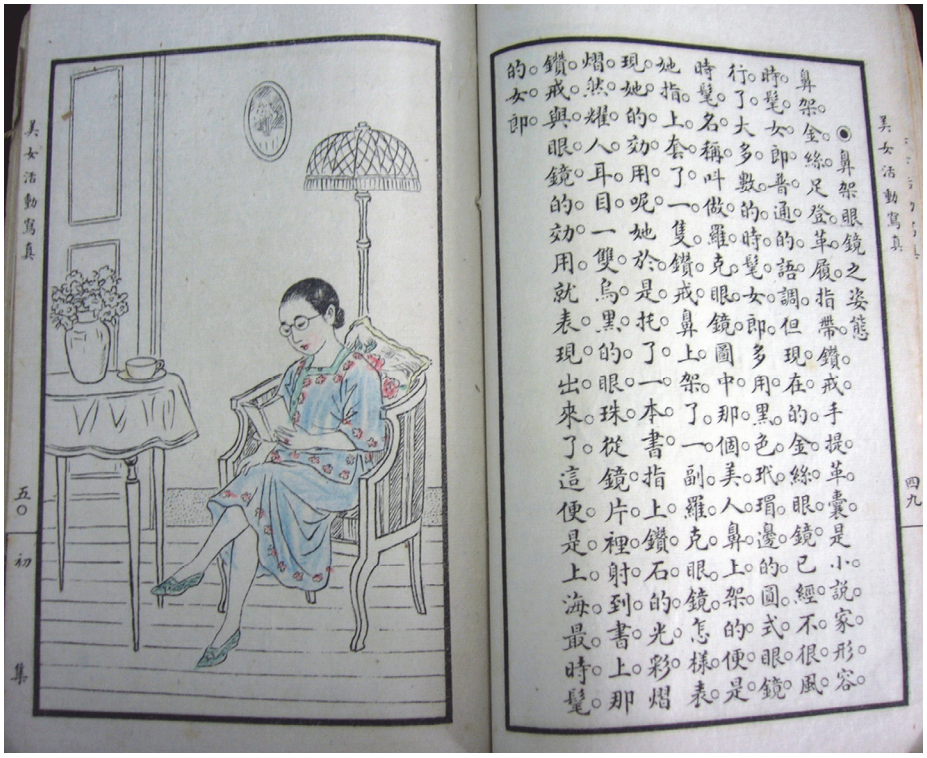
（左圖取自趙省偉、李小玉編譯，《法國彩色畫報記錄的中國 1850-1937》〔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15〕，上冊，頁 44；
右圖取自李弘，《京華遺韵》，頁 155）



圖六八：漢口醫學院一九〇八年第一屆畢業生
（中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
《英國藏中國歷史照片 1860-1930》下冊，頁 402）



圖六九：清末民初的西洋金絲墨晶鉤耳眼鏡
（趙孟江，《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頁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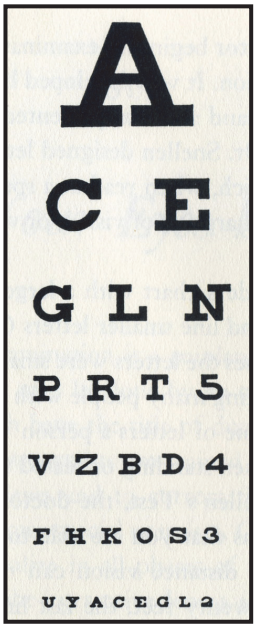


圖七〇：民初上海時髦婦女戴羅克眼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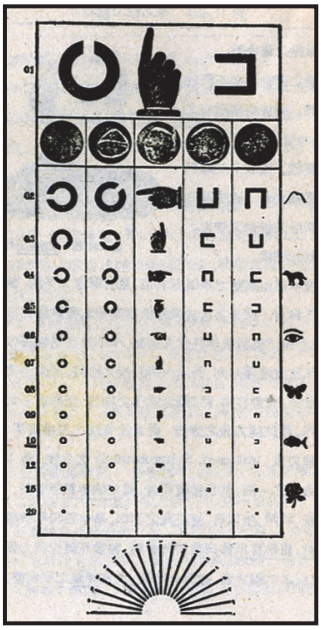
（李涵秋，《美女活動寫真・初集》，〈鼻架眼鏡之姿態〉，頁 49）



圖七一：一五八二年法蘭德斯畫家 Stradano 的版畫《眼鏡》
(Winkler,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p. 41)



圖七二：Snellen 視力表
(Brindze, *Look How Many People Wear Glasses*, p. 34)



圖七三：Landolt 視力表
（山田幸五郎，《眼鏡》，頁 122）



圖七四：宣統二年九月全昌號廣告

（《申報》，宣統二年九月廿六日，第 1 張後幅第 7 版，〈全昌〉）



圖七五：民國元年十一月全昌號驗光圖

（《申報》，民國元年十一月廿九日，第 1 張第 4 版，〈全昌配驗眼光圖說〉）



圖七六：民國三年華明眼鏡公司驗光圖

（《申報》，民國三年一月二十日，第 1 張第 4 版，〈華明製造眼鏡公司〉）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隋・巢元方著，丁光迪等校注，《諸病源候論校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1-1992。

金・李杲，《東垣醫集・東垣試效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3。

明・不著撰人，《居家必備》，明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明・方以智，《通雅》，北京：中國書店，1990。

明・王三聘，《事物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明・史傑，《薇線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田藝蘅撰，朱碧蓮點校，《留青日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明・申時行等纂，萬曆《大明會典》，臺北：東南書報社，1963。

明・艾南英，《艾千子先生全稿》，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吳寬，《匏翁家藏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明・沈周著，張修齡、韓星嬰點校，《石田先生詩鈔》，收入《沈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明・周清原著，劉耀林、徐元校注，《西湖二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明・杭州北新關制訂，李志庭標點，崇禎《北新關商稅則例》，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明・郎瑛，《七修類稿・續稿》，北京：中華書局，1959。

明・徐燉，《鼇峰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明・秦夔，《五峰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明・婁堅，《吳歈小草》，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明・張萱，《疑耀》，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明・張寧，《方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明・張寧，《方洲雜錄》，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

明・梁兆陽修，崇禎《海澄縣志》，明崇禎六年刊本微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明・陳懋仁輯，《庶物異名疏》，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明・傅仁宇，《傅氏眼科審視瑤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明・馮夢龍編，馬清江校點，《廣笑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明・楊士聰，《玉堂薈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明・錢謙益著，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清・孔尚任，《節序同風錄》，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6。
清・孔尚任著，徐振貴等輯校，《岸堂稿》，收入《孔尚任全集輯校註評》第 3 冊，濟南：齊魯書社，2004。
清・文昭，《紫幢軒詩集・飛騰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方濬頤，《二知軒詩續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方薰繪，《太平歡樂圖》，清光緒十五年石印重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清・王士禎，《居易錄》，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清・王芑孫，《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王琛等纂，光緒《邵武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
清・王豫、阮亨輯，《淮海英靈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王韜著，方行、湯志鈞整理，《王韜日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成芸，《雪巖五種・珠船錄》，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
清・江昱，《松泉詩集・香山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清・佚名，《安平縣雜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清・佚名，《常稅則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佚名，光緒《崇文門商稅現行則例》，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
清・佚名，康熙《督理崇文門商稅鹽稅》，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8。
清・吳子光，《一肚皮集》，板橋：龍文出版社，2001。
清・吳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臺北：世界書局，1959。
清・吳養原編，《文節府君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清・宋如林、石韞玉等修纂，道光《蘇州府志》，清道光四年刊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清・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李斗著，汪北平、涂雨公點校，《揚州畫舫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清・李杕主編，《益聞錄》，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
清・李光庭著，石繼昌點校，《鄉言解頤》，北京：中華書局，1982。
清・李伯元，《官場現形記》，臺北：世界書局，1957。
清・李棠階，《李文清公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桃花聖解盦日記》，臺北：文光圖書公司，1963。
清・李漁撰，崔子恩校點，《覺世名言十二樓》，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
清・杞廬主人等，《時務通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汪縉，《汪子文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沈岸登，《黑蝶齋詩鈔》，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清・阮元撰，鄧經元點校，《揅經室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5。
清・周家楣、繆荃孫等修纂，左笑鴻標點，光緒《順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清・周凱纂修，道光《廈門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
清・周廣業，《過夏續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林佶，《樸學齋詩稿》，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清・法式善，《存素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金張，《岕老編年詩鈔》，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清・俞正燮，《癸巳存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俞樾，《春在堂全書・曲園自述詩》，臺北：中國文獻出版社，1968。
清・姚元之撰，李解民點校，《竹葉亭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清・宣鼎，《夜雨秋燈錄》，臺北：文光圖書公司，1977。
清・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清・查慎行，《敬業堂詩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段玉裁編，《戴東原先生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清・段光清撰，中國科學院安徽分院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點校，《鏡湖自撰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60。
清・英國教士湛約翰主編，《中外新聞七日錄》，臺北：華文書局，1969。
清・范方，《默鏡居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清・范端昂撰，湯志岳校注，《粵中見聞》，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清・迮朗，《繪事瑣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孫承澤，《硯山齋雜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孫雲球，《鏡史》，清康熙十九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清・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臺北：食貨出版社，1977。
清・徐豫貞，《逃莽詩草》，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格致新報編，《格致新報》，臺北：文海出版社，1987。

清・殷葆誠，《追憶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清・袁枚著，王英志校點，《隨園詩話補遺》，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清・袁枚著，周本淳標校，《小倉山房詩文集・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清・袁棟，《書隱叢說》，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清・馬星冀，《東泉詩話》，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清・庸叟，《庸叟編年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清・張德彝，《三述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張蔭桓，《三洲日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張璐，《張氏醫通》，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清・張謇，《嗇翁自訂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清・曹庭棟，《老老恒言》，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清・曹斯棟，《稗販》，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梁廷枏，《粵海關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許夢閎編纂，李志庭等標點，雍正《北新關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
清・陳恭尹，《獨漉堂詩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陳康祺撰，晉石點校，《郎潛紀聞二筆》，北京：中華書局，1984。
清・陳梓，《刪後詩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陳確，《陳確集・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清・陶季，《舟車集》，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7。
清・傅山著，張海瀛等編，《傅山全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清・曾衍東著，盛偉校點，《小豆棚》，濟南：齊魯書社，1991。
清・曾國藩，《曾文正公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雅爾哈善、傅椿修纂，乾隆《蘇州府志》，清乾隆十三年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
清・黃芝撰，林子雄點校，《粵小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
清・黃庭鏡，《目經大成》，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
清・楊米人，《都門竹枝詞》，收入路工編選，《清代北京竹枝詞》，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清・楊賓，《楊大瓢日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
清・楊靜亭，道光《都門紀略》，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北京：首都圖書館藏。
清・楊靜亭編，張琴等增補，同治《都門紀略》，揚州：廣陵書社，2003。
清・葉夢珠撰，來新夏點校，《閱世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清・葛元煦，《滬遊雜記》，臺北：廣文書局，1972。
清・董沛，《正誼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董棨彩繪，《太平歡樂圖》，北京：學林出版社，2003。
清・路德，《椶華館全集・椶華館雜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褚人穫，《堅瓠集・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趙翼著，欒保群、呂宗力校點，《陔餘叢考》，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清・趙翼撰，李學穎、曹光甫校點，《甌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劉廷璣，《在園雜志》，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清・劉靖，《片刻餘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清・劉翼明，《海上隨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9。
清・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齋三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劉聲木撰，劉篤齡點校，《萇楚齋隨筆》，北京：中華書局，1998。
清・德福，《閩政領要》，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4。
清・慶桂等奉敕撰，《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
清・潘尚楫、鄧士憲等修纂，道光《南海縣志》，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2007。
清・蔡衍鏞，《操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四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五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蔣溥等奉敕編，《御製詩・餘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鄧文濱，《醒睡錄》，臺北：廣文書局，1970。
清・鄭虎文，《吞松閣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鄭復光著，李磊譯注，《鏡鏡詮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清・學秋氏，《續都門竹枝詞》，收入路工，《清代北京竹枝詞》。
清・盧文弨，《抱經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清・錢思元、孫珮輯，朱琴點校，《吳門補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清・頤安主人，《滬江商業市景詞》，收入顧秉權編，《上海洋場竹枝詞》，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
清・環球社編輯部，《圖畫日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清・羅天尺，《癭暈山房詩刪》，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清・顧震濤撰，甘蘭經等校點，《吳門表隱》，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清・顧鎮，《黃侍郎公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
中川子信編述，《清俗紀聞》，臺北：大立出版社，1982。
中國國家圖書館、大英圖書館編著，《英國藏中國歷史照片 1860-1930》，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
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編著，《約翰・湯姆遜眼中的中國：1868-1872》，北京：中國攝影出版社，2009。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香港：大華出版社，1971。
申報社，《申報》，上海：上海書店，1982-1987。
伊凡著，張小貴、楊向豔譯，《廣州城內——法國公使隨員 1840 年代廣州見聞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朱家溍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一輯・雍正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吳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
吳馨、姚文枏等修纂，民國《上海縣續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
李涵秋，《美女活動寫真・初集》，上海：世界書局，1922。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1 冊，서울（漢城，今首爾）：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廣州市文化局等編，《18-19 世紀羊城風物——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藏廣州外銷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夏仁虎著，駢志騫整理，《舊京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
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徐有素，《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燕行錄全集》第 81 冊。
徐明庭、張穎、杜宏英輯校，《湖北竹枝詞》，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徐珂，《可言》，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徐珂編撰，《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
馬敘倫，《石屋續瀋》，上海：建文書店，1949。
陳無我，《老上海三十年見聞錄》，上海：大東書局，1928。
傅崇榘編，《成都通覽》，成都：通俗報社，1909。
斯當東 (George Staunton) 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香港：三聯書店，1994。
焦國理、賈秉機等修纂，民國《重修鎮原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錢祥保、桂邦傑等修纂，民國《續修江都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

Cyril Pearl 著，沈嘉蔚編撰，竇坤等譯，《莫理循眼裡的近代中國：北京的莫理循》，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Alexander, William. *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London: Printed for John Murray by W. Bulmer, 1814.

Colquhoun, Archibald Ross. *Across Chrysê: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Journey of Exploration through the South China Border Lands from Canton to Mandalay*. London: S. Low, Marston, Searle, and Rivington, 1883.

Davis, John Francis. *China: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at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John Murray, 1836.

Little, Archibald Mrs. *Intimate China: The Chinese as I Have Seen Them*. London: Hutchinson & Co., 1899.

Macartney, George.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The Folio Society, 2004.

Menpes, Mortimer, and Henry Arthur Blake. *China*. London: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09.

Naumkin, Vitaly, ed. *Caught in Time: Great Photographic Archives—China*. Reading, UK: Garnet Publishing Limited, 1993.

Perckhammer, Heinz v. *Peking*. Berlin: Albertus-Verlag, 1928.

Solonin, K. Y. *The Bretschneider Albums: 19th Century Paintings of Life in China*. Reading, UK: Garnet Publishing Limited, 1995.

Thomson, John. *China and Its People in Early Photographs: An Unabridged Reprint of the Classic 1873/4 Work*.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2.

Williams, Samuel Well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of the Chinese Empire and its Inhabitants*. London: W. H. Allen & Co., 1883.

Worswick, Clark, and Jonathan Spence. *Imperial China Photographs, 1850-1912*. London: Scolar Press, 1979.

二・近人論著

丁燮山

2015　〈眼鏡之傳入中國和普及〉，《尋根》2015.3：34-38。

于善浦

1989　〈雍正帝的喜好〉，《紫禁城》1989.4：9-13。

山田幸五郎著，程思進譯
1973 《眼鏡》，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干福熹等
2016 《中國古代玻璃技術發展史》，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國歷史博物館編著
1984 《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文物出版社。
天笑生（包天笑）
1922 〈我之眼鏡歷史〉，《世界畫報》32：20-21。
毛憲民
1996 〈故宮珍藏的眼鏡〉，《紫禁城》1996.3：32-34。
2002 〈清代宮廷眼鏡研究〉，《文物世界》2002.1：13-19。
王永斌
1999 《北京的商業街和老字號》，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王庭顯
1991 《左宗棠的幼年、青年和中年》，上海：燎原印刷廠。
王素存
1977 《閒話玩古》，臺北：視聽教育出版社。
王爾敏
1976 〈商戰觀念與重商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1-91。
王稼句
2012 〈孫家眼鏡〉，《蘇州雜誌》2012.5：29-32。
王樹森
2004 〈老眼鏡店玉華齋及天津的眼鏡業〉，李正中、索玉華主編，《近代天津知名工商業》，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頁 146-155。
王錦光、洪震寰
1981 《中國古代物理學史話》，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6 《中國光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平人
1936 〈眼鏡與禮節・民三四年間的趣史〉，《立報》，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五日，第 2 張。
向娟
2010 〈民族主義語境下的國貨運動與《申報》廣告 (1912-1926)〉，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

朱晟
1983 〈玻璃・眼鏡考及其它〉，《中國科技史料》4.2：79-86。
佚名
1930 〈「戴眼鏡」的民族〉，《北大廣東同鄉會年刊》4：186。
1995 〈中醫五行說——水晶眼鏡清除眼火〉，《中國眼鏡科技雜誌》1995.2：64。
李弘著，Roy Massey 譯
2008 《京華遺韵：西方版畫中的明清老北京 (1598-1902)》，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李長莉
2002 《晚清上海社會的變遷——生活與倫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約瑟、魯桂珍著，王冰譯
1986 〈江蘇的光學技藝家〉，潘吉星主編，《李約瑟文集》，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頁 532-566。
李慎
2006 〈明清之際西洋眼鏡在中國的傳播〉，《澳門歷史研究》2006.5：108-116。
2007 〈明清之際西洋眼鏡在中國的傳播〉，廣州：暨南大學碩士論文。
克里斯佩倫特著，朱靜江譯
1996 《岩石與礦物圖鑑》，臺北：貓頭鷹出版社，1996。
杜其堡
1956 《地質礦物學大辭典》，香港：新亞書店。
沈弘編譯
2014 《《倫敦新聞畫報》記錄的晚清 1842-1873》，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來生 (C. P. Rakusen) 著，梅晉良譯
1936 〈中國眼鏡的歷史〉，《中華醫學雜誌》22.11：1077-1107。
卓達雄編修
2007 《視光學基礎》，中和：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周士琦
2002 〈眼鏡東傳小史〉，《尋根》2002.3：62-64。
和風
2008 〈沒有創新，就沒有老字號的今天——記「吳良材」和「茂昌」〉，《上海質量》2008.4：46-50。

邱仲麟
2013 〈明清的西洋鏡與視覺感官的開發〉，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頁377-447。
邱澎生
2006 〈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的辯證〉，《新史學》17.4：1-14。
2010 〈消費使人愉悅：略談明清史學界的物質文化研究〉，《思想》15：129-147。
邱韻如
2015 〈明清眼鏡之文本溯源與時空背景探查〉，《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20：56-72。
侯皓之
2007 〈佩察秋毫細——從檔案記載談雍正皇帝與眼鏡〉，《故宮文物月刊》297：52-60。
俞醉仙
1923 〈眼鏡之研究〉，《小報》9：28-34。
南波
1977 〈江蘇吳縣清畢沅墓發掘簡報——十八世紀後期一個官僚地主奢侈腐朽生活的寫照〉，《文物資料叢刊》創刊號，北京：文物出版社，頁141-148。
昨非
1919 〈余之眼鏡歷史〉，《清華週刊》161：15-16。
洪震寰
1994 〈眼鏡在中國之發始考〉，《中國科技史料》15.1：71-75。
胡源
2009 〈明清時期眼鏡在京城的流行〉，《科技潮》2009.7：52-54。
胡懷琛
1936 〈眼鏡在中國〉，《逸經》9：44-45。
香港歷史博物館編
2005 《東方印象：錢納利繪畫展》，香港：香港歷史博物館。
殷登國
2006 《東西文物趣談》，臺北：知書房。
孫承晟
2007 〈明清之際西方光學知識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孫雲球《鏡史》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26.3：363-376。

孫無痕

1999 〈專諸巷的眼鏡——兼記古代光學專家孫雲球〉，《江蘇地方志》1999.4：53-54。

徐曉望

2002 〈論明末清初漳州區域市場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2.4：26-39。

時得之（孫機）

1988 〈我國早期的眼鏡〉，《文物天地》1988.3：18-19。

秦勝青、解潔瓊

2014 〈從廣告語看近代的國貨運動——以 1912~1919 年《申報》廣告語研究為例〉，《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4.12：104-107。

張心冶

1972 《珠寶世界》，臺北：婦女雜誌社。

張橙華

1986 〈蘇州光學史初探〉，《物理》13.6：381-384。

郭福祥

1997 〈乾隆與眼鏡〉，《歷史月刊》118：19-22。

陳玲、王迦南、蔡小麗編著，林婉媚翻譯

2005 《洋人眼中的清末中國——1898-1908 年在華西方人明信片解讀》，香港：中華書局。

陳無我

1897 〈眼鏡說〉，《遊戲報》154 號，光緒丁酉十一月初一日，第 1 版。

1901 〈勸人勿戴眼鏡說〉，《寓言報》211 號，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第 1-2 版。

陳春舫

2001 〈話說百年南京路 (18)：三足鼎立說眼鏡〉，《上海商業》2001.12：64-65。

馮柳堂

1939 〈眼鏡考〉，《申報》，民國二十八年元月二日，〈經濟專刊〉；並載《愛目》2 (1939)：2-6。

喬志強主編

1992 《中國近代社會史》，北京：人民出版社。

彭剛毅
1995a 〈眼鏡的歷史・上〉，《設計》65：65-68。
1995b 〈眼鏡的歷史・下〉，《設計》66：38-43。
黃時鑒編著
2008 《維多利亞時代的中國圖像》，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黃蔭清
2000 〈眼鏡歷史的考證〉，《中華醫史雜誌》30.2：82-86。
黃應貴主編
2004 《物與物質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楊豔麗
2014 〈乾隆皇帝與眼鏡〉，《文史天地》2014.1：49-51。
董樹岩
1994 〈眼鏡入華考〉，《物理通報》1994.2：38-39。
廖品正、陸綿綿編
2001 《中醫眼科學》，臺北：知音出版社。
蓋東升
2000 〈洋漆・眼鏡・金星玻璃——《紅樓夢》中外洋方物三題〉，《藝術研究》2000.2：10-13。
趙孟江
2004 《中國眼鏡歷史與收藏》，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
趙省偉、李小玉編譯
2015 《法國彩色畫報記錄的中國 1850-1937》，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
齊如山
1989 《北京三百六十行》，北京：寶文堂書店。
劉曉玲主編
2007 《驗光技術》，中和：新文京開發出版公司。
劉潞、吳芳思編譯
2006 《帝國掠影——英國使團畫家筆下的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勰廬
1937 〈眼鏡考〉，《逸經》33：77-80。
廣州博物館編
2009 《廣州歷史陳列圖冊》，北京：文物出版社。
樂正
1991 《近代上海人社會心態 (1860-1910)》，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燕山
2001 〈乾隆皇帝與眼鏡〉，《紫禁城》2001.2：49-50。
盧彥名
2009 〈試論西洋眼鏡在朝鮮半島的早期傳播〉，《歷史教學》567：81-86。
薨公（謝興堯）
1943 〈漫談眼鏡〉，《古今》16：23-26。
戴念祖
2001 《中國物理學史大系・光學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聶崇侯
1952 〈中國眼鏡史〉，《醫史雜誌》4.1：9-12。
1958 〈中國眼鏡史考〉，《中華眼科雜誌》1958.4：233-239。
Alan Macfarlane and Gerry Martin 著，黃世毅譯
2006 《玻璃如何改變世界》，臺北：商周出版公司。
Holcombe Chester 著，鞠方安譯
1998 《真正的中國佬》，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Noël Golvers 著，趙殿紅譯
2007 《清初耶穌會士魯日滿常熟賬本及靈修筆記研究》，河南：大象出版社。
Tim Dent 著，龔永慧譯
2009 《物質文化》，臺北：國立編譯館、書林出版公司。
永積洋子編
1987 《唐船輸出入品数量一覧 1637-1833 年——復元唐船貨物改帳・帰帆荷物買渡帳》，東京：創文社。
白山晰也
1990 《眼鏡の社會史》，東京：タイヤモンド社。
那波利貞
1924 〈淮南子に見えたる金目に就いて〉，《支那學》3.8：42-65。
原田淑人
1971 〈中國に於ける眼鏡（靉靆）の起源について〉，《聖心女子大學論叢》37：5-14。
Brindze, Ruth
1975 *Look How Many People Wear Glasses: The Magic of Lenses*. New York: Atheneum.

Chiu, Kaiming

1936 "The Introduction of Spectacles int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2: 186-193.

Corson, Richard

1967 *Fashions in Eyeglasses: From the 14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Peter Owen.

Duyvendak, J. J. L.

1954 "Desultory Notes on the *Hsi-Yang-Chi*." *T'oung Pao* 42: 1-35。中譯見劉強譯，〈「西洋記」隨筆〉，《南洋學報》10.2 (1954)：1-10。

Hacker, Arthur

2004 *China Illustrated: Western Views of the Middle Kingdom*. Boston, MA: Tuttle Publishing.

Hommel, Rudolf P.

1937 *China at Work: An Illustrated Record of the Primitive Industries of China's Masses, whose Life is Toil, and thus An Accoun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York: John Day.

Lawrence, Anthony

1992 *The Taipan Traders: A Portrait of Hong Kong's Days of Youth from the Finest Collections of China Trade Paintings*. Hong Kong: FormAsia Books Limited.

Lewison, Lawrence

1960 *You and Your Eyes*. New York: Trinity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ss, Peter

2007 *Chinnery in China*. Hong Kong: FormAsia Books Limited.

Needham, Joseph, Wang ling, and Kenneth Girdwood Robinson

1962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 4, pt. 1, *Physics and Physical Technology: Phys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brig, Theo. E.

1944 *Modern Ophthalmic Lenses and Optical Glass*. New York: The Chilton Company.

Pi, H. T.

1928 "The History of Spectacles in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42.10: 742-747.

Poulet, W.

1978-80 *Atlas on the History of Spectacles*. Bonn, Germany: Verlag J. P. Wayenborgh.

Rakusen, C. P.

1938 “History of Chinese Spectacles.” *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53.3: 379-390.

Rasmussen, O. D.

1915 *Old Chinese Spectacles*. Tientsin: North China Press.

Rosenthal, J. William

1996 *Spectacles and other Vision Aids: A History and Guide to Collecting*. San Francisco: Norman Publishing.

Winkler, Wolf, ed.

1988 *A Spectacle of Spectacles: Exhibition Catalogue Carl-Zeiss-Stiftung Jena*. Leipzig, Germany: Edition Leipzig.

三・網路資訊

紅葉山房古籍文庫

《蘇州市景商業圖冊》，http://hongyeshan.com/post/7288.html，讀取 2018.12.18。

高雄醫學院附設眼科

〈近視原因〉，http://www.kmuh.org.tw/www/ophthal/myopia2.htm，讀取 2011.12.28。

健康常識網

〈老花〉，http://www.jiankangchangshi.com.cn/post/80.html，讀取 2011.03.13。

維基百科

石英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F%B3%E8%8B%B1，讀取 2017.10.10。

Wikidata 網

Cardinal Fernando Niño de Guevara 條，https://www.wikidata.org/wiki/Q3784753，讀取 2018.12.22。

Hugh of Saint-Cher 條，https://www.wikidata.org/wiki/Q1365254，讀取 2018.12.22。

邱仲麟

From Vision Correction to Trade Wars: A History of Material Culture of Eyeglasses from the Ming Dynasty onwards

Chung-lin Chiu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in which eyeglasses, originally an imported good, gradually beca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unique culture that ensued. Structed in four parts, the paper begins by giving an overview of the introduction, duplication, and sales of eyeglasses.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reign of the Longqing Emperor in 1567, small quantities of eyeglasses were imported as tribute offerings or merchandize items of border commerce. After 1567, there was a growing circulation of eyeglasses through maritime trade along the southeastern shores of China. Residents along these regions began duplicating eyeglasses. By the time of the Qing dynasty, an oversupply of eyeglasses caused prices to plunge. Eyeglasses were peddled on the streets as well as sold in shops.

The second part looks at reading glasses (eyeglasses for presbyopia), myopia glasses, optometrist services, and eyeglasses fram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ading glasses were recorded to have been introduced between 1420 and 1430; their usage began to increase after the 1600s. The Qing-dynasty maxim “age 40 is a critical point for eyesight” denotes a threshold from there onwards one’s worsening presbyopia necessitates use of reading glasses. As to myoptic eyeglasses, they became popular primarily after the thirtieth year (1691) into the reign of the Kangxi Emperor. Customers were provided with such eyeglasses of primarily twelve diopters. During the reigns of Daoguang Emperor and Xianfeng Emperor (1840-50s), a new type of eyeglasses with temples were introduced and then duplicated.

The third part analyzes the specific concepts and phenomena involved in the use of eyeglasses. In the years betwee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eyeglass lenses made from glass were ubiquitous. At the height of the Qing dynasty, however, eyeglass lenses made from crystal grew popularity amo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gentries and their market share jumped thanks to a belief that goes “glass was fiery and would harm

the eyes, while crystal was aqueous and could help moisten the eyes." Also prevalent was the belief that eyeglasses should not be worn for extended periods of time. The most well-known and staunch supporter of this belief is Emperor Qianlong, who avoided using eyeglasses, believing that they are an example of humanity being manipulated by material goods and therefore wearing eyeglasses should be discouraged. Nonetheless, wearing eyeglasses was thought to be a symbol of appearing erudite and there was hearty emulation among younger generation of stud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wearing eyeglasses exutes a showing-off quality, and tinted crystal eyeglasses were considered the most fashionable.

The last part investigates a new wave of eyeglasses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Qing dynasty. Western optometry tables were introduced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Guangxu. Optometric instruments were later introduced prior to the fall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saw domestically-manufactured eyeglasses being severely impacted by an onslaught of Western-made golden-, silver-framed eyeglasses, as well as Toric lenses. In Shanghai, a fight over market share was fought between local and Western eyeglasses tradesmen. Eyeglasses were therefore being tagged as trade war vs. nationalism. And high-tech lenses and expertise in optometry would not make for a good peddling without associating themselves with a strong call for patriotism.

Keywords: popularity, localization, optometry, advertisement, material culture